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年 第4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目 录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 3 孙壮志 王晓泉 邓 浩 张家栋
余纲正 刘雨薇 / “上海精神”与
上海合作组织再出发

中亚地区研究

- 42 许 涛 / 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
动因、目标与困境
- 66 许昌志 /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
的“变”和“不变”
- 93 周 明 林宇晴 / 中亚“C5+1”多边合
作机制的类型与前景研究

留苏教育与中国革命

- 135 陶 源 /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干部教
育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 153 孙会修 /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远东华人教
育问题
- 180 李 杰 / 远东中国剧院与革命叙事传播
机制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8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Сунь Чжунанчжи, Ван Сяоюань, Дэн Хао, Чжан Цзядун,
Шэ Ганчжэн, Лю Юйвэй**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3)

Сюй Тао

Повышение уровн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тивы, цели и дилеммы (42)

Сюй Чанчжи

«Переменные» и «конста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66)

Чжоу Мин, Линь Юйц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ипов и перспектив механизм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C5+1»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93)

Тао Юан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адров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екто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135)

Сунь Хуэйсю

Пробл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цев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30-е
годы..... (153)

Ли Цз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механизм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нарративов (18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5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un Zhuangzhi, Wang Xiaoquan, Deng Hao, Zhang Jiadong,
She Gangzheng, Liu Yuwei***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the Renewal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3)

Xu Tao

The Growing Strategic Autonomy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Drivers, Objectives, and Dilemmas (42)

Xu Changzhi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66)

Zhou Ming, Lin Yuqing

On Typ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entral Asian “C5+1”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93)

Tao Yuan

Cadre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and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135)

Sun Huixiu

The Issu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Far East during the 1930s ... (153)

Li Jie

The Chinese Theatre in the Soviet Far East and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180)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上海精神”与上海合作组织再出发

孙壮志 王晓泉 邓 浩 张家栋 余纲正 刘雨薇

【内容提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正在经历战略转型与机制创新，积极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上合组织从最初以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区域性机制，逐步演变为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在“上海精神”指导下，组织不断推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强化多边合作与战略对接，积极应对扩员后的挑战。未来，上合组织需在效率提升、共识建构与制度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更好地服务成员国共同利益，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提供“上合方案”。

【关键词】“上海精神” 上合组织机制改革 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003(39)

新形势下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与目标

孙壮志*

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日起，中国外交的全新理念和思维就贯穿其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开始重视多边层面的外交，开始真正发挥一个地区性甚至世界性大国的作用，为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发展以及多极化进程，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①中国务实、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其他成员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促成了经济和安全领域长期合作规划的出台和基本目标的确定。在中方的影响下，各

*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① 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与新时代中国多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14页。

成员国在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方面也有了较多的共识，各方面的建设能够迅速走上正轨，直接促进该组织较快完成初创阶段，在常设机构和机制启动方面比较顺利，并且以崭新的形象走上国际舞台。

一、理念引领：打造更加紧密的地区命运共同体

上合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参加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国因此在其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提出了很多推动上合组织组织发展的新构想和新倡议。随着上合组织开启扩员进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先后成为正式成员国，多边合作的地理空间大大拓展，关注的议题增多，但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甚至矛盾冲突公开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①凝聚力和向心力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和安全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挑战增多。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升级，上合组织的发展面临很大压力。如何更好地明确长远目标，增强内部的团结与相互认同，考虑到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青岛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②在 2020 年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又在当年的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要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等重要主张。

在疫情后首次线下举行的 2022 年 9 月撒马尔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坚持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公平正义，把准发展方向，继续为成员国发展振兴营造有利环境。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加强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沟通，形成发展合力；其次要不断夯实多边合作的物质和人文基础，形成有力支撑；再次要建立灵活、有效的平台和机制，形成伙伴网络。^③

① Мельникова Ю., Вяхирева Н., Грызлов Г.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связанно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Индии: от Евразии до Арктики. 16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cs-and-comments/analytcs/problematika-svyazannosti-v-otnosheniyakh-rossii-i-indii-ot-evrazii-do-arktiki/?sphrase_id=224534781

②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 年 6 月 11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611/c64094-30048634.html>

③ 参见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从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基于世代友好，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是成员国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由之路。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古丝绸之路为亚欧大陆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思想观念大碰撞、多元文化大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上合组织国家实现和平与发展、共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迪。^①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一大创新，更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领域同步推进，多轮驱动，彼此呼应。之所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主要是由于中国与其他大多数成员国地缘上切近，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双边政治关系提升很快，是重要的经贸伙伴，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面临相似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彼此间能够携手应对，守望相助。

二、平台建设：推动发展战略和地区倡议的对接合作

上合组织现有 10 个成员国、2 个观察员国和 14 个对话伙伴，经济体量和地理空间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区域组织，成员国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对自身的外交定位同样各不相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也都是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都在争取有个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为避免成员国的战略和倡议出现竞争、对冲等问题，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对接合作的全新模式，可以有效化解矛盾，有助于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包括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在随后的历次上合组织峰会通过的文件中，多数成员国都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倡议，借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地区国家共同发展。多数成员国领导人参加了先后三次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是不同的合作方式，但理念相通、路径相近、目标相同，都是要促进区域的大融合、大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中国与俄罗斯就“一

^① 参见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共识。上合组织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成员国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消除障碍，提供保障。

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加强跨境运输领域合作，扩大本币结算，通过已经启动的多个部长级会晤机制，进一步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战略与倡议的相互对接合作，可以不断激发各国经济增长活力。有些上合组织国家还提出了自己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主动与“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对接，中国与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组成部分，也进一步密切了成员国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关系。

2014 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塔国成为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2017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这是第一个政府间“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正式文件。近年来，随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成员国开始推动大规模国内改革计划，如“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 年发展战略、“新哈萨克斯坦”革新战略等，其领导人也都积极向中国推介，寻求支持。中国不仅成为上合组织国家实现产品出口多元化、经济多样化的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而且成为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同路人”。双方准备共同制定中国-中亚新经济对话战略。中亚还努力对接中国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双边合作，探讨实施“里海创新城”、区域物流中心等多边项目，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三、功能设定：为完善地区治理提供示范和样板

变局当中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升级，冲击和动摇了现有国际体系的根基，也给多边合作的有效性带来巨大的考验。习近平主席近几年在出席重大国际活动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以及开展文明互鉴，提供了基本的合作原则和政策遵

循。上合组织所关注的地区治理问题，也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组织框架内，中国为促进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出了很多可行性建议。中方的建议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通过建立示范区等方式进行引导，率先实践，或者在双边层面进行落实，以双边促多边，取得了良好效果。

成立 20 多年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合作以及国际交往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提升，但在功能定位上一直比较模糊。在中亚国家学者看来，中国非常看重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打击“三股势力”和毒品走私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倡议创建地区安全体系。上合组织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全球竞争力。^①实际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首先是地处欧亚腹地的中亚国家希望摆脱边缘经济的不利地位，借助中、俄等大国提供的帮助走向外部市场，打造有竞争力的地区经济体，在地区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从地区治理方面来看，上合组织的贡献不仅在于消除和管控分歧、凝聚发展共识，而且为多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成员国先后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合组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反极端主义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等重要文件；启动了从元首峰会、政府首脑会晤到有关部长的多层次会晤机制；在北京、塔什干建立了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机构。上合组织还提出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推进地方和跨境合作等具体目标，致力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成立了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召开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要提升地区治理的水平，不仅要建立成熟的规则体系和制度体系，还需要搭建灵活的对话与协商平台，扩大不同主体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中方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办了防务论坛、民间友好论坛、妇女论坛、媒体论坛等。近几年，在中方的倡议和努力下，又举办了上合组织发展合作部长会议、产业链供应链论坛、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友好城市论坛，建立了中国-上海

① Хайдарзода Р., Дмитриева М.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 Китай в ШОС: от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о обще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видения. 8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postsoviet/tadzhikistan-i-kitay-v-shos-ot-dvustoronnego-vzaimodeystviya-do-obshchego-globalnogo-videniya/?sphrase_id=224540987

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等。在中国成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后，确定 2025 年为“可持续发展年”，计划举办 100 多场多边活动。通过中方与其他成员国的积极努力，上合组织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四、义利并举：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利益

随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对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传统上，中国的国家利益被定义为“独立自主”，更关心本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外交上比较“内敛”，参加多边机制也比较谨慎，以免受制于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需要重塑，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对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信息时代新技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也使国家利益的内涵更加丰富，比如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重要。

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还是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外来干涉，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具体还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国际利益，比如政治上保障政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在国际交往中承担相应义务与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的上述国家利益在上海合作组织当中也有直接的体现，也可以包括五个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合作和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成员国协调彼此的国家利益。

由于成员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各不相同，上合组织要扩大成员国的利益基础，需要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上合组织作为迄今为止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组织，对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要借助上合组织在地区争取可靠的战略依托，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关系；拓展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建立陆上运输通道；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延续传统友谊，开展文明互鉴，致力于“世代友好”。随着上合组织国际影响力、号召力的提升，中国的国

家利益也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

要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寻找和扩大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地区的共同利益，借助这个新型的多边机制，增进集体的价值观认同，加强政策沟通，把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国际问题的共同立场和看法表达出来，有效保护成员国的国际权益，增加发言权和发言的分量。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与这些国家进行利益上的协调，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通过维护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也能体现自身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样，与成员国共同探讨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自身和所有成员国的现实以及长远利益。

五、结 语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这个组织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中国主要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成员国是相同或相近的。比如，各方对中国领导人总结出的“上海精神”之所以高度认可，因为其体现了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似性。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个地区“样板”，也符合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根本利益。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具体层面也会有所变化，但核心的内涵是稳定的、一贯的。

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关系的深刻转型，客观上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一，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具有跨国性，全球性问题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加强；第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加深，国际交往更趋密切，区域合作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第三，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方式，俄乌冲突虽然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但双赢式乃至多赢式的非零和博弈原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第四，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成为调节国家关系的重要杠杆。^①上合组

① 王杰编：《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织诞生于冷战后特殊的国际背景之下，正在践行一系列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比如安全观、合作观、发展观、文明观以及全球治理观等，这恰恰是中国领导人根据地区实际和成员国发展的共同需要提出来的。当前，上合组织已经成为规模和潜力都非常可观的区域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广泛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领导人又提出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新目标，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在此基础上上合组织正在朝着新型区域合作的方向稳步迈进。

上合组织在新时代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王晓泉*

一、遵循新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霸权势力试图将多边舞台作为对别国发号施令的山头，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积极凝聚谋和平、求发展的“全球南方”合力。上合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过 24 年发展，已成为由 10 个成员国、2 个观察员国和 14 个对话伙伴的“上合大家庭”，覆盖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主张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协商，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为成员国合作乃至南南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础。

“上海精神”既尊重多样文明，又谋求共同发展，体现了差异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结合，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上合组织成员国涵盖不同的文明、宗教和社会制度，但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在交流互鉴中增进理解和信任。对

*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多样性的包容，使上合组织能够凝聚各方力量，不断加强合作。每个国家都可以为解决共性问题贡献独特的智慧与资源，并使本国的合理关切与利益得到别国的尊重与认可。因此，“上海精神”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对以多边外交方式解决具有共性特点的全局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是成员国开展共同行动的共同遵循。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基石”。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上合组织结合，是对“上海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上合组织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上合组织要打造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包容互鉴的典范。在 2020 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上合组织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在 2024 年“上合组织+”会议上呼吁，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这些重要论述为上合组织完善价值观体系和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合作关系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上合组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成员国在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上合组织前身是“上海五国”，即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的旨在解决双方边境安全与互信问题的国家元首会晤机制。1996 年 4 月，“上海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约定边境地区军事力量互不进攻、互不针对对方进行军事演习、相互通报重要军事活动情况、互相加强军事友好交往等，极大促进了双方的安全互信和政治关系，为中国倡导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上海五国”机制由五国两方转变为五国五方，水到渠成，其磋商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为 2001 年上合组织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更好地开展平等协商，上合组织建立了国家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外交部长理事会、21 个部门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形成了多层次、多部门的立体磋商网络，推动了成员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上合组织提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主张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举措，有序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综上所述，上合组织因遵循“上海精神”等新理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及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实践平台，不但显著推动了成员国多边合作，展现了守望相助的大家庭精神，而且为全球多边主义发展提供了新范式，注入了新动力。

二、践行新使命，创建欧亚大陆新秩序

作为欧亚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上合组织肩负着构建新秩序的光荣使命，即遵循新理念创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合作新路径与新方法，带动域内实现全面、稳固、持久的安全以及综合、均衡、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推动成员国战略对接，打造发展共同体。中国是上合组织内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最具战略对接和资源协同能力。

“上海精神”完全契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主要内容的“丝路精神”。“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合组织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①。中国几乎与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覆盖区域重叠，发展目标相近，合作理念相通。2015年5月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共同协商，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将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等原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开展合作”^②。

① “中国-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产业合作大会成果丰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年4月1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8062.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5年5月9日第2版。

此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哈萨克斯坦）、“2026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吉尔吉斯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年发展战略等对接合作正在走深走实。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内容覆盖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矿产开发等重要领域。中国与白俄罗斯政府2024年联合公报指出，“双方致力于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全面合作，愿共同落实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落实两国政府关于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对接的合作规划，推动中白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①习近平主席宣布将2025年确定为“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中方将在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开展一系列活动，着力提升贸易投资、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水平，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地区国家发展战略高质量对接，为地区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助力。^②

成员国战略与规划对接，有力地促进了上合组织打造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网络。在上合组织推动下，成员国致力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本币结算，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合组织域内正在形成国际陆海通道相互联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断扩大、各国产业优势互补与优惠政策相互促进的新经济秩序，并显现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等特征。从中长期来看，上合组织域内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与日益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体系，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合作，使欧亚大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和开放型发展共同体。

其次，维护域内和平稳定，打造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始终将安全合作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通过制度化合作将安全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践成果，为欧亚大陆构建了更具韧性的新型安全合作体系。上合组织不断加强成员国相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2024年8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8/t20240823_11478503.shtml

②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4日第2版。

互信任措施建设，建立了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定期会晤机制。成员国通过定期磋商协调立场、共同应对“三股势力”等威胁。成员国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09）、《反极端主义公约》（2017）、《禁毒战略》（2018）等 30 余份安全合作文件，构建起完备的安全合作法律框架。

上合组织为解决全局性重大安全问题而加强协调与合作，成功开展了诸多共同行动。2004 年在塔什干设立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成为全球首个以反恐为核心职能的国际组织实体。上合组织通过建立联合反恐数据库等措施，实现了成员国情报实时共享，每年开展“和平使命”多国联合反恐演习，提升了成员国协同作战的能力；大力开展禁毒合作，摧毁大量跨国贩毒网络；推动边防部门信息互通，遏制武器走私、非法移民；建立了网络空间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电信诈骗活动；通过了《AI 伦理安全准则》（2024），成为首个制定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规范的区域组织；通过了《生物安全合作声明》（2023），强化实验室信息共享与生物威胁预警；成立了能源俱乐部，协调油气供应与管道保护；建立了粮食储备互助机制，应对全球粮价波动。面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支援，分享抗疫经验和医疗资源。

阿富汗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四周环绕着上合组织成员国。为化解阿富汗安全问题外溢风险，上合组织于 2005 年成立“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与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开展合作，举行了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国防部长联席会议，“为凝聚地区合力调解阿富汗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最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迈向命运共同体。2024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强调，上合组织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遵循《上合组织宪章》和《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发扬“上海精神”，^②这是上

① “专访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撒马尔罕峰会将成为上合组织发展新的里程碑”，中国日报网，2022 年 9 月 15 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209/15/WS6322cf47a310817f312ec2b6.html>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 年 7 月 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1255.htm

合组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域内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上合组织摒弃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追求国家间关系平等化、合作关系伙伴化，构建了以共同安全与发展为目标、以文明对话为纽带的区域合作新范式，也为在全球范围内探索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贡献了宝贵的“上合智慧”与“上合方案”。

上合组织积极构建人文共同体，努力打破文明隔阂与偏见，促进形成“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体系，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筑牢人文基础，凝聚精神力量。为此，上合组织定期举办文化艺术节、青年交流营、媒体论坛、旅游年等活动，设立上合组织大学，推动成员国高校间合作与人员交流，加强在公共卫生、科技、环保、紧急救灾等领域的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鼓励智库、非政府组织、青年、妇女等各界友好往来，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不断深化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关系，在域内构建了全面战略伙伴集群和命运共同体矩阵。比如，中国与俄罗斯形成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哈萨克斯坦结成了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土库曼斯坦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白俄罗斯建立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五国决定建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与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关系。中国外交带动了上合组织内部交往，成员国在双边和小多边层面的关系不断加强。比如，作为上合组织核心区的中亚地区不断加强一体化合作。随着新型国际关系的不断巩固以及各领域共同体建设的不断加强，上合组织迈向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更加稳健。

三、赢得新挑战，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交织，上合组织在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全球治理进程中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对此，上合组织不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积极探索全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

第一，完善决策机制，解决好成员国发展差异与多元利益诉求所带来的问题。上合组织决策遵循协商一致原则，任何重大决定都需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从而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然而，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协调难度。并且，个别成员国可能为一己私利而破坏集体决策。比如，2025 年上合组织防长会议上印度就突然拒绝签署联合公报。

上合组织为解决以上问题不断优化决策机制和执行流程。通过加强各层级会议的协调配合，提高议事效率，确保成员国的诉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同时，积极探索新合作模式，如建立更具针对性的专业工作组，聚焦特定领域难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暂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问题，上合组织开始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即赞成的国家在代表局部性共识和阶段性成果的文件上联合署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全体共识，这样能大大提高对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的表态与决策效率，避免上合组织沦为“空谈俱乐部”。

第二，深化经济合作机制，以高质量多边经济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及域内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等问题凸显，影响了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进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形成了制约。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经济管理能力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参差不齐，某些成员国对自贸区建设存有疑虑，这些因素也制约了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

鉴于以上情况，上合组织应大力促进成员国深化对共建上合组织经济共同体的战略重要性认知，将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与欧亚经济联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调整为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加强上合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构的交流合作；推动成员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 WTO 规则基础上制定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规则体系，营造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物流现代化，探讨建立地区国际物流中心网和交通干线沿线产业集群；革新欧亚货币金融体系和支付结算体系，建立金融稳定机制，为域内设施联通和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持；探寻新的科技及创新合作模式，在优先领域开展联合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能源上中下游全产业

链合作，建立能源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建立长期能源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高科技联合项目，在粮食等农业领域运用创新科技；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研究讨论电子商务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探讨搭建区域电子商务合作平台；^①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与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推动更多惠及民生的具体项目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化解西方对上合组织独立自主发展构成的压力，加强上合组织的地区代表性。由于上合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利益，西方对上合组织进行污名化，制造和强化上合组织“威权俱乐部”等标签，试图以此破坏上合组织的国际形象。对此，应强化成员国关于维护上合组织独立自主发展的共识，深化与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不断拓展上合组织“朋友圈”，强化“上合组织+”国际合作模式，从而加强地区代表性和抵御外部压力的合力。可考虑吸收更多周边国家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

第四，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演变的能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威胁依然存在，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威胁形态不断变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考验着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应对能力。要加强上合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能力建设，探索更有效的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联合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等方式，提高成员国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为区域的和平稳定筑牢防线。可参照集安条约组织赴哈萨克斯坦平乱等做法，强化跨境联合维稳机制和反恐机制。

通过全面应对新挑战，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行动力将不断增强，朝着全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稳步迈进。这不仅将为成员国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使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① 王晓泉：“‘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第27-37页。

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改革提速：动因、挑战与目标

邓 浩*

近年来，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加剧、地区多极化与自主化加速推进和上合组织自身急速扩容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明显加快了组织机制改革进程，旨在切实提高组织行动力和效率。2021 年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周年杜尚别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作出了关于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的决议，拉开了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序幕。^①2022 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进一步作出了完善上合组织工作的决定。^②在哈萨克斯坦担任上合组织 2023—2024 年轮值主席国期间，经过一系列磋商，上合组织制定了进一步推动组织现代化、提高组织效率的共同办法，涉及广泛问题，包括相关机制和常设机构改革。2024 年阿斯塔纳峰会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关于完善本组织工作的相关建议，^③为进一步开展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动力。2024 年上合阿斯塔纳峰会后，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在 2024 年 9 月 9 日举行的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明确指出，中方将同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上合组织运作机制改革。^④在 2025 年 3 月 22 日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进一步指出，中方正在同各方一道推进上合组织运作决策效率改革。^⑤毫无疑问，机制改革是当前上合组织关注的紧迫问题之一，将成为 2025 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议题。这对破解上合组织效率

* 邓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天池英才”特聘教授，曾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①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②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3 版。

③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就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成果举行媒体吹风会实录”，2024 年 7 月 10 日，<https://chn.sectsco.org/20240714/1460612.html>

④ “外交部就中方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举行吹风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09/content_6973355.htm

⑤ “独家专访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中方正全面推进上合峰会筹备工作”，2025 年 3 月 22 日，<https://tv.cctv.cn/2025/03/22/VIDEa0dDvSUzO6ogXkj869wZ250322.shtml>

瓶颈难题、推动上合组织转型升级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价值，也将为新型国际组织的健康有序运转提供有益借鉴。

一、上合组织加快机制改革重点和动因

当前上合组织的机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如何完善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塔吉克斯坦提议在杜尚别设立上海合作组织禁毒中心，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独立的常设机构；俄罗斯主张将塔什干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哈萨克斯坦提议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上海合作组织信息安全中心；吉尔吉斯斯坦建议在比什凯克设立上合组织打击跨国组织犯罪中心。^①目前各方正就上述设想加紧磋商，积极缩小分歧，努力达成共识。二是如何推进组织机制现代化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涉及会议机制和常设机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中心是要提高组织的行动效率。对此，成员国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关于会议机制，有成员国建议由轮值主席国统一安排其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所有会议，而不是像现在由不同的国家分别主办各类会议，以统筹协调，提高会议效率；有成员国建议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错开年度举行，以确保会议质量；关于常设机构改革，主要涉及扩大秘书长权限、改进秘书处人事制度、增设职能部门、增加人力和财务资源、进一步发挥成员国常驻代表作用等方面。

促使上合组织加快机制改革主要有四个动因。一是现有机制功能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促使上合组织加快机制改革的客观动因。上合组织现有机制大都是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建立的，其功能与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上合地区形势与成立初期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上合组织机制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以有效应因新形势、新变化。

二是确保现有机制适应上合组织自身发展变化的需要，是上合组织加快

①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21年9月18日第2版。

机制改革的内在动因。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多年来，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从最初的 6 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包括 10 个成员国、2 个观察员国、14 个对话伙伴共 26 个国家的大家庭，活动范围从中亚延伸至南亚、西亚和东欧地区，包含中华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多种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不断增加无疑使得上合组织内部协调合作的工作强度明显加大，显然需要对现有机制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扩员后上合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上合组织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安全合作逐步延伸至经济、能源、交通、人文等多个领域，原有的机制也需要作出改进和完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

三是现有机制决策效率不高、组织行动力不强，倒逼上合组织加快机制改革。上海合作组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机制运转效率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呈现出会议多、文件多而落实少、效率低的怪圈。这不仅制约着上合组织的合作，也对上合组织的形象和威望构成不利影响。继续这样下去，甚至会使上合组织的运行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

四是成员国面对新形势对机制改革态度趋于积极，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加速剂。面对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复杂化和美国与西方的极限制裁，俄罗斯经略其主导的地区机制明显力不从心，地区国家乘机强化自主意识和行动。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倚重显著加大，对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积极，其主动向上合组织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是明证。自印度加入后，上合组织就想改变上合会议多、决议多而落实少的痼疾。面对多轮扩员后的新形势，印度对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态度渐趋积极。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在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希望借助上合组织的改革，拓展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伊朗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也期待通过改革后的合作机制，打破外部制裁带来的经济困境，扩大能源出口市场。中亚成员国面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趋动荡的地区形势，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考虑，亦希望上合组织变得更有行动力，更现代化。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俄罗斯对中亚安全的保障作用难免下降；而中亚国家自保能力有限，这使得中亚成员国把维护地区稳定的希望更多投向上合组织。同时，在俄罗斯陷入美国和西方极

限制裁困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经济业态蓬勃兴起之际，中亚成员国也对上合组织助力自己走出困境、走向振兴抱有深切期待。在此背景下，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通过机制改革提高行动力和效率的期盼变得更加强烈和迫切。

二、当前上合组织机制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涉及成员国的切实利益与合作的方方面面，很难一蹴而就。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上合组织在机制改革上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扩员后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凸显，使得上合组织机制改革平添复杂因素。随着三轮扩员，上合组织内部的异质性更加凸显，利益和诉求更加多元，客观上大大增加了内部协调、一致行动的难度，使上合组织的机制改革平添复杂因素。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诉求都存在差异，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有迅速缩小的可能。如何在机制改革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是上合组织机制改革面临的一大难点。

第二，新形势下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权力让渡难度加大，使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缺乏内在推力。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正处于新旧更替的关键时刻，旧的秩序日渐没落，而新的秩序尚在酝酿之中，各国自保自顾倾向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尤其是处于上合组织核心区的中亚成员国更是处于自主化加速发展阶段，相比以往，把主权利益看得更为重要，这使得上合组织得到成员国权力让渡而赋予机制更多活力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没有成员国必要的权力让渡，上合组织的机制就很难真正实现高效率的改革。

第三，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使上合组织机制改革举步维艰。机制改革意味着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否则改革很难持续进行。正是在中方的资金支持下，上合组织秘书处才顺利建立起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而秘书处要增加职能部门、增加相关人员招聘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注入。从更大范围来看，上合组织机制要推进上合组织务实合作，更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迄

今为止，上合组织还未能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这导致上合组织务实合作难免陷于空转。

三、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任务

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是关系上合组织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战略举措，其目标取向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提升组织决策与执行效率。通过改革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第二，要增强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通过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扩员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成员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成员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组织周围，共同致力于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第三，要提升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改革使上合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改革、执行机制改革、监督机制改革、扩员机制改革四个方面。

上合组织决策机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简化决策程序。通过改革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层级和环节，提高决策的时效性。二是要增强决策的灵活性与代表性，在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多数表决制。

上合组织执行机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任务主要是明确执行主体。对各项合作任务和项目进行细化和分解，明确具体的执行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与此同时，加强执行能力建设。通过培训、技术支持等方式提升成员国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执行能力。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平台，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及时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上合组织监督机制改革的首要预期目标和任务是要尽快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或监察机构，负责对组织各项决策的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监督。完善监督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估指标，对组织的工作绩效进行量化评估。

上合组织扩员机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扩员的标准与程序：进一步完善扩员标准，明确申请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应当达到的条件。同时，规范扩员程序，确保扩员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增加对申请国在遵守“上海精神”、尊重组织章程等方面的考察，防止不符合条件的国家加入。制定详细的扩员评估手册，明确各项考察指标的具体内容和评分标准，使扩员评估工作更加规范化。二是要加强新成员融入机制建设：建立新成员培训机制，向其介绍上合组织的宗旨、原则、运行机制和合作项目等，使其能够迅速适应组织的工作方式。同时，在合作项目的安排方面，给予新成员一定的支持和引导，促进新成员与现有成员国的合作与交流。

四、未来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机制改革是突破上合组织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招。如何在成员国异质性加大的情况下确保行动力和效率，这不仅是上合组织，也是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际组织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整个全球和地区治理走出现有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未来上合组织机制改革应在培育和塑造“上合意识”、确立组织共同目标、提升合作效率三个方面集中发力，切实提升上合组织行动力。

首先，要积极培育塑造“上合意识”。共同意识关系到上合组织能否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和旺盛的行动力，对上合组织机制正常有序运转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一是要明确组织定位，强化集体认同，为形成“上合意识”创造必要前提；二是要总结、提炼出一套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为“上合意识”提供价值和理念支撑；三是要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制度化，为“上合意识”奠定法律基础；四是要大力宣扬“上海精神”，努力使之向成员国社会和民间层面传导，积极培育推广“上合意识”。

其次，要确立共同奋斗目标。共同目标关系到上合组织的组织定位和合作方向，在成员国对未来组织发展方向和目标缺乏明确共识的情况下，上合组织是很难协调一致高效行动的。一是要在充分研究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目标

定位的基础上，在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成员国协商一致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成员国间的政治协调，积极求同存异，寻求在目标方向上的最大合作公约数。二是要加大宣传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重要倡议，努力推动使之成为未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的奋斗目标。三是要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制定推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专门文件，使共同目标具有法律效力，成为上合组织的行动指南。

最后，要提高行动效率。提高组织行动效率是上合组织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是防止组织滑向论坛化、实现组织由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真正转变的必由之路。一是要创新性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可以考虑在重大问题上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在非核心议题上引入灵活决策机制。二是要灵活对待“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考虑实施“建设性介入”政策，即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在充分尊重成员国和有关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依据成员国和当事国需求，采取必要的介入措施，以化解矛盾，缓和危机，防止事态恶化，引导事态向积极方向发展。三是要优先考虑新建冲突预防和争端调解机制，切实提高上合组织危机反应与管控能力。同时，优化现有会议机制，着力建立文件落实机制和工作机制，改变文件多、会议多而落实少的弊端。四是要明确和提升秘书长地位和权限，加大对常设机构投入，进一步完善常设机构职能，切实提升其执行力。

上合组织机制改革是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适应组织自身发展需求、提升组织运转效率的必然选择，符合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推进上合组织机制改革进程中，应根据难易程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既不能墨守成规，举步不前，也要防止操之过急，冒进激进。必须分清主次轻重，统筹兼顾。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推进上合组织机制改革问题上已达成普遍共识，通过合理设定预期目标，并基于坚实的合作基础、共同的利益诉求以及中俄等大国的引领作用，上合组织的机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可行性，有望在各方努力下取得实质性突破，从而切实提升自身行动力、凝聚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并为“全球南方”新型国际组织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借鉴。

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对上合组织运行机制的影响

张家栋*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内部运行机制的动态演变。作为后冷战时期的区域性多边机制，上合组织最初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核心目标是应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并逐步扩展到经济、安全和人文合作领域。成立初期，上合组织以中俄为双核心形成三方互动形态：中国凭借经济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和贸易合作，俄罗斯依托地缘政治优势主导安全议题，中亚国家作为重要参与方确保组织平衡。尽管“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存在隐性张力，领导权层面有潜在矛盾，但因成员国间无根本性利益冲突，矛盾始终可控。201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时加入，增强了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但也引入了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上合组织的内部矛盾性质也发生质变：从领导权隐性博弈转化为成员国在高级政治领域的直接对抗。这一转化重塑了上合组织的运作逻辑，对其存续与发展构成严峻考验。

一、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背景与动因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既是两国基于自身战略需求的选择，也是上合组织吸引力与内部力量格局互动的结果。这一扩员可追溯至2005年印巴两国获得观察员地位。经十余年酝酿，最终两国于2017年阿斯塔纳峰会实现正式加入。这体现了大国博弈与区域合作需求的交织，两国虽动机各异，但均服务于各自地缘战略目标。

1. 印度试图借上合来平衡中国影响力、拓展战略空间。印度作为南亚大国，长期将中国视为区域竞争主要对手。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与中亚、南亚国家合作，上合组织逐渐成为印度展示区域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 张家栋，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印度认为,如果不加入上合组织,自己将难以对冲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被排除在正在形成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之外,“参与式制衡”成为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重要策略考虑。通过加入上合组织,印度可以从内部影响议程设置,平衡中国力量优势,同时借助组织框架拓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印度还将上合组织视为对抗巴基斯坦影响力的场所,尤其在反恐议题上,多次强调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间接指向巴基斯坦。另外,加入上合组织也是印度外交多边主义转向的一部分。印度通过同时加入上合组织和美国与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努力打造自己在竞争性多边机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功能。

2. 巴基斯坦试图为国家安全寻找多边保障。作为中国在南亚最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希望借助上合多边平台来改善自己的安全环境。一方面,巴基斯坦试图通过强化与中国等国家在反恐、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应对印度地缘政治压力的能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加入后可直接参与各类多边合作机制,为自身安全提供更多的国际制度保障。^①另外,巴基斯坦的加入也是对印度“参与式制衡”的一种回应,可以部分对冲印度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影响力。巴基斯坦还希望通过上合改善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关系,对冲印度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合作对巴基斯坦构成的“越顶效应”。

3. 上合组织要平衡组织扩员与矛盾增加之间的关系。上合组织扩员源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上合组织在安全、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效日益显著,对区域内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印巴作为南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支点国家,其加入能显著提升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上合组织覆盖人口增至全球 40%以上,地域也从中亚延伸至南亚,从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形成横跨欧亚和两大洋的合作网络。最终,上合组织以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兼容了印巴矛盾所带来的机制性冲击。

二、印巴加入后上合内部博弈属性的变化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性质发生变化。此

^① Sarwat Rau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Opportunities for Pakistan”, *NU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 Stability*, 2019, Vol. II (1), pp.15-26.

前，组织内部主要矛盾是协商一致的投票机制与力量格局日益失衡之间的隐性张力，是薄弱的机制力量与日益上升的全球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印巴两国加入后，矛盾焦点转化为成员国在主权和领土层面的对抗与冲突。上合本来被设计为处理低级政治议题（low politics）的国际组织，现在必须面对高级政治问题（high politics）。

1. 扩员前的上合面临领导权的隐形博弈。上合组织成立以来采用“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任何成员国均有实质否决权，以确保各成员平等参与。随着经济实力与区域影响力快速提升，中国在合作项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 年上合组织成立时，中国 GDP 占总量约 78%；2001—2008 年因石油价格上升，中国占比降至 70%，俄罗斯从 18.2%升至 25.3%；自 2009 年起受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占比到 2016 年降至 10.1%，中国升至 88.1%。^①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与组织议程对接，加上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均是主要推动力量。

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与协商一致表决机制之间的张力日益增大。俄罗斯等成员国既希望借助中国资源推进合作，又担忧中国主导组织发展方向，形成了既合作又制衡的微妙关系。中国等自 2010 年起试图建立上合组织金融机构，长期遭俄罗斯反对。俄罗斯希望发挥其在欧亚开发银行的领导功能，而非新建一个自己主导不了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引入印度来制衡中国，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②中俄围绕金融领导权的博弈持续十余年，直至 2025 年 6 月北京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才“在推进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③虽然中俄在上合组织金融领导权方面长期胶着，但并不涉及高级政治议题，可通过双边协调和项目分工等策略来缓解，未对组织运作造成实质阻碍。在这一阶段，上合组织的内部矛盾体现了国际组织中大国间权力平衡的动态过程。

2. 扩员后的上合面临高级政治领域的直接对抗。2017 年印巴加入后，

①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② Lucie Mess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Hampered by Internal Conflicts”, October 29,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development-hampered-internal-conflicts>

③ “2025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谈在北京举行”，2025 年 6 月 4 日，https://m.mof.gov.cn/czxw/202506/t20250604_3965097.htm

上合组织的矛盾结构发生改变。中印、印巴间存在领土争端。印巴领土争端更与宗教认同、民族矛盾和水资源争端交织，难以调和。这种直接对抗也体现在上合组织运行的多个层面：在议程设置上，印度多次在峰会中试图将克什米尔问题与“反恐”挂钩，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该地区恐怖主义”^①，实际上是想将领土争端纳入组织议程。巴基斯坦则反击称印度在克什米尔“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要求上合组织介入调查。印巴在反恐与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纠结，严重削弱了上合组织的传统反恐合作功能。在机制运作上，领土争端使协商一致决策机制面临根本挑战。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以后，上合组织决议的通过效率大幅下降。2025 年 5 月的印巴冲突更是领土利益走向直接对抗的极端体现。尽管军事冲突的规模有限，但作为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仍然非常危险。上合组织只能发布“呼吁停火”的一般性声明。

因此，在印巴加入之后，上合组织面临的困难与此前的领导权博弈有本质不同：领土争端的零和性使调解难以奏效，直接挑战组织存在的基础。从比较视角来看，这与印巴冲突导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瘫痪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引领地位，上合组织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对上合组织的挑战

印巴加入使上合组织面临协调难、共识难的新困境，而领土争端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推动组织形态被迫重塑。^②这一过程体现了国际组织在面对内部冲突时的适应性危机。

1. 协商机制效率被削弱。多边机制往往难以化解零和冲突。“协商一致”原则在领土争端面前经常失效。在领导权博弈时期，成员国间虽有影响力差异，但可通过利益交换达成妥协。印巴领土争端涉及主权、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情感，妥协空间极小，导致上合协商机制经常陷入死循环。印巴分歧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上合组织曾计划建立“区域安全预警中心”，

^① “PM Modi shames Pakistan at SCO Summit in presence of Imran Khan”, June 14, 2019,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pm-modi-bishkek-sco-pakistan-1548665-2019-06-14>

^② See Sarwat Rauf, Maira Tariq, “The Bilateral Engagement of India and Pakistan at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NU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 Stability*, 2023, Vol.7, No.1, pp.1-14.

但印巴在“预警范围是否包含克什米尔”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加上成员国治理水平差异，计划至今未实现。

2. 共识基础面临挑战。在领导权博弈时期，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反恐怖、经济合作和多极化等核心目标上存在明显共识，在领土主权等核心问题上无根本性冲突。印巴加入后，双边领土主权争端也被带入了组织。虽然非传统安全和多边合作中的共识仍然存在，但也遭受了重大冲击。印巴将上合组织视为争夺国际支持的博弈平台，而非单纯的合作舞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让上合组织内部在特定议题上的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2023年，在《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SCO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30）的制定过程中，印巴提出完全对立的方案：印度利用主席国身份强调多边合作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试图限制巴基斯坦借上合“干涉”其“内政”；巴基斯坦侧重能源安全和区域整合，以应对印度在南亚合作中对其的排斥。最终印度作为主席国没有签署这一战略文本，战略仅以模糊的原则发布，缺乏可实施的细节。^①很明显，印巴的敌对叙事阻碍了上合组织共同规范的形成。

3. 组织形态被迫重塑。为应对成员国在领土主权方面的矛盾与对抗，上合组织形态被迫从一体化合作平台向“矛盾隔离型机制”转变。^②一方面，上合组织将不同议题隔离开来，把涉及印巴领土争端的议题排除在核心议程外，更多讨论文化交流、农业合作等非敏感议题。2022年塔什干峰会上首次采用“双轨议程”，印巴不参与彼此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一模式虽然避免了直接冲突，但也使上合组织内部形成“印巴对立”与“其他成员国合作”的两个平行空间。另一方面，第三方调解有取代上合调解功能的趋势。在2025年印巴冲突期间，中国支持巴基斯坦进行独立调查，俄罗斯提出帮助双方调解。中俄等“间接调解”模式虽有助于平息事态，但也使上合在安全议题上从主动的“合作推动者”转型为被动的“冲突旁观者”。

① “‘Too many Chinese catchphrases’; India doesn’t sign SCO’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July 5, 2023, <https://www.nationalheraldindia.com/international/too-many-chinese-catchphrases-india-doesnt-sign-scoss-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

② 参见阎德学：“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成就、启示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85-106页。

四、印巴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机遇

尽管挑战严峻，但上合组织成员身份的异质性与开放性特征，使其与北约等传统同盟体系区别开来，在国际秩序转型时期仍具有重要价值。领土争端虽给上合组织带来阵痛，但也迫使上合组织突破局限，在复杂的环境中探索多元合作的可能性。与欧盟和东盟的顺水推舟型合作相比，上合组织的合作形态是逆流而上，既回避矛盾，也不放弃任何合作可能。

1. 上合成员国的异质性创造了超越领土争端的合作空间。印巴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领土冲突上，也反映在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的差异上，这种差异为非敏感领域合作提供了空间。印度在信息技术、制药领域的优势，巴基斯坦在农业、纺织业方面的潜力，与中亚的能源、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互补，可通过去政治化合作项目规避传统安全问题，并为传统安全争端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 2023 年 9 月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医药合作发展大会上，印度分享了疫苗研发经验，巴基斯坦展示了区域医疗物流能力。在 2024 年 7 月的阿斯塔纳上合峰会期间，印巴两国都批准了《确保安全饮用水和卫生声明》（*Statement on Ensuring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这些合作的安全意义虽有限，但对严重对立的印巴而言，仍是难得的交流机遇。上合组织可以通过低级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在相互敌对的成员国之间积累信任。

2. 上合的开放性也能吸引更多成员来平衡内部矛盾。上合组织成员资格的开放性，虽然增加了印巴冲突所导致的安全负担，但也是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开放性使上合组织的规模继续扩大。2023 年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伊朗，既与巴基斯坦有宗教文化共鸣，也与印度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可在印巴间发挥缓冲作用。伊朗推动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STC*）试图连接南亚、中东和俄罗斯以及中亚等欧亚国家。2023 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以后，进一步把走廊计划嵌入到上合组织的发展战略之中，提出要创建“上合组织合作走廊”，把上合组织成员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这一设想既可以吸引印巴两国参与，又有可能绕开克什米尔等敏感区域，有机会为上合组织创造出新的合作路径

和问题解决方案。

五、上合组织的矛盾转化路径

上合组织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领土利益直接对抗背景下，将平衡内部矛盾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调适的转型。这一路径需要具有现实主义的谨慎，也需要大胆的制度创新。

1. 要促进上合组织的认同建设。上合组织与传统的同盟如北约等不同，也与欧盟和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不同，没有争端解决机制，没有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也没有为调解提供政治结构。所以，上合组织在面临成员国之间的高级政治议题时，缺少平台和机制。但是，上合组织可以为成员国之间提供更密切的身份认同。上合成员国普遍反对第三方介入相互之间的事务，但上合组织可以为成员国提供一个超越“第三方”的“利益相关者”身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不仅中国和俄罗斯可以施加直接的影响力，沙特这个对话伙伴国也有了更好地与双方同时接触的身份并积极在印巴之间斡旋。^①

2. 构建议题分层机制和子决策模式。上合组织应将合作议题分为领土、主权等“高级政治议题”，以及反恐、经贸等“低级政治议题”。对前者，上合可继续采用“不讨论、不介入”原则，避免触碰印巴关系红线；对后者坚持“协商一致”，推动务实合作。在反恐领域，上合组织也可求同存异，对“伊斯兰国”组织等公认的跨国恐怖组织加强打击，对印巴互相指控的地缘政治型“恐怖暴力组织”问题则不予介入。2023 年上合组织“反恐名单”就剔除了一些有争议的组织，仅保留双方公认的极端势力，使联合行动得以启动。

3. 强化“双轨对话”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复杂性以及决策机制的平等性，导致上合组织很难在同一轨道上讨论和解决问题。^②上合应在组织

^① Jesse Marks, “Can the SCO mediate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May 9, 2025, <https://jessemarks.substack.com/p/can-the-sco-mediate-the-india-pakistan>

^② 参见曾向红、赵柳希：“‘多轨上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状态初探”，《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框架内设立印巴双边对话机制等双边对话模式，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闭门磋商。这种机制将领土争端讨论限制在双边层面，以避免拖累上合组织的整体运作。2024 年 10 月，印度外长苏杰生到达伊斯兰堡出席上合组织政府首脑会议，并与巴基斯坦外长举行双边会晤。他是 2015 年以来，访问巴基斯坦的首位印度外长。这次会晤虽未达成实质协议，但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身份以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原则，为印巴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的对话空间。

4. 推动功能性合作先行。上合组织以项目合作为纽带，可以通过具体利益绑定来缓解领土争端。能源合作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合作领域。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是重要的能源消费国，俄罗斯、中亚国家、伊朗和沙特等则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这两方之间可以形成能源安全闭环。中亚的电力资源，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需要的。通过设计一个非争议路线加利益分成的方案，印巴两国有机会在能源领域实现利益共享。对于 2016 年启动的“中亚-南亚电力传输与贸易工程”（Central Asia-South Asia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and Trade Project, CASA-1000），印度虽然尚未参与，但仍然通过上合组织和双边对话显示出参与的兴趣。一旦印度最终参与，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在大型项目中协同，届时也将为双边矛盾转化提供实践基础。

5. 促进调解功能建设。目前，上合组织虽缺乏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和强制性安全承诺，但印巴的参与正推动上合探索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宗旨提供了宝贵的实际应用场景。上合组织若能成功缓和甚至调解印巴矛盾，例如通过多边平台鼓励双方交换相关信息与数据、避免公开对抗，并逐步推动对话，将极大提升组织的吸引力和国际治理机制塑造能力。

六、小 结

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时，曾有人预测上合组织将因为印巴冲突而名存实亡，也有人认为上合组织身份将推动印巴改善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两种预测都没有成为现实，上合组织继续运行良好，印巴关系则继续恶化，并在 2025 年 5 月发生了几十年未有过的军事冲突。这既说明上合组织在处理印

巴冲突这类高级政治议题时的力量局限性，也说明上合组织在面对内部挑战时的生存能力和组织韧性。印巴加入考验了上合组织宗旨的生命力和运行机制的包容性。上合组织虽经受住了考验，但调解力量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这应该成为上合组织的优先发展方向。

伊朗与上合组织： “上海精神”框架下的制度实践与挑战*

余纲正 刘雨薇**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与中小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区域性多边机制正在成为国家寻求制度保护与话语空间的重要平台。上海合作组织（SCO）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核心规范，其持续扩容与制度外延的拓展，正在重塑亚欧大陆上广大地区的区域治理格局。自 2005 年成为观察员后，伊朗于 2023 年 7 月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这一举动不仅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含义，也为检验“上海精神”这一价值表述能否转向更大范围内的制度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窗口。本文以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及其近两年来与该组织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与现实约束。充分评估上合组织处理成员多样性、跨区域安全及经济互联等问题的能力与局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其未来优化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历程

伊朗自 2005 年起公开表达加入上合组织的意愿，其战略考量主要源于长期遭受美国制裁与国际孤立的压力。历经 18 年，在国际制裁、地缘政治、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间地带’思维与凝聚全球发展合力研究”（项目编号：25LLZZB040）的阶段性成果。

** 余纲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刘雨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大国博弈及成员国态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伊朗最终于 2023 年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7 年）始于 2005 年阿斯塔纳峰会，伊朗获得了观察员国地位。同一时期，伊朗“向东看”战略显露雏形，试图借多边合作突破西方围堵。第二阶段（2008—2017 年）中，伊朗积极参与观察员会议和区域安全对话，并正式申请上合组织成员资格，但因遭受联合国制裁与部分成员国的保留态度而未果。第三阶段（2018—2021 年），在上合组织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带来的扩员效应影响下，伊朗于杜尚别峰会签署加入上合组织承诺备忘录，并获一致同意正式启动加入程序。第四阶段（2022—2023 年）伊朗顺利完成了相关法律与技术程序，并于 2023 年 7 月在新德里（线上）峰会获接纳为上合组织第九个正式成员国，确立其在该机制中的制度性身份。

成为正式成员国后，伊朗迅速活跃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层级会议与合作中，在政治、经贸、安全等领域均表现突出。2023 年加入上合组织后，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旋即出席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①同年，伊朗还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与中俄一道在阿曼湾开展“和平使命-2023”反恐军演，彰显其对地区安全协同的高度重视。此外，伊朗外长也多次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中、俄、印、巴及中亚等国的外长会晤，聚焦地区热点问题及经贸合作。这些举措不仅加速伊朗融入上合组织决策机制，也为推动自身关切的议题进入集体议程创造了有利条件，显示出伊朗对于深度嵌入多边机制、拓展安全与经济发展空间、塑造区域强国形象的强烈意愿。

二、实践“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和伊朗的合作共赢

伊朗的加入为“上海精神”的多边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体现了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治理理念。伊朗与其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310/t20231026_11169185.shtml

他成员国在安全、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了这一理念由叙事话语向制度实践的转化。

（一）互信互利：安全协作与战略空间拓展

互信和互利是“上海精神”的首要原则。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将地区安全合作视为优先事项，特别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伊朗长期应对各类极端组织，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其加入有助于扩展欧亚反恐统一战线，并在情报共享、执法协作等方面深化合作。^①例如，各成员国能依托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更好地实现跨境情报互通，联合打击恐怖网络，并通过联合演习提升协同能力。

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与区域安全稳定角色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高度重视。^②伊朗通过参与上合组织成立的“阿富汗联络小组”，与中国、俄罗斯积极协调，共同应对难民外溢、毒品泛滥等挑战。此举既增强了伊朗作为组织内安全供给者的行动参与感，又提升了上合组织在该地区的安全响应能力。此外，凭借独特的地缘位置，伊朗的加入还将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范围由亚欧内陆有效地延展到了印度洋西部的海上战略空间。自2023年以来，伊朗与中俄联合开展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不仅体现出成员国间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深度互信，也展示了上合组织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多边努力。与此同时，伊朗自身也将上合组织视为其“向东看”战略的重要支点与抵御西方压力、获取地缘政治支持的制度性缓冲。^③

（二）平等协作：政治支持与集体外交发声

依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历来秉

① “Didār-e Mas’ūlān-e Vezārat-e Omūr-e Khāreje va Safirān-e Jomhūrī-ye Eslāmī-ye Irān bā Rahbar-e Enqelāb” [Meeting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s an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th the Supreme Leader], May 20, 2023, <https://farsi.khamenei.ir/news-content?id=52860>

② Mohsen Shariatinia, “Ozviyat-e Dāyem-e Irān dar Sāzmān-e Hamkāri-ye Shānghāy: Payāmadhā-ye Amniyati va Eqtesādi” [Permanent Membership of Iran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Rahyāfthā-ye Siyāsi va Beyn al-Melali*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3, no. 9 (Spring 2022): 35–48, <https://www.noormags.ir/view/fa/articlepage/1881624>

③ Amir Mohammad Haji Yousefi, “Iran va Sāzmān-e Hamkāri-ye Shānghāy: Hermoni va Zedde-Hermoni” [Iran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rmonic and Anti-Harmonic], *Broushnāmeh-ye Olum-e Siyāsi* [Political Science Brochure] 3, no. 2 (Spring 2008): 143–193

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突发事件均恪守不介入的立场。但当外部国家的军事行动影响地区稳定甚至直接伤害成员国主权时，上合组织也及时展现出对成员国有原则的外交支持，体现制度框架内平等协作的新实践。2025 年 6 月 14 日，上合组织在其官网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以色列于前一天开始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称此举损害伊朗主权，对全球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在 6 月 22 日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联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谴责美方侵犯伊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主持正义，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和平稳定作出切实努力。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还就伊朗局势提出一项相关的安理会决议草案。上述立场代表了上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对伊朗的公开支持，打破了美西方在伊朗问题上对政治叙事的垄断。

伊朗对从上合组织获得的制度性支持表示高度重视。2025 年 6 月和 7 月在青岛和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会议期间，伊朗防长和外长先后公开赞赏中国等国给予伊朗的支持及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制中展现的“原则性与有效立场”，认为这对伊朗而言极为宝贵。^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正式请求上合组织紧急审议以色列侵略伊朗的相关局势，并鉴于“12 日战争”给予德黑兰政治支持。这些举措表明，伊朗虽然作为上合组织新成员正式入会不久，但已能以平等的姿态通过这一平台有效表达其关切，并借助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外交上的集体发声。这一外交实践，体现了上合组织机制的战略互信与平等协作精神。

（三）尊重多样文明：制度接纳与国际合法性重构

尊重多样文明，既是文化包容原则，也是对成员国差异的制度性认可机制。长期以来，伊朗因意识形态与美国所主导的秩序构想不合，而被排斥于

^① Li Shuang, “SCO Defense Ministers Convene in Qingdao Amid Rising Global Tensions”, *Tehran Times*, June 26, 2025, <https://www.tehrantimes.com/news/514962/SCO-Defense-Ministers-Convene-in-Qingdao-Amid-Rising-Global-Tensions>; “China Says It Backs Iran’s Sovereignty against Western ‘Bullying’”, *Tehran Times*, July 16, 2025, <https://www.tehrantimes.com/news/515703/China-says-it-backs-Iran-s-sovereignty-against-Western-bullying>; Saima Shabbir, “At SCO Summit, Pakistan Slams Israel for Using ‘Aggression as Tool of Policy’ in Middle East”, *Arab News*, July 15, 2025,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608177/pakistan>

大量国际和中东地区制度之外，并被塑造为“邪恶轴心”、“安全威胁”等负面形象。上合组织倡导的文明多样性，为伊朗提供了制度接纳的新渠道。

作为首个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中东国家，伊朗的制度迁入不仅体现了上合组织对多样发展道路的开放姿态，也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向多元文明演进的趋势。对伊朗来说，新的身份大幅提升了其国际合法性，有助于淡化西方“威胁化”叙事。在上合框架内，伊朗能够与各国领导人平等对话，参与联合公报和峰会宣言的起草及公布，使其政治主张与发展理念通过正式制度渠道进入区域话语体系，从而在保有政治制度特征的前提下实现对自身国际形象的再建构。

与之相应，伊朗的加入也提升了上合组织本身的文明多样性与制度代表性。作为中东最具战略影响的国家之一，伊朗参加上合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亚-南亚-中东”之间在跨区域制度建构上的壁垒，有助于形成更具互动性和连贯性的治理板块，扩大“上海精神”的文化投射范围。这种互动，不仅检验了上合组织的文化包容与制度开放，更为其他制度异质国家融入区域多边机制提供了参考范式。

（四）谋求共同发展：资源互补与互联互通机遇

“谋求共同发展”是“上海精神”的重要落脚点，体现了上合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取向，而成员国的经济体量和增长潜力是该组织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2020年“上海八国”占全球GDP份额达到23%，内部贸易额占成员国总体对外贸易额的约10%，初步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轴的稳定合作网络。

伊朗的加入不仅为其突破美西方制裁封锁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拓展了上合组织的发展空间。在能源合作这一核心领域，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是中印等能源进口大国理想的供应方。在西方压力下，能源出口既能为伊朗带来宝贵的外汇收入和投资，也有助于成员国分散能源来源风险。上合能源俱乐部机制为签署长期油气供应协议提供了可能，这也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能源互联的战略高度契合。

此外，伊朗的地缘优势可为区域贸易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关键支撑。伊朗连接中亚、南亚与西亚，毗邻里海、波斯湾与印度洋，是欧亚交通

的重要节点。上合组织的不少成员国都有意借伊朗推动跨区域走廊建设。例如，印度与伊朗合作开发的恰巴哈尔港是进入中亚市场的重要门户，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也是伊朗与俄印等国合作的关键项目之一，旨在大幅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

整体而言，伊朗与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在能源供需、市场对接与交通互联等领域互补性强。上合组织能为伊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合作“大后方”，也为成员国共同发展目标注入新动力，体现了上合组织在资源互补与互联互通方面的制度优势。

三、现实挑战与多重约束

（一）多成员立场协调的困境

上合组织在不断扩容的同时，也面临着立场多元化带来的协调难题。在涉及伊朗的相关事务上，成员国的利益和态度分歧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上合组织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朗一事上，印度就因自身外交考量而与其他成员国出现分歧。^①这不仅削弱了集体发声的力度，也映射出在其他关键议题上实践“全体一致”原则可能造成的搁置。

成员国的双边矛盾亦影响集体决策的效力。印度长期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态度，并在 2023 年担任主席国期间因认为文件“有太多中国话语表达”而未签署《上合组织至 2030 年经济发展战略》。这类分歧容易外溢至其他议题，降低组织内部的一致性。对伊朗而言，上述种种多边协调困境意味着其政策主张在上合框架内的落实可能受限；而为维护团结，上合组织在回应伊朗诉求时也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模糊或折中表述，无法达到伊朗的预期，从而引发其对组织效能的疑虑。因此，如何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增进共识，是上合组织和伊朗都面临的挑战。

（二）合作机制的碎片化

近年来，亚欧大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内及跨区域合作机制。即使

① Sachin Parashar, “Government Abandons SCO Statement Condemning Israel”, *Times of India*, June 15, 2025,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government-abandons-sco-statement-condemning-israel/articleshow/121854544.cms>

在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以组织名义整体运行的双边或大小多边合作形式。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模式限制了对新成员诉求的集中回应。同时，上合组织一直呈现“政治安全主导、经济协同补充”的机制逻辑特征，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等规划的落实，不同国家又都存在优先推进各自主导框架的倾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协调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若伊朗想融入更广阔的区域合作，需要分别与多个机制进行对接，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通过上合组织这一“统筹平台”获得红利的可能。同时，上合组织虽设有多领域部长会议和工作组，但这些机制多以政治共识为导向，执行时往往依赖各国意愿与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在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伊朗的各类诉求可能难以得到制度化落实，有时将不得不依靠非正式乃至“灰色”运转方式推进。

（三）经贸科技领域的制裁约束

伊朗虽与上合组织在合作中采取多轮驱动，但其经济和科技领域仍深受美国制裁掣肘。同时，伊朗国内也有声音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员国间经济的不对称性会进一步阻碍平等合作。^①首先，制裁导致金融合作机制难以落地，成员国银行和企业普遍担心触发次级制裁，因而倾向于回避与伊朗的大额交易或投资，导致许多合作项目目前只能停留在意向层面。

其次，在科技领域伊朗与中国企业曾开展深度合作，华为、中兴一度占据当地通信设备主要份额。但这些合作引起了美方关注、不满乃至高度政治化的干扰，几乎每一笔伊朗采购中国等国科技设备的交易都面临美国制裁或类似威胁。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严重冲击了既有合作的稳定性，也令各成员国的科技企业对未来在伊朗大规模开展业务缺乏信心。

最后，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受制裁影响而放缓。印度在恰巴哈尔港的建设投资就几经波折，伊朗铁路和公路网络现代化也因资金不足而延滞。尽管上合组织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的融资与协商平台，合作空间广阔，但当前实际成

^① Saeid Bayari, Ali Mohammad Haghighi, and Ghaffar Zarei, “Chālesh-hā-ye Ozviyat-e Dāyem-e Jomhūrī-ye Eslāmī-ye Irān dar Sāzmān-e Hamkāri-ye Shānghāy” [Challenges of the Permanent Membership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Jāme'e Shenāsi-ye Siyāsi-ye Irān* [Political Sociology of Iran] 5, no. 11 (February 2023): 2533–2550, <https://dx.doi.org/10.30510/psi.2022.336278.3310>

效受制于国际环境，仍难以成为伊朗对外经贸与科技合作真正的“避风港”。

四、结 语

随着伊朗的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不断壮大象征着多极力量发展与联合的新趋势，也在实践中检验着非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成效。对于伊朗而言，加入上合组织是其外交转型的重要一步，为其打破长期孤立、融入区域合作打开了机遇之窗。对于上合组织而言，如何最大化地吸纳伊朗、发挥集体优势，也是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试金石。未来，上合组织需要在已有的成绩中进一步守正创新，持续提升“上海精神”的国际认同程度。一方面，依托组织既有的政治互信、安全互利与经济互补，持续强化成员间的协同合作，提升组织区域执行力；另一方面，正视成员的文化多元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挑战，努力在文明与制度多样化中追求最大共识。

总的来说，伊朗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区域合作和治理的一个积极样本，体现了制度重构与国家间战略互动的良性循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合组织更加需要坚持关注“上海精神”制度实践，直面存在的困难和挑战，行稳致远，实现真正的共赢，为构建更加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的地区和国际新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undergoing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tively adjusting it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Evolving from a regional mechanism initially centered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SCO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ncompassing politics, economy, secur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 Guided by the “Shanghai Spirit”, the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a region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respond proactively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its expansion. Looking ahead, the SCO mus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nhancing efficiency, build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its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of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provide a “Shanghai Cooperation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Shanghai Spirit”, the SCO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ережива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новации, активно корректируя сво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Изначальн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ШОС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комплексн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множество областей, включая политику, экономик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феры.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шанхайским духо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епрерывно содействует построен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укрепляет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 а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 решает задач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расширением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ШОС должна найти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повышением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консенсуса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новациями с целью лучш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общим интересам св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продвигать реформы в систем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предлагать «решение ШОС» дл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ШОС,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中亚地区研究

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 动因、目标与困境

许 涛*

【内容提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开始，中亚五国开启了构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至今，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 34 年。在这个并不算漫长的时段里，中亚各国均选择了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建立起集中高效的总统制政权体制，在原苏联经济体统断裂的废墟上重构了基本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并以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与国际社会保持了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亚地区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和诸多热点地区相邻的特殊地缘位置，周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均或多或少地对五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特定影响。随着中亚各国独立后政治、经济、安全能力建设的不断完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受制于外力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弱。尤其在近几年里，国际格局的重大改变正在撬动中亚国家所在的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些变化一方面促使中亚国家加速补齐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短板，提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整体能力；另一方面，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调整，也为中亚国家产生战略自主的冲动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当大国间对抗与冲突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升级时，作为传统意义上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正成为各大战略力量争取的目标。而中亚国家内部加快实现社会转型和修复各国间睦邻关系，也使得这种自信达到了独立以来的最高程度。这是中亚五国独立后出现的重大地区变量之一，其影响也将是深刻而复杂的。

【关键词】中亚五国 民族国家构建 战略自主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042(24)

* 许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尽管在中亚地区的古代和近代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控制区域和影响范围不同的民族政权，但构建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历史却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正式开始的。被视为导致苏联最终发生政治分裂起点的“八一九”事件后，虽然中亚各共和国从1991年8月底到10月下旬纷纷宣布独立，并公布了各自的首部宪法，但直到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和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之前，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都仍在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阻止、推迟这个超级大国的解体。曾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哈最高苏维埃主席、并于1991年12月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此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态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据知情者回忆，一方面，纳扎尔巴耶夫在“八一九”事件前后拒绝加入叶利钦、舒什凯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组成的小集团；另一方面，在上述小集团于12月8日举行别洛韦日秘密会议时，纳扎尔巴耶夫却又听从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并未出面阻止这一最终摧毁苏联的协议的达成。^①这种矛盾而纠结的心态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他中亚共和国领导人身上：既不希望继续受苏联集权体制的束缚，也不愿失去这个庞大帝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能够提供的庇护。于是，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在已知苏联解体大势不可挽回的现实面前，于12月12日举行阿什哈巴德会议，主动提出以“平等发起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策划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②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国家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没有参加和格鲁吉亚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外，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11国领导人共同举行阿拉木图会议，并联合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辞去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解体。

简单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当时中亚国家领导人普遍表现出的游离态度和徘徊心理，而且在中亚各国元首之间也有着立场和态度上的差别。理

① Ольга Кузьми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разваливали, а убивали: политик Сергей Бабурин – о «разрушении» СССР. 27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vm.ru/politics/1199321-sovetski-j-soyuz-ne-razvalivali-a-ubivali-politik-sergej-baburin-o-razrushenii-sssr>

② 邢广程：《崛起的中亚》，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4页。

解他们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不同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的表现，必须考虑到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共和国与三个斯拉夫大国间存在的差异。作为被纳入苏联的一个边远区域，中亚地区在集权体制下所拥有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基本国家职能是并不充分的。从 1918 年苏联第一部宪法关于联盟各共和国基本主权的規定有：一切外交事务归苏联管辖，军事、对外贸易、铁路和邮电等由苏联领导；内政、农业、教育、司法、社会保障、卫生等由各共和国直接管辖。直到 1990 年的最后一部宪法，上述基本原则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①如果说在领导政治、外交和安全事务方面没有充分权力这一点与其他苏联共和国并无多大不同的话，那么中亚地区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分工”和“国民经济专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苏联经济的原料生产基地则是一种独特的境遇。尤其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亚各共和国的棉花、生丝、羊毛产量分别占全苏联的 95%、61.7%、40%，而附加值较高的棉布、丝绸、毛织品产量却只占 6.1%、10%、2.5%。^②这不仅意味着中亚共和国没有获得苏联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而且还出现了在中亚地区原油、天然气、棉花、小麦等资源不断运往苏联欧洲部分的同时，各中亚共和国却要按配额从俄罗斯等地运回成品油、粮和纺织品的现象。这些长期存在的历史现实大大制约了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基本国家能力建构的完整性，也给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实现战略自主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然而，近十年来全球变局的加速演进，使中亚地区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亚各国高层纷纷表现出提高战略自主能力的冲动。

一、激发中亚国家实现战略自主的基本动因

中亚国家已经走过了 34 年的独立建国历程，基本完成了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体系重构。由于这一过程是从原苏联强大的集权政治文化和

① 王志华：“苏维埃宪法的历史命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② Хлопковый ад. Советская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давала стране «белое золото», а ее население жило в нищете. 17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dzen.ru/a/X9qH8ddx5SsD6wu5?ysclid=mc7hmf0sw4944581964>

计划经济体系的废墟上起步的，重新拼凑和启动旧国家机器碎片的难度比想象的要高得多。

首先，中亚各国领导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1992年5月，土库曼斯坦通过了首部宪法，规定土库曼人民委员会（Халк Маслахаты）为最高代表机关，并由50名议员组成议会（Меджлис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而且规定了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条件。^①乌兹别克斯坦于1992年12月通过首部宪法，最高代表机关和立法机关为共和国议会（Олий Мажлис），总统可以任免总理等内阁成员，提名宪法法院主席和法官，并且可以在获得宪法法院同意时解散议会。^②哈萨克斯坦在1993年1月通过的首部宪法中保留了最高苏维埃，但总统有权向最高苏维埃提名部长会议主席、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仲裁委员会主席等人选，并且有权向最高苏维埃申请解除上述官员的职务。^③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总统的权力是高于议会和政府的。1993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通过首部宪法，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的规定与哈萨克斯坦类似，保留了最高苏维埃，并规定，可根据宪法法院的评估，以不少于总数三分之二的代表票数解除总统职务。^④塔吉克斯坦由于高层出现政治分歧，到1994年11月才出台第一部宪法，基本确立了总统制政体。但由于反对派势力制衡，宪法对总统权力有多处限制。

这种在独立建国之初的特殊时期根据各自不同国情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磨合，甚至出现过反复和重启，但它们基本完成了刚刚取得主权独立的中亚国家与原苏联政体切割、阻止社会继续分裂和拯救国民经济的主要使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巩固，尽管中亚各国之间在政体建设上已有较大差异，但坚持总统制政体至今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在这一期间，中亚各国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基本实现了由首任总统向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力交接。

①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507页。

② 同上，第518页。

③ Закон Казах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т 24 апреля 1990 г.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пос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и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http://online.zakon.kz>

④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449-450页。

由于总统制权力结构除了执行力强和行政效率高等特点外，苏共的集权政治遗产与中亚游牧历史上部族政治文化传统聚合，在各国形成了以总统家族为核心的固化利益集团，这就使国家权力交接过程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往往会由政治斗争引发社会动荡。以总统、政府、议会换届为节点发生的政权非正常更迭，在中亚国家几乎成为普遍现象。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中亚各国逐渐排除了内外干扰，不断调试适合政体的模式。而且各国领导人纷纷推出不同的社会改革政策，以期实现与前任的代际交割。

哈萨克斯坦经历“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总统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原“超级总统制”权力架构的政治改革措施，提出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他在对骚乱制造者和参与者进行有限清算后提出，“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不断寻找罪人”，表现出一种政治自信。^①乌兹别克斯坦于 2024 年 10 月成功举行议会立法院（议会下院）选举，共产生 150 名议员，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获得 64 席，“民族复兴”民主党获得 29 席，“公正”社会民主党获得 21 席，人民民主党获得 20 席，生态党获得 16 席。约 2000 万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达 74.72%。^②这次选举标志着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持续 7 年的政治改革成果通过立法形式被确立下来，也意味这场旷日持久的改革已经接近圆满收官。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独立后在政治上最不稳定的国家，2020 年始任总统的扎帕罗夫执政第二年即通过新宪法，将华而不实的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坦率地指出，独立后的三十多年里曾经发生了三次“革命”，而起因都是由于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因此，他认为选举制度和方式必须改善，“还给人民一个干净的选举，以前的情形也不会再发生”^③。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 2024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

① Посла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асым-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1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www.akorda.kz/ru/poslanie-glavy-gosudarstva-kasym-zhomarta-tokaeva-narodu-kazahstana-ekonomicheskij-kurs-spravedlivogo-kazahstana-18588>

② ЦИК: явка на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оставила 71,52%; ЦИК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явка на выборы в нижнюю палату парламента составила 71,52%. 27 октября 2024 г. <https://ria.ru/20241027/tsik-1980367749.html>

③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ыборы в парламент: президент страны опаса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уверяет, что выборная система улучшилась и теперь народ должен сам выбирать власть. 1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golos-naroda.kz/40289-v-kyrgyzstan-e-vybory-v-parlament-prezident-strany-opasaetsia-ocherednoi-revoliutsii-1731846591/>

“今天塔吉克斯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方案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确保国家安全和可持续经济发展，这是塔吉克斯坦国家和政府政策的最高目标。”^①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小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于 2024 年 2 月在内阁扩大会议上批准了《土库曼斯坦 2024 年社会经济发展和投资纲要》。随后，在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老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主持下，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也于当月举行会议，讨论了实施这一纲要的优先事项。^②不同形式的政治改革均得到本国民众的高度支持，也使中亚各国领导人坚定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政权建设路径的信心。

其次，独立后必须马上着手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经济架构。从断裂的原苏联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重建起独立的国民经济格局，似乎比摆脱旧式计划经济体系更加困难。尤其是在独立建国初期，中亚国家在已经没有苏联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治理本国经济。作为刚刚独立的经济体，由于原来在全苏计划经济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产业单一性缺陷，中亚各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都遭遇了空前的困难。尤其是从 1992 年开始，中亚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都出现两位数以上的持续下滑，到 1995 年时跌入谷底，多数国家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比苏联时期下降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甚至高达 2000%（见表 1）。

为了摆脱危机，中亚各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特点，开始了与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相切割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价格自由化、企业私有化、货币自主化等方式，各国以激缓不同的节奏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同时，在农业领域扩大替代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产量，降低品种单一的依赖性风险；在资源领域与欧美国家积极合作，用合资或特区等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社会领域鼓励赴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劳动务工，既解决国内大批劳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уважаемого Эмомали Рахмона 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28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khovar.tj/rus/2024/12/poslanie-prezidenta-respubliki-tadzhikistan-uvazhaemogo-emomali-rahmona-ob-osnovnyh-napravleniyah-vnutrennej-i-vneshnej-politiki-respubliki-3/?ysclid=m7gc2rhw52519273016>

② Намеченные планы будут выполнены. 2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mejlis.gov.tm/single-article/264?lang=ru>

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又为本国带来大量外汇收入。^①尽管这些应急之策也造成了产业发展不平衡、对国际市场依赖、行业寡头滋生等后患，但到 21 世纪初，中亚各国基本走出了经济负增长的局面。

表 1 中亚各国独立后经济发展趋势（单位：百分比）

中亚国家	发展指标	1992 年	1995 年与 1990 年相比	1997 年
哈萨克斯坦	国内产生总值	-22.6	-55	1.9
	工业产值	-23.7	-52	
	基本建设投资	-47	-83	
	商品零售额	-33.4		
吉尔吉斯斯坦	国内产生总值	-13	-50	10
	工业产值	-13.8	-68	
	基本建设投资	-35	-59	
	商品零售额	-59		
塔吉克斯坦	国内产生总值		-50	
	工业产值	-24.2	-52	
	基本建设投资	-42	-79	
	商品零售额	-74.1		
乌兹别克斯坦	国内产生总值	-11.1	-18	3.9
	工业产值	-6.7		
	基本建设投资	-32	-45	
	商品零售额	-44.9		
土库曼斯坦	国内产生总值			
	工业产值	-14.9	-35	
	基本建设投资		-60	
	商品零售额	-36.2		

资料来源：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第 122 页。

① 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报告的数据，2024 年移民汇款占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45%，在吉尔吉斯斯坦占 24%，在乌兹别克斯坦占 14%。См. 45% ВВП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составил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Ритм Евразии. 7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www.ritm Eurasia.ru/news--2025-03-07--45-vvp-tadzhikistana-sostavili-denezhnye-perevody-vsemirnyj-bank-78976?ysclid=mcbwlo5v4571219559>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亚各国分别将自己的资源优势用到了极致，不仅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经受住了历次地区或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尤其在最近十年间，欧亚地区出现若干大国战略对抗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焦点，受到制裁和封锁的俄罗斯国际贸易份额向中亚国家分散和转移。得益于这一机遇，中亚地区经济出现了疫情后的高增长势头，平均增长率达到 4.8%。不仅 2023 年好于世界经济增长平均水平（3.4%），而且 2024 年地区 GDP 总值首次超过 5000 亿美元大关。2024 年年底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报告，对 2023 年到 2025 年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评估和预测（见表 2）。类似评价也出现在其他国际机构的评估报告中，这些数字无疑大大提振了中亚国家社会各界独立发展的信心。

表 2 亚行对中亚各国 2024—2025 年经济发展的评估和预测

时 间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2023 年	5.1%	6.2%	8.3%	6.3%	6.0%
2024 年 4 月	3.8%	5.0%	6.5%	6.5%	5.5%
2024 年 9 月	3.6%	6.3%	6.5%	6.5%	6.0%
2024 年(预测)	4.5%	8.5%	7.5%	6.3%	6.5%
2025 年(预测)	5.5%	7.0%	7.0%	6.3%	6.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自制。^①

最后，中亚各国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需要完成的另一项重要工程，就是以怎样的形象和方式加入国际社会，并与世界各大权力中心建立起有益的互动关系。由于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远离海洋的内陆特性阻碍着历史上中亚民族与世界的主动交融；另一方面，处在世界各大文明交会十字路口的特性，又造成每每有强权中心在欧亚大陆上崛起时必然覆盖这一中间地带。亚历山大的东征，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西征，波斯帝国和阿拉

① АБР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анные на 2024-2025 годы.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берегательный Банк. 25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economist.kg/ekonomika/2024/09/25/abr-proghnoziruiet-ekonomichieskii-rost-v-tsientralnoi-azii-dannyye-na-2024-2025-ghody/?ysclid=mcbxak4zrl995514538>

伯帝国的扩张,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殖民争夺,外来强势文明入侵在造成无数次本土文明发展路径改变甚至中断的同时,客观上又以域外文明中具有先进性的成分推动了中亚社会的进步。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域外强权政治文化对中亚地区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制度性影响,中亚各国又回到了曾经的历史逻辑之中:主动借助域外强权的关注与介入以弥补自身突破地缘困境内力不足的缺陷。

中亚国家在独立后急需得到世界各国承认和争取国际援助。采取灵活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是它们最好的选择。哈萨克斯坦在建国初期将对外政策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大国关系,重点在俄、中、美、欧之间;二是中亚国家,与邻国关系保持长期稳定;三是独联体国家,在经济联系基础上拓展合作;四是“突厥语国家”,借文化认同和历史叙事推动经济合作;五是亚洲国家,首先是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地区强国。^①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继承了俄苏在中亚地区遗留的大部优势资源,在经济和政治上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甚至被西方认为是中亚“地缘政治的支轴之一”^②。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制定的对外政策排序为:与美国等最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努力发展加强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多方面合作关系;与俄罗斯保持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联系。^③2005 年的“安集延事件”后,向美欧倾斜的方针出现重大调整。2016 年年末,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开放度大大提升。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为了尽快被国际社会接受,曾不顾社会现实追捧西方国家标榜的民主标准,同时也在对外关系上无原则地扩大开放,致使大量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充斥所有国家肌体和所有社会角落,也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地区总统权力非正常更迭频次最高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因为在独立初期曾发生过 5 年的内战,而且与长年战乱的阿富汗毗邻,在安全上一直依赖俄罗斯驻军,自然在大国平衡的天平上让俄罗斯占得更多权重。而土库曼斯坦为了规避复杂国

①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9. №.7. <https://interaffairs.ru/jauthor/material/2212?ysclid=mcua ggmsuf6615 04040>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71 页,第 198 页。

③ Хидоятов Г. А. Основны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ашкент: УМЗид, 2002. С.321.

家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首任总统尼亚佐夫提出“政治上中立，经济上对外开放”的原则，^①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了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国地位。^②

中亚国家采取多边平衡外交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里经过了多次调整。经过这三十多年来的外交实践，中亚各国不仅开辟了必要的国际空间，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十年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战略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科技革命继续快速深化，带动产业和财富布局重构，全球治理体系也出现深刻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区与全球范围内原有的隐性矛盾被大量激活，甚至引起大国间直接的对抗与冲突。为了能够在这一系列的大国博弈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中亚各国政治精英敏锐地观察到，一向被视为中间缓冲地带的中亚地区正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战略空间。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这一微妙变化：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知中“边缘地带”的中亚地区，正在出现向战略影响力意义上的“枢纽地带”缓慢“位移”的迹象。^③尤其是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在2022年的陡然升级和持续延宕，更是加速了对这一地缘政治趋势的人为催化。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以来对欧亚地区乃至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的突发事件，但就对于中亚地区的重大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引起了中亚国家（首先是哈萨克斯坦）在领土和主权上的联想与焦虑；二是美欧国家为确保对俄罗斯制裁与孤立的效果，对中亚国家加大了诱拉力度；三是在特殊的地区市场条件下，中亚国家经济遇到了难得的窗口期而表现出色。中亚地区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变乱交织中的角色变化，使传统的和新兴的、全球的和地区的权力中心纷纷考虑升级与其原有的关系。从2022年10月开始，直至2025年4月，俄、美、欧等大国竞相把与中亚国家的外长级“C5+1”对话

① Эдуард Петров: Сапармурад Ниязов: «Мне известен маршрут в «золотой век» моей стран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 октября 1999. г. <https://www.ng.ru/ideas/1999-10-27/niazov.html?ysclid=mdr5d8yk8h169093257>

② Каменев С.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2. №.2(20). http://www.ca-c.org/journal/2002/journal_rus/ca-c-02/05.kamru.shtml

③ 苏畅：“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126-145页。

机制升级为国家元首级别。^①日本和韩国也早已释放出即将与中亚国家元首举行第一次“C5+1”峰会的信息。^②俄罗斯已经确定了将与中亚五国元首在 2025 年 10 月于杜尚别举行第二次“C5+1”峰会的大致日期。^③这一局面不仅是中亚国家独立后从未达到过的元首外交成就,甚至也是近代中亚各民族早期政权与周边殖民列强平衡周旋时期也不曾有过的盛况。仅此一项史无前例的傲人指标,就足以大大提振中亚各国民族精英们的自主意识。

二、中亚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主要目标与路径

在基本完成和巩固了政治、经济、文化主权建设后,历史遗产和地缘局限使得中亚国家在面对地区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急剧裂变时仍缺乏主动应对能力。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独立建国努力后,近 10 年来,中亚各国正在向预设的主要目标积极寻求可行途径。

(一) 构建独立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

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亚地区诸民族文化因多次遭遇强大外来文明的介入和影响而呈现碎片化特征。中亚五国独立后,填补苏联时期意识形态清空后的空白,树立以本国主体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国民身份认同成为各国领导层和文化精英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工作。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

① См.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о встреч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участников перв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1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598>; Итоги саммита глав США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экспертные оценки. 20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casp-geo.ru/itogi-sammita-glav-ssha-i-stran-tsentralnoj-azii-ekspertnye-otsenki/?ysclid=mcfxwx29ry432315156>; Итоги первого самми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ЕС»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5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5/04/05/itogi-pervogo-sammita-centralnaya-aziya-es-v-sa-markande>

②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Япония»: почему в мире 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к региону. 9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ru.sputnik.kz/20250628/fermery-zapadnogo-kazakhstana-potrebovali-ot-mineko-logii-prinyat-mery-po-saygkam-55170302.html>;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Южная Корея –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йдет в Сеуле в 2025 году. 16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eurasia.today/announcements/pervyy-sammit-yuzhnaya-koreya-strany-tsentralnoy-azii-proydet-v-seule-v-2025-godu/?ysclid=mcfyd3e2hf486136910>

③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ройдет осенью 2025 года. 24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ritm Eurasia.ru/news--2025-04-24--sammit-rossija-centralnaja-azija-projdet-osenju-2025-goda-79913?ysclid=mcfjbrxzc416904533>

亲著被誉为“当代土库曼人精神指南”的《鲁赫纳玛》（«Рухнама»），从史学和文学的视角讲述了土库曼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甚至规定了每个土库曼斯坦公民“都应勤劳、耐心、善于与邻居和其他人相处、诚实、尊重长辈、尊重父母。”^①这部书曾发行了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中文版《鲁赫纳玛》的首发式于2006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②而且当时土库曼斯坦政府还规定，驾校学员要用16小时学习《鲁赫纳玛》，并须通过笔试；中小学生在早上8时要集体诵读《鲁赫纳玛》；新婚年轻男女在婚礼上要诵读《鲁赫纳玛》。2005年8月，土库曼斯坦政府租用一颗由俄罗斯“第聂伯”号运载火箭发送的卫星，将《鲁赫纳玛》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送入太空。^③现在看来，虽然尼亚佐夫总统的这些做法有些匪夷所思，但也可以体会到，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为构建新的国族认同和树立全民文化自信也是煞费苦心。出于同样的目的，中亚各国根据本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分别推出各自的英雄时代。吉尔吉斯斯坦把《玛纳斯》（«Манас»）民间说唱奉为吉尔吉斯民族的“荷马史诗”，并为这部作品专设国家纪念日，将其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而且为之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现任总统扎帕罗夫表示：“如果说国旗、国徽和国歌是国家的象征，那么《玛纳斯》史诗是民族认同的象征，是吉尔吉斯斯坦多民族意识形态的源泉。”^④米尔济约耶夫接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提出了“第三次文化复兴”的概念。他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有过两次文化复兴，第一次是9—12世纪的东方文化复兴（Восточный Ренессанс），第二次是14—16世纪初的帖木儿文化复兴（Темуридский Ренессанс），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正在经历的是以技术飞跃、教育改革、意

① «Рухнама» – Книга духа, 7 декабря 2016 г. <https://vestnik-sadovoda.ru/index.php/puteshestviya-poezdki/1132-turkmeniya-rukhnama-kniga-dukha-dukhovnosti?ysclid=mchjbmxd7551597538>

② “纪宝成校长在《鲁赫纳玛》一书首发式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4月4日，<https://www.ruc.edu.cn/news/focus/7080.html>

③ «Рухнаму» запустили в Космос. Альфа Центавра объявила нейтралитет. 28 августа 2005 г.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125216840>

④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поздравил кыргызстанцев с Днем эпоса «Манас». 4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kyrtag.kg/ru/interview/sadyr-zhaporov-pozdravil-kyrgyzstantsev-s-dnem-eposa-manas?ysclid=mchp4pnqjd776879348>

识更新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文化复兴。^①托卡耶夫于 2019 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后,提出要围绕术赤汗(Джучи,成吉思汗长子,金帐汗国奠基人)陵墓打造草原历史文化旅游品牌,后决定拨款 35 亿坚戈(约合 6500 万人民币)修建“术赤历史文化综合体”。2024 年 4 月,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在突厥斯坦市举办“金帐汗国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托卡耶夫总统在亲自致信大会表示祝贺的同时,特别强调“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人”。^②这一观点虽然在学界引起了争议,但在受到“历史上的哈萨克斯坦是否有过国家”的质疑时,其文化主权和地缘政治宣示的含义耐人寻味。

(二) 塑造有利的区域一体化小环境

作为一个共同的地缘空间,中亚地区有许多重要的发展资源是很难按国界分割的,如水资源问题、矿产资源问题、交通基础设施问题、边境和领土问题等。由于 1924—1936 年苏联中亚共和国划界时,其原则和目的并非为了厘清几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实现中央政府统一治理之下的最佳行政区域划分。因此,在一些本来已经形成高度整合的地区完成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切割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采取了模糊处理、中央协调的方式等粗线条解决方案。然而,当中亚五国独立后认真面对这些问题时,矛盾、纠纷、冲突一度成为中亚各国关系的一种常态。近年来,中亚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国家关系的恶性循环已经是影响地区各国发展的重要障碍。但这些问题均涉及中亚各国的实际利益,或关乎国计民生,或关乎局部安全,或关乎执政地位,尤其是民粹主义在各国国内形成社会思潮时,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都不愿主动作出让步。2022 年 9 月和 10 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甚至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烈度最强的军事冲突。^③可见在努力良化地区小环境的道路上迈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м 29-й годовщин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31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president.uz/ru/lists/view/3824>

② Сообща открывать «белые пятна» истори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ош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и её наследие». 30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www.kp.ru/daily/27600/4925932/?ysclid=mchqttylh5549502547>

③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на таджикско-кыргыз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сторон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16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rus.ozodi.org/a/32036295.html>

出的每一小步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2017年11月10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中亚：同一过去和共同未来，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国际研讨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提出举行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成立“中亚国家领导人协会”

（Ассоциация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的建议。^①该倡议得到了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积极响应，他提出在2018年3月由哈萨克斯坦主办首届峰会，还将会议名称更改为“中亚各国领导人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18年3月，第一届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最终商定的会议名称）在阿斯塔纳举行。^②这是中亚国家独立后第一次在没有域外大国势力参与下闭门讨论本地区问题的会议。中亚五国的元首们将共同的历史生活和文化传统作为契机和引领，逐渐将议题向水资源、能源、交通、边境、环保等广泛领域深入。有观点认为，五国元首峰会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亚一体化阶段的开始。^③自2018年至今，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已经举行了6届（2020年因新冠疫情停办一次）。土库曼斯坦最初以中立国策为由只派议长参加，而在2023年却主动承办了这一年的中亚峰会。在2024年8月于阿斯塔纳举行的第六届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上，托卡耶夫总统提出了建立统一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并认为“现在是将中亚地区不仅仅定位为亚欧之间的纽带，而且是国际关系的独立区域行为体和能够对全球产生吸引力之新中心的时候了。”^④为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едложил создать Ассоциацию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3 ноября 2017 г. <https://eurasia.expert/uzbekistan-predlozhit-sozdat-assotsiatsiyu-glav-region-ov-stran-tsentrallynoy-azii/?ysclid=mcii2sxx4v400833036>

②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прошла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5 марта 2018 г. Узбекистан. <https://president.uz/ru/1571>

③ Казанцев А., Каженова А. Новый этап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3 декабря 2019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novyuy-etap-tsentrallynoaziatskoy-integratsii/?ysclid=mcii0s3w4j613297662>

④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Касым-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состоялась VI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9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akorda.kz/ru/pod-predsedatelstvom-kasym-zhomarta-tokaeva-sostoyalas-vi-konsultativnaya-vstrecha-glav-gosudarstv-centralnoy-azii-971327?ysclid=mciiqppikc276203722>

了推动中亚国家之间最复杂问题的解决，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率先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邻国划定边界，将此前 85% 以上的未定边界确定下来。2025 年 4 月初，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交界处树立了一座友谊纪念碑，三国总统一同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共同签署了友好条约和共同宣言。^①很难想象，两年前在这里曾发生中亚国家独立后最严重的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仅在两年后却历史性地解决了曾长期困扰三国的边境纠纷，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这个地区互动平台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

（三）主动参与地区及全球治理议题

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的不断完善，中亚地区长期受域外政治、经济、安全因素的影响已是各国领导人不能继续无视的问题。为积极主动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近年中亚国家领导人充分利用不同的国际场合，高调宣示本国及地区的安全诉求和发展理念。

2019 年 9 月，刚刚接任哈萨克斯坦总统职位的托卡耶夫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参加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他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时指出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一是不同地区的冲突不断发生，紧张局势升级使世界处于全面军事对抗的边缘；二是全球及地区大国间缺乏信任，削弱了安全治理架构，导致军备竞赛死灰复燃；三是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和全球债务危机正在扭曲全球经济格局；四是环境退化已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中亚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带来严重的生存挑战。为应对地区冲突和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他提出了哈萨克斯坦方案和倡议：第一，通过国际合作派出“朱桑”人道主义特别使团，解救 595 名被恐怖主义势力控制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其中包括 406 名儿童），帮助他们从叙利亚战区返回祖国家园；第二，哈萨克斯坦为叙利亚实现和平提供磋商平台，在阿斯塔纳举行第 13 轮谈判；第三，由哈萨克斯坦发起一项“行为守则”（Кодекс поведения），并呼吁世界各国加入这一守则，旨在在 2045 年联合国成立一百周年之前实现一个没有恐怖主

^① Кыргызстан,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укрепляют дружбу: открыт монумент единства. 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ehokg.info/kyrgyzstan-tadzhikistan-i-uzbekistan-ukreplyayut-druzhbu-otkryt-monument-edinstva/?ysclid=mcirir0g22216653096>

义的世界。^①

2023 年 9 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出席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时提到，根据相关预测，到 2050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冰川面积将减少一半，到 2100 年冰川将完全消失，中亚地区乃至世界都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威胁。吉尔吉斯斯坦依托联合国 2022 年通过的“关于山区可持续发展决议”，制定了“2023—2027 年山区发展五年纲要”的国家路线图，将全球、地区和国家活动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和措施。^②

2025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主办了世界议会联盟第 150 届大会。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发言中谈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冲突对全球和区域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坚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与和平谈判解决任何冲突和矛盾，希望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谈判进程取得积极成果，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等。同时，他认为阿富汗问题不能被忽略，重要的是不能使阿富汗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应与阿现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将阿富汗视为中亚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2025 年 5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直属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外交部和工商会组织在毗邻阿富汗的铁尔梅兹市举办了“2025 年铁尔梅兹对话”，中心议题是加强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联系，“建设和平、友谊和繁荣的共同空间”。会议具体讨论了跨阿富汗交通运输走廊、扩大中亚—南亚贸易和促进阿富汗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等问题。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团长奥通巴耶娃（Роза Отунбаева，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以及包括来自中国等 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着力推出一种理念：铁尔梅兹作为历史上连接中亚与南亚的重要枢纽，在今天的跨地区贸易、交通、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中重新发挥核心作用，将有利于整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асым-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на Общих дебатах 74-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24 сентября 2019 г. https://www.akorda.kz/ru/speeches/external_political_affairs/ext_speeches_and_addresses/vystuple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hstan-kasym-zhomarta-tokaeva-na-obshchih-debatah-74-i-sessii-generalnoi-assamblei-onn?ysclid=mcjssw8tft152125605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выступил на 78-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19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president.kg/ru/news/21/24699>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на 150-й Ассамблее Меж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го союза. 7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president.uz/ru/lists/view/8034>

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①中亚国家独立后，为扩大影响曾主动设置地区和全球性议题，如召开亚信会议、举办世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等。但近 10 年来此类活动的频次大大增加，影响实效也明显增强。

三、仍然制约中亚国家实现战略自主的问题

三十几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独立国家主体的成熟毕竟不算长，而就一个地区整体格局的重构而言就更显得过于短暂。尽管目前中亚国家的综合国力总体建设的确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这并不等于已达到总体完善的水平。尤其是在地区及世界进入动荡和冲突频发的时期，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风险并不能完全与已有的发展成就相抵消。而中亚各国所处的特殊地缘条件决定了外部强势影响参与地区政治格局构建的必然性，也从另一个侧面注定了确立战略自主能力将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甚至漫长的过程。

比如，中亚国家在独立建国初期，为保障新生政权巩固和重构国民经济体系而大量消耗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政体以遏制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抬头，依托能源和矿产以阻止经济的不断下滑，借用民粹主义抬高主体民族地位以促成国家身份认同，这些带有明显应急和实用特点的各项举措在短期内达到政策目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在总统家族周围形成尾大不掉的固化利益集团，侵蚀了大量的国家权力和财富，造成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出口，不仅使本国经济长期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低端，而且较早出现了环境赤字；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政策性刺激人口增长，使中亚地区总人口比独立时增加了 1/3 多，各国公民平均年龄低于 30 岁，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现实给就业、减贫带来难度，大量赴海外打工的劳动移民收入甚至可以占到一国年 GDP 的 45%。^②很显然，致力于达到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

① Термезский диалог 2025: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жной Азией. 22 мая 2025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5/05/22/termezskiy-dialog-2025-ukrepleniye-svyazey-mezhdu-tsentralnoy-i-yuzhnoy-aziyey/>

② В 2024 году переводы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составили 45% ВВП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7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5/03/07/v-2024-godu-perevody-trudovyh-migrantov-sostavili-45-vvp-tadzhikistana>

展短期目标的措施客观上产生的一些附带效应，经三十多年的积累仍未找到释放出口的现实，势必掣肘战略自主能力的构建。

表 3 中亚国家人口增长一览表（单位：万人）

国 名	1991 年	2025 年	2030 年(预估)	2050 年(预估)	现平均年龄
乌兹别克斯坦	2074.21	3636.18	3831.32	4559.31	26.3 岁
哈萨克斯坦	1652.21	2059.26	2112.82	2560.99	29.3 岁
塔吉克斯坦	535.74	1059.10	1142.14	1520	22.7 岁
吉尔吉斯斯坦	441.8	718.60	743.53	942.68	25.3 岁
土库曼斯坦	372.01	749.45	703.47	826.38	25.6 岁
总 计	5076.03	8222.59	8533.30	10409.48	25.84 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亚人口网（Central Asia Population）资料自制。^①

又如，依然普遍存在的俄罗斯因素影响仍是中亚国家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如果从 1822 年沙俄当局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算起，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政治文化对中亚地区的制度性影响持续了 170 年之久。在近代历史上，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征服给这里带来的不仅仅是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文化的影响，经过本土化改良的欧洲工业文明和市场观念也被植入了中亚各地长期封闭的社会。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尽管是不彻底的，但为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俄国工业革命扫清了主要障碍。欧洲资本的运作方式和大机器生产的经营模式扩大了俄国人对原料与市场的需求，从彼得一世时就开始被长期觊觎的中亚地区成为其征服远东地区后陆路扩张的又一优先方向。沙俄帝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也把基于大工业文明的先进科技、制度、文化带了进来，在军事殖民制度的保障下，这些新进事物很快在当地得到了各民族精英层的认可。十月革命后，沙俄时代保留的希瓦、布哈拉两个汗国也被最后攻灭，苏维埃制度彻底取代了中亚部族的封建王权。苏联在中亚地区划界的成功，意味着本土文化又一次遭到全面碾压。

^① Central Asia Population.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central-asia-population>

尤其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唯一能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强盛苏联的历史，至今仍有许多中亚籍苏联遗老为之唏嘘扼腕。这 170 年的中亚历史，为俄罗斯的影响力埋下深厚根基。尽管苏联解体已有三十多年，这种影响的确也在不断衰减，但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巨大存量，中亚各国对外政策依然不得不把对俄关系放在首位。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中亚国家出于对自身主权和领土安全的担忧，纷纷表现出对俄罗斯的戒备心态，同时在外交上也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在对待俄乌冲突问题时，既不承认乌东四州独立，也不加入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大合唱；^①在对待俄语文化影响方面，一面放弃使用西里尔字母，^②一面又在俄罗斯元首来访时同意增设更多的俄语学校；^③在对待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一边无一缺席地赴莫斯科参加 5 月 9 日的红场胜利日阅兵，一边又有意回避苏联卫国战争这一集体叙事，甚至将卫国战争胜利日改称为“民族和谐日”、“纪念与荣誉日”等。^④在确立对俄罗斯关系的立场和政策上如此纠结和拧巴，明显反映出一种战略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不足。

再如，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对美欧在本地区的影响一向十分在意，以至于长期将其视为实现多元平衡外交的重要借用力量。首先，对于美欧在中亚地区制衡中俄、遏制南亚极端主义、“改造后苏联空间”等主要地缘政治目标，中亚国家基本持包容和默许的态度。但是美欧在中亚地区推进上述目标的政策又与其“民主和平等”驱使下的软实力输出形成悖论，因为“美国在世界上输出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输出民主是为了世界更太平，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⑤这一理念几乎成为冷战后美国历

① Спасательный круг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ежду двух огней войны. 12 июля 2022 г. <https://orda.kz/spasatelnyj-krug-mnogovektornosti-centralnaja-azija-mezhdudvuh-ognej-vojny/?ysclid=mcooul4huv988999847>

② Разрыв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Россией: власти решили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кириллицы. 20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dzen.ru/a/ZTKDz9YQD3pv0NvM?ysclid=mcowmxrwh7900057939>

③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школ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омощи России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школ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ria.ru/20250704/spetsposlannik-2027239206.html>

④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Победы: Почему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Киргизии запретили 9 мая. 8 мая 2024 г. https://kz.tsargrad.tv/news/srednjaja-azija-otkazalas-ot-pobedy-pochemu-v-kazahstane-uzbekistane-i-kirgizii-zapretili-9-maja_997758

⑤ 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 页。

届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尤其是对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原苏联各国。其主要实施方式则是利用各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国家的政府、社会、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援助项目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然而这种自负、功利、傲慢的“民主援助”在中亚各国产生的实际作用，却“削弱了中亚国家的政治自主发展能力，影响了中亚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机会。”^①从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到5月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这种渗透受到中亚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明显抵制，甚至连此前4年在汉纳巴德建立的美军基地也被要求限期撤离，这一阶段的西方“民主援助”突出遭遇“水土不服”。

随着欧亚地区大国博弈加剧，美欧对在中亚地区挤占战略空间的需求上升。2020年2月，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赴塔什干主持外长级“C5+1”美国-中亚五国对话，并首次推出《2019—2025年美国中亚战略》。这是自中亚五国独立后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布的对中亚地区的政策文本，并以“巩固主权和促进繁荣”为副标题，其本质含意在于支持中亚地区加强独立性。^②两年后，俄乌冲突升级，拜登政府与前任在对外政策上虽大相径庭，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频繁出使中亚，除继续举行美国-中亚五国外长级“C5+1”对话外，或提防中亚各国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或鼓励各国在“反腐”、“人权”、“限制特权”等方面的“民族建设成就”，直至促成2023年美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美国以这种方式提升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度，让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们喜忧参半：美国-中亚“C5+1”峰会的举行，足以大大提升中亚国家的国际地位，但针对国家权力形态和社会稳定的“民主援助”却毫不隐讳地威胁着他们的执政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受俄乌冲突、巴以危机、伊以战争等全球性热点事件的牵制，美国的中亚地区战略有意保持模糊状态。但是在“美国再次伟大”语境下，美国国务院等部门的职能有所调

① 马师孟：《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民主援助评析》，广西：大众文化出版社，2025年，第302页。

② Стратегия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2019-2025 годы: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2020. https://uz.usembassy.gov/wp-content/uploads/sites/78/20200206_US_STRATEGY_FOR_CENTRAL_ASIA_20192025_Russian.pdf

整，对中亚国家“民主援助”后继乏力。尤其是 2025 年年初，现任国务卿鲁比奥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停止对外援助活动，大批在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停止活动，中亚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他们长期以来在本地区活动的评价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①为了让中亚伙伴保持对“民主社会”的信心，欧盟借机加大了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投入。2025 年 4 月，中亚五国元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撒马尔罕举行中亚-欧盟峰会。峰会的结果，一是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是欧盟将启动总额为 120 亿欧元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三是宣布双方将在关键矿产、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等领域进行合作。^②大国战略力量此消彼长和美欧中亚地区政策的调整，时时牵动着中亚国家多元平衡的砝码，以至于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时段内尚不能周全顾及所有方面。尤其是来自美欧内政的不确定性，势必驱动中亚国家平衡外交的尺度随之出现较大波动。

四、结 语

从时间的维度看，中亚各国的独立民族国家建设在三十多年里不断完善是个总体趋势。从空间的维度看，冷战后在欧亚地区积累的矛盾近年来集中释放构成若干冲突焦点。在这个总体的综合背景下生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条件，进而激活了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自主的意识，并有意做出一些路径明确、目标清晰的尝试。这种意识与行动的萌生和强化，是目前中亚地区总体形势走向中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这一趋势极可能催化地区内外一系列基本关系发生新的蜕变。可以做出的基本预判是：第一，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的增强有利于这个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统一的地缘政治板块；第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中亚地区战略自主能力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第三，这

① USAID может вернуться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11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s://easaily.com/ru/news/2025/02/11/usaids-mozhet-vernutsya-v-centralnuyu-aziyu>

② Итоги первого самми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ЕС»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5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5/04/05/itogi-pervogo-sammita-centralnaya-aziya-es-v-samarkande>

一总体趋势与中国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目标相吻合，它将有利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和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长远目标的实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演进，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实现自身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正在形成一种有助于应对各种不确定风险因素的建设性互动关系，并由此形成一种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保障。这也恰恰是 2025 年 6 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提出的“中国-中亚精神”^①的重要时代意义。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1990s,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have embarked on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building independent nation-states, a process that has now lasted for 34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each country has chosen development paths suited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highly centralized and efficient presidential systems, and reconstructed relatively complete supply and industrial chains from the ruins of the collapsed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foreign policies, they have maintained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ue to the region's unique geopolitical position, bordering today's global geopolitical center and several hotspots, major external shocks in surrounding areas have inevitably exerted specific impacts o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states. However, as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apacities have steadily improved since independenc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policy choice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are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forces has gradually diminished.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profound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ve been reshaping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Eurasia wher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located. These changes have, on the one hand, compelle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o accelerate the closing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gaps and to enhance their overall capacity

① “中国-中亚精神”以“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基本内容。参见《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

to manag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On the other hand, unprecedented adjustments in the global balance of strategic power have also created conditions that stimulate impulses toward strategic autonomy. Especially as major country rivalries and conflicts escalat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Central Asia, long considered a traditional “in-between” zon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focu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accelerat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efforts to repair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among them have elevated their confidence to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their independence. This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new regional variables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impact will be both profound and complex.

【Key Words】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Nation-State Building, Strategic Autonom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начале 1990-х годов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ступили на путь созда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же 34 года. За это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каждая стран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брала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её уникальным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создала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ую и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президентск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етронутые цепочки поставок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з руин разруш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здор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и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связи с уникальны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ой рядом с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центром мира 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и очагами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ряд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в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регионах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степени повлиял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я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обор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должал укрепляться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им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тепень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х путей и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им

влиянием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нижалась.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реобразил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котором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буждают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ть усилия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и повышению их обще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правляться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ями и рискам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сдвиг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балансе сил создаё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актуаль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эскалаци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конфликтов между ведущ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даже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являвшаяся нейтральной зоно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ишенью для крупн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Ускоре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акже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оверие достигло наивысшего уровня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странам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Это одна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ных, возникших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её влияние будет глубоким и сложны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 “变”和“不变”*

许昌志**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分析范式，需要放到双方交往近 500 年的背景之下，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维度深入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源于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的战略背景；“不变”则是因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至今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逆境苦撑，强调独特的“文明体国家”定位，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亚地区出现第三轮“去俄罗斯化”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开始反俄乃至亲美，而是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当前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注重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试图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但难以从根本上逆转战略主导地位继续缓慢下降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 中亚国家 民族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066(27)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欧亚国家的国族建构：经验教训、影响评估和启示思考”（项目编号：ZKJC25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许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秘书长。

一、引言

俄乌冲突爆发三年多来,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众说纷纭,其中“俄罗斯崩溃论”时起时伏,尤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甚。^①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也存在多种观点,对何为战略性趋势、何为阶段性特点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受到多重内外因素影响,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范式,需要更加系统的观察和更加辩证的分析。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②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始自16世纪,^③其间经历了平等贸易伙伴、殖民地与宗主国、地方政府与联盟中央、国家间正常关系四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观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需要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中层理论工具,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属性;但更重要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把握中亚地区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转化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的“变”,需要考虑的背景是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呈现变乱交织的阶段性特点。其中的“不变”,则是因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未发生逆转,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因此,不宜过低估计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的“存量”。例如,当前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编纂7卷本《哈萨克斯坦历史》

① “俄罗斯崩溃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认为制裁将摧毁俄罗斯经济;二是认为国内政治矛盾和民族分离主义风险将引发政权更迭;三是认为弹药耗尽和兵源枯竭将导致战场崩溃。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23页。

③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页。

对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夯实意识形态根基的重要作用。^①此部著作将同时推出哈萨克语和俄语版本。哈萨克斯坦国内不少知名历史学家在编著过程中先用俄语完成书稿，然后再译为哈萨克语。^②再如，中国与中亚五国 202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十五条规定，本条约“正本一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③上述两例对了解俄语乃至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可能有所帮助。

二、分析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特殊维度

对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分析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其中，普遍性体现在对国家间关系基本要素的观察，如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与此同时，还需要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特殊维度，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不同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特殊原因。在这些领域，中国学者拥有一些先天优势。例如，中国与中亚地区历史渊源之深远、持久、全面，令其他文明和国家难望项背。全世界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史料最早、最丰富、最系统。当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学术积淀和影响亦值得高度重视和辨析。

（一）历史的维度

研究三年多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要放到双方近 500 年交往史的历史背景之下，特别是不能忽视其中 300 余年平等交往的影响。以

① 2021 年 1 月 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文章《独立高于一切》，提出编写一部新的国家历史学术著作，作为所有教科书的基础。7 卷本《哈萨克斯坦历史：从古至今》（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的编纂工作随即迅速展开，220 余位本国和 60 多位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各卷标题是：第 1 卷《哈萨克斯坦古代史》，第 2 卷《突厥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史（6—12 世纪）》，第 3 卷《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史》，第 4 卷《哈萨克汗国史（15—18 世纪初）》，第 5 卷《哈萨克斯坦近代史》，第 6 卷《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1917—1991 年）》，第 7 卷《独立哈萨克斯坦史》。

② 源自 2025 年 7 月笔者赴哈萨克斯坦调研期间与术赤兀鲁思研究所所长萨比托夫、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卡布利季诺夫的谈话内容。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25 年 6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496.htm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例，在 16 世纪以降的近代史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在沙俄早期（1558—1864 年），双方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保持了 300 余年的政治平等、经济互利关系。15 世纪后期，蒙古帝国分裂瓦解，广阔疆域内出现了多个封建国家。其中，乌兹别克人 1501 年建立布哈拉汗国（1710 年浩罕汗国从中分离）、1512 年建立希瓦汗国。^①俄罗斯人的莫斯科公国也获得较大发展。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 1547 年加冕，成为俄国历史上首位沙皇，进而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全面控制伏尔加河流域，打通了通往里海和中亚的水陆交通。俄国首次与希瓦汗国相邻。1558 年，伊凡四世派出使者詹金森，从伏尔加河经里海出访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标志着双方建立了使节互访关系。当时俄国和乌兹别克的两个汗国都处于农牧结合的农业社会，整体落后于西欧。俄国无力南下征服中亚，只能暂且平等交往。1605 年，一批俄国哥萨克首次进攻中亚，攻破希瓦汗国都城大肆劫掠，但随后即遭当地军民围攻，在企图逃跑之前悉数被杀。^②

在沙俄晚期（1864—1917 年），双方经历了 54 年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18 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实力逐步增强，开始觊觎中亚，多次派遣“武装考察队”深入希瓦和布哈拉，但均遭失败。^③19 世纪初，俄国开始对中亚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最终攫取了约 4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苏联历史学界把征服中亚的原因解释为“多次遭受中亚各野蛮游牧民族的可怕袭击”，希望用牢固的秩序“取代自由放任和强盗袭击”。^④但是恩格斯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幌子”。^⑤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3 页。

②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9 页。

③ 许涛：《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时事出版社，2016 年，第 41 页。

④ [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6 页。

在苏联时期（1917—1991 年），双方保持 74 年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的关系。1917 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帝国崩溃。当时中亚同时存在的三个政权性组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维埃政权、穆斯林联盟），联手摧毁了沙俄在中亚的统治。^①此后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双方形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俄罗斯则继承了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双方数百年来的关系得以延续。

回顾历史，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交往 467 年，有 340 年保持平等关系，127 年处于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状态。乌兹别克斯坦认为，乌兹别克民族千百年来始终保持独立，早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即已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例如 14 世纪，当时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尚被蒙古人奴役，而乌兹别克地区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之一。乌兹别克诸汗国被沙俄吞并只是历史进程的偶然，1991 年独立不仅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更是国家主权的回归、悠久历史的延续。乌兹别克民族被殖民被统治 127 年是国家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不可忽视，但也不容反复。

（二）民族的维度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其中主体民族占绝大多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同时面临国族建构任务，需要提高国家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把基于共同文化或血缘的族裔变成拥有共同身份的政治民族，避免因身份认同缺失导致分离主义运动活跃。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通常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公民民族主义模式。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视其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个体所组成的联合体。虽然公民的种族和宗教差异明显，但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形成凝聚力。第二种是族裔民族主义模式。强调文化、血缘等非选择性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抽象的政治信念、价值原则。第三种介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既承认共同政治信念的作用，也重视共同起源等非选择性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3 页。

因素的作用。绝大部分多民族国家在实践中采用第三种模式，只是侧重程度不同，要么更侧重公民民族主义，要么更侧重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基于近代以来建设民族国家的实践，二战结束后更加侧重公民民族主义。但近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涌现，族群整合成果受到威胁，西方国家出现向侧重族裔民族主义模式转变的苗头。例如，欧洲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上升，反移民、反伊斯兰教的极右翼政治和社会运动日趋活跃，有的甚至要求回归近代以来形成的“一族一国”传统，同化或消灭差异性群体。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苏联民族政策失误导致的恶果拥有相同感受，因而高度重视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问题，30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既有经验也有教训。^①立国初期，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更加侧重族裔民族主义，强化主体民族地位，同时尽量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问题。^②进入新世纪后，注重在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确保民族和谐，巩固多民族国家建设。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就使用7种语言（俄语、中亚五国主体民族语言、卡拉卡尔帕克语）开展教学活动，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以12种语言出版和播出。^③

近年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涉及本民族历史叙事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增加，对双方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如何界定俄罗斯族、中亚主要民族作为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的形成时期，如何评估苏联民族识别政策对中亚民族构成的影响等等。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民族问题成为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关系中的敏感话题。^④2014年3月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普京在8月29日参加“谢利格尔-2014”全俄青年论坛时强调，俄罗斯族和

① 孙壮志：“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国家构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第5页。

②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85页。

③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 –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7 июля 2023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3/07/07/obespecheniye-mezhnatsionalnogo-soglasiya-prioritetnoye-napravleniye-razvitiya-novogo-uzbekistana/>

④ 苏畅：“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21页。

乌克兰族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位参会者对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表示不安，并提问“哈萨克斯坦是否会面临类似乌克兰的情景，俄罗斯是否有这方面的战略”？普京没有直接回答，先是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最亲密的战略盟友和合作伙伴，然后称赞纳扎尔巴耶夫“在一片未曾有过国家的土地上建立国家”的壮举。^①

普京有关哈萨克民族“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国家”的言论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引起争议，有人建议“送普京一本历史教科书”作为回应。^②2015 年 10 月 8 日，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汗国建立 550 周年”庆典活动上，重申哈萨克汗国是哈萨克斯坦的早期国家。托卡耶夫 2019 年就任总统后进一步向前延伸哈萨克民族历史，举办“金帐汗国 750 周年”庆典活动，强调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者。2024 年 1 月，托卡耶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历史学家认为金帐汗国截至 2024 年实际上已成立 800 周年，为此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③例如，2024 年 4 月，哈萨克斯坦以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名义举办“金帐汗国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三）文明的维度

文明从诞生路径看，可分为原生型、次生型、派生型三大类。原生型拥有独立发展轨迹，是文明创造者发展的自然结果，基本未受到外部因素较大影响。次生型拥有基本独立的发展轨迹，本体特征和核心价值多为原创，或是在外来因素基础上的再创造。派生型是主要文明在发展和扩张过程中，在新地域新形成的文明体。^④据此分析，中亚文明是受到欧亚多种文明影响、具有原创性的次生文明，既不属于原生型文明，但同样不是派生型文明。

中亚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欧亚多种文明影响。一方面，历史上多个帝国曾统治中亚，随后湮没于历史长河。例如，波斯帝国与中亚的特殊关系，

①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молодёжный форум «Селигер-2014». 29 августа 201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507>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заблудился в поисках казах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9 марта 2014 г. <https://inosmi.ru/20140903/222765652.html?ysclid=mdmt1mp33x212666018>

③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Как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нация мы должны смотреть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3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www.akorda.kz/ru/prezident-respubliki-kazakhstan-kasym-zhomart-tok-aev-kak-progressivnaya-naciya-my-dolzheny-smotret-tolko-vpered-302415>

④ 刘景华：“世界历史上文明兴起的四波浪潮”，《全球史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26 页。

当下仅体现在伊朗与塔吉克斯坦同属伊朗语族。奥斯曼帝国即使鼎盛时期也从未染指中亚，土耳其现在与中亚国家也不接壤，只能强调同属突厥语族，甚至罔顾历史创造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大突厥民族”。俄罗斯与中亚的特殊关系自沙俄时期延续至今，但其历史跨度不到 200 年。但另一方面，至今仍对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文明，只有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波斯文明等。中国历史上虽曾对中亚地区东部实施过有效统治，而且至今延续着与中亚的数千年交往，但中华文明对中亚却没有形成深刻、持续的影响。

中亚文明的发展轨迹既不能单纯归纳为“马背上的文化”，^①也不是游牧和农耕的文明冲突、流动与定居的二元对立，而是游牧、农耕、商贾文明的深度融合。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大致在北纬 35°至 55°之间。从中国境内延伸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和天山融雪形成的锡尔河，把中亚分为两个大的地理板块。北部是黑土草原带和棕土干草原带，局部干旱，大部湿润，草场广袤，游牧经济发达。南部为半沙漠区和沙漠区，降水较少，但数条高山融雪河流冲出肥沃平原，引水灌溉形成农耕绿洲。^②过渡地带位于绿洲与草原之间，不仅经营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而且主导农业区和游牧区之间的南北贸易，成为物资集散、文化交流的枢纽，城镇工商业发达。中亚南北迥异的地形地貌，使当地居民逐渐分化形成游牧、农耕、商贾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人文环境、宗教发展、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中亚文明的独特思维和行为方式。

我国史书对中亚游牧、农耕、商贾文明的特点多有记载。游牧文明方面，《隋书·西域传》称石国（塔什干）“多良马，其俗善战”。^③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提到撒马尔罕“风俗猛烈”，“其王豪勇”。^④唐朝军队专门编

①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此书系国内专门研究游牧文化的奠基作之一，准确勾勒出亚欧大陆游牧文化的总体面貌。由于书名为《中亚：马背上的文化》，难免使人产生游牧文明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错觉。

② 吴筑星：《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9 页。

③ 许嘉璐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二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年，第 1673 页。

④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7-88 页。

有“拓羯军”，从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等地招募兵士，“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①农耕文明方面，考古发掘证明，2000 多年前，粟特、大宛（费尔干纳）、花刺子模等地曾建有数百座城市和几千个村镇，居民主要从事绿洲农业。乌兹别克族谚语许多源自农耕生活，如“土地是宝藏，劳动是钥匙”，再如“春天劳动，秋天丰收”，与中国唐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意蕴十分相近。商贾文明方面，据史书记载，西域胡商为延续商贾文化传统，孩子出生时操办相应仪式，“生子必以石密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中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②意即在新生儿嘴里放蜜、手上涂胶，寓意孩子长大后做生意甜言蜜语、钱不离手。祖籍撒马尔罕的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③也就是懂 6 种语言，曾在贸易市场担任翻译和中介。

当前，从文明维度观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辩证评估斯拉夫文明对中亚的影响。俄国在征服中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如修建铁路、引入近代工业。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一批古老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评价“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的”。^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俄国对于中亚的发展扮演过“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

二是准确把握中亚历史上“突厥化”的内涵。对突厥、突厥人、突厥化等学术概念应予以严格界定。“突厥化正确的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突厥人，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根据语言特征得出的集合名词。”^⑤苏

①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8 页。

② 许嘉璐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六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年，第 4567-4568 页。

③ 同上，第 451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85 页。

⑤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年，第 24 页。

联学者巴托尔德（又译为巴尔托里德）也持此看法，并举例说，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①有的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内涵更丰富，还包括“突厥人”与中亚土著居民杂居通婚带来的人种的变化，“突厥人”从游牧转向定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②外来“突厥人”自身的变化，能否被称为中亚的突厥化，有待进一步商榷；扩大“突厥化”的内涵，可能导致“突厥人”的内涵超出语言特征范畴，对其复杂影响也需研究探讨。

三是深入研究俄罗斯应对“突厥文明”影响的政策措施。近年来，欧亚地区部分突厥语国家出于巩固国族认同、加快经济发展、拓展地缘利益等考虑，推动“突厥世界”抱团取暖，乃至构建“突厥文明共同体”。特别是2021年11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格为“突厥国家组织”（简称“突国组织”）^③后，深耕人文领域合作，该组织所属的国际突厥研究院编写《突厥通史》等成员国中学教材，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俄罗斯对“突国组织”一直高度关注、积极应对，提出符合本国利益的俄版“突厥世界”叙事体系，认为突厥-蒙古文明6—7世纪诞生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边界交汇的大阿尔泰地区，大阿尔泰是“突厥世界”和“突厥文明”的中心；强调斯拉夫与突厥千年文明的融合是俄罗斯与中亚一体化的思想基石，提出《俄罗斯和中亚的斯拉夫与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统一构想》。^④2020年，俄罗斯政府科教部支持阿尔泰国立大学实施“大阿尔泰的突厥世界：历史和现代性的统一和多样性”项目，并赋予编修5卷本《突厥文明编年史》的重点任

①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第19页；蓝琪：“论中亚的突厥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第6-7页。

③ 该组织的英文名称为“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汉语直译为“突厥国家组织”。有的文章称其为“突厥语国家组织”，相当于将该组织英文名称改为“Organization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但是，2021年11月该组织改名升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组织名称中的“Speaking”。为避免歧义，可考虑该组织汉译全称为“突厥国家组织”，通过增加引号，表明为直接引语；汉译简称为“突国组织”。

④ Ученые НОЦ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 разрабатывают механизмы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и славяно-тюрк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0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press-release.ru/branches/education/uchenye_nots_bolshoy_altay_razrabatyvayut_mekhanizmy_realizatsii_kontseptsii_slavyano_t_yurkskogo_edi_20_09_2022_07_15/

务。^①俄罗斯运用《突厥文明编年史》针对“突国组织”的《突厥通史》展开学术争鸣，争夺国际突厥学界的话语权。《突厥文明编年史（第 1 卷）》（6—12 世纪的突厥世界）已于 2023 年 12 月出版，第 2 卷（13—16 世纪突厥民族的历史）计划 2025 年秋推出。

三、俄乌冲突成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调整变化的催化剂

如果把过去三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放在独立 34 年的背景下观察分析，可以看到，这是中亚地区出现的第三轮“去俄罗斯化”^②浪潮。一方面，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去俄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回到沙俄、苏联时期。另一方面，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去俄化”并不直接意味着疏俄、反俄乃至亲美，而是实现和保持国家关系正常化，符合中亚国家多元外交的基本方针。

（一）中亚国家前两轮“去俄化”的历史回顾

第一轮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中亚五国妨碍自身经济发展，推出一系列“甩包袱”政策。而中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也力争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依赖，独立建设民族国家。双方不断探索磨合，总体上关系有所疏离。例如 21 世纪初期，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不惜游走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与俄罗斯的关系冷热交替，同期与美国的关系也大起大落。

第二轮发端于 2012 年普京重任总统。俄罗斯明显加大对欧亚地区投入，进而于 2014 年归并克里米亚，引起中亚国家警惕。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过独立 20 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处理双方关系时较 20 世纪 90 年代

① На главную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центр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 АлтГУ отметил пятилетие своей работы. 24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historyrussi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layout=edit&id=10958

② “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去俄化”主要指通过发展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和语言，将俄罗斯元素（俄罗斯人和以俄语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群体、俄语、俄罗斯文化）排挤出自身空间，或使其边缘化。广义的“去俄化”除文化领域外，还包括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削弱俄罗斯的影响。

明显更加理性务实。例如，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制定首部《外交政策构想》。其中，“三不”原则（不加入军政联盟、不向海外派兵、不接受他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驻军）划定三条红线，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二）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的主要表现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虽未选边站队，但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意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

政治改革加速推进。希望逐渐去除“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体制标签，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均对宪法进行修订完善。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公正哈萨克斯坦”，限制总统权限，改革议会产生方式，扩大政党参政范围。乌兹别克斯坦提出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提升人的尊严”，深化民主制度改革，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俄乌冲突使中亚国家政治模式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加速，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对中亚的制度影响进一步减弱。

经济合作追求多元。希望尽量摆脱对俄罗斯“依附性增长”的模式，避免美欧对俄罗斯制裁严重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提出优先发展“跨里海运输走廊”，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退出 1995 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的协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正式签署中吉乌铁路协议，打通联系东西方交通走廊的重要环节。

外交政策更趋灵活。希望通过开展多元平衡外交和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缓解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在中亚地区引发的担忧和警惕。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明确表示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地位，与俄罗斯拉开距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保持超脱，不明确表态。中亚国家以 C5+1 机制为平台，与中国、美国、欧盟、德国、印度、日本开展政治对话，扩大区域合作，加强经贸联系和拓展人文交流。以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为抓手，推进区域一体化，并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彰显中亚国家的团结和影响。

安全保障自主性上升。希望通过加强自身安保能力建设和多元安全合

作，逐步降低对俄罗斯的安全依赖程度，提高应对危机局面甚至混合战争的能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待多个美欧军事代表团，探讨加强军事安全和军事装备技术合作，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哈萨克斯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与土耳其商定引进无人机和生产线，满足军民两用需求。吉尔吉斯斯坦临时取消原定在其境内举行的集安组织“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2022”军事演习。

（三）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的突出特点

一是主体更加多元。前两轮“去俄化”多由官方推动，政府颁布系列政策自上而下施行。新一轮“去俄化”转变为官民并举，民众成为重要参与力量。例如，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中亚国家民众集会抗议，表达对俄不满情绪，并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还允许民间团体为乌克兰募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二是领域不断扩大。前两轮“去俄化”突出文化抓手，通过限制俄语使用、拆除标志性建筑等方式，降低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感。新一轮“去俄化”进一步拓宽领域：加速推进政治改革，逐步调整受俄罗斯影响的“超级总统制”；外交表态不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展示中立立场；经济合作转向西方、东方，寻找更具潜力的伙伴，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三是手段更趋直接。前两轮“去俄化”表达方式较为隐晦。例如重新解读 1916 年民族大起义、1933 年大饥荒等历史事件，据此抨击沙俄殖民枷锁和苏联高压政策，通过解构和重塑历史叙事对俄罗斯的现实影响釜底抽薪。新一轮“去俄化”的方式由隐趋显、手段由软趋硬。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中亚-俄罗斯”峰会上公开向普京抱怨，不要再把塔吉克斯坦视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反普京示威活动时有发生，有的网民甚至将普京称为“恐怖分子”。

四是影响更为深刻。前两轮“去俄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地区国家内部，客观上有助于巩固国家政权、增强民族认同。新一轮“去俄化”的地区影响有所扩大。美国、欧盟、土耳其等域外势力据此认为俄罗斯掌控中亚的能力受到削弱，趁机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加大竞争力度，带动中亚地区战略格局演变。

四、俄罗斯仍是影响俄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方面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观察当前的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国际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俄罗斯对中亚战略。

(一) 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2023年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①这是俄罗斯立国以来制定的第6份对外政策指导性文件,旨在分析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前景,阐释俄罗斯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国家利益、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优先方向。

在2016年制定的上一版《构想》中,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依次为独联体国家、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美国、北极地区、南极洲、亚太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非洲。^②2023年版《构想》将地区优先方向排序调整为近邻国家、北极地区、欧亚大陆(中国与印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欧洲地区、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南极洲。其中,独联体等近邻国家仍为首要,欧亚大陆、亚太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排序前移,欧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明显后置。这既体现出俄罗斯对所处地缘环境变化的判断,也是其面对美西方重压下的反应。

2023年版《构想》指出,俄罗斯与独联体成员国和其他邻国数百年同处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深度相互依存,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相近的文化。对俄罗斯而言,维护安全、稳定、领土完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主权和文明中心之一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保持与上述国家的长期睦邻关系,联合各个领域的潜力。俄罗斯为进一步将近邻地区建设成为和平、睦邻友好、稳定发展的繁荣地区,将优先关注以下领域和问题:一是政治领域。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改善国家间关系,抵御煽动“颜色革命”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和其他干涉俄罗斯盟国和伙伴内政的企图，确保近邻地区稳定。二是安全领域。确保俄罗斯与盟国和伙伴得到有保障的保护。巩固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和俄罗斯发挥关键作用的区域安全体系，增强俄白联盟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其他国防和安全协作机制的互补性。反对不友好国家在近邻国家部署或加强军事基础设施。三是经济领域。深化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一体化进程，加强基于联合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潜力的互利全面多边合作体系，发展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睦邻友好关系的经济潜力。四是外交领域。着眼长远，建立欧亚大陆一体化经济和政治空间，预防和制止外国及其集团破坏近邻地区一体化、阻碍俄罗斯与盟国和伙伴深化全面合作的不友好行为。^①

（二）俄罗斯推行中亚战略的能力和手段

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有望基本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从政治和社会领域看，当前是普京执政 20 余年来俄罗斯国内政治反对派最为弱势、总统权力最为集中的时期。俄国内没有对普京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政党及头面人物，政局较小概率会出现颠覆性变化，政权安全无虞。2025 年 7 月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5 年上半年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保持在 86% 的高位。^②“列瓦达”中心还有一项始于 1997 年 6 月的持续性民意调查项目，每月选取受访者对国家前进方向“是否正确”作出评估。2025 年 6 月“正确”与“不正确”的对比为 70%：17%。普京出任代总统之前的 1999 年 12 月为 31%：51%；2022 年 2 月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为 52%：38%，3 月即变为 69%：22%。此后，“正确”占比基本保持在 70% 以上，最高达 75%，“不正确”占比曾两次升至 27%，原因分别是 2022 年 9 月俄军在哈尔科夫大撤退和 11 月局部动员。^③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暴露出一些始终未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Рейтинги июня 2025 года: настроения, оценки положения дел в стране, одобрения 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 и доверие политикам. 26 июня 2025 г. <https://www.levada.ru/2025/06/26/rejtingi-iyunya-2025-goda-nastroeniya-otsenki-polozeniya-del-v-strane-odobrenie-organov-vlasti-i-doverie-politikam/>

③ Там же.

如联邦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恐怖袭击背后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等。宗教极端主义仍是俄罗斯面临恐怖威胁的主要根源之一，相关组织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保持密切联系。俄乌冲突分散了俄罗斯强力部门的反恐精力，使其在俄乌冲突和国内反恐之间左支右绌。2024年3月22日的莫斯科市恐袭事件造成144人死亡、551人受伤。^①这是自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333名人质死亡、728人受伤）以来，俄罗斯国内伤亡人数最多的恐袭事件。“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发表声明对此负责。此次恐袭发生在普京2024年3月7日连任总统后不久，时间、地点和方式经过精心策划，意在造成重大社会冲击。莫斯科恐袭事件后，俄罗斯收紧了移民政策。普京强调内务部在移民领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和公民安全、维护文化认同。^②内务部获得驱逐非法外国移民的独立行政裁决权。免签进入俄罗斯的最长逗留时间缩短至每年不超过90天。2024年违反移民法的案件数量增加了31%，被驱逐出境人数增加了34%。因违反入境和逗留制度而被起诉人数增加了11%。近1500人因非法行为被终止俄罗斯公民身份。^③

从经济领域看，俄罗斯承受了西方三年的制裁，战时经济表现出强劲韧性，并实现了超预期增长。^④在生产领域，国家项目大规模投资和居民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2024年GDP增长率为4.1%。制造业贡献了主要增长份额，军品生产起到发动机作用，能源和农业成为经济安全的稳定器。在财政领域，收支总体平衡，赤字平稳可控。2024年预算收入36.71万亿卢布，同比增加26%，支出40.19万亿卢布，同比增长24%，赤字3.48万亿卢布，占GDP的比重为1.7%，尚不存在财政风险。财政对油气收入依赖连续下降，2022年为43%，2023年为31%，2024年为30%。金融系统总体稳定，持续

① В Подмосковье уточнили данные по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при теракте в «Крокусе». 30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ria.ru/20240330/krokus-1936812467.html>

②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ВД. 5 марта 2025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6408>

③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ежегодном совещании судей судов обще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военных и арбитражных су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6296>

④ 徐坡岭、聂志宏：“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双重差分的两阶段对比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第80页。

向国家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国际收支方面，2022 年至 2024 年外贸总额分别为 8478 亿、7102 亿和 7169 亿美元，贸易顺差分别为 3372 亿、1400 亿和 1509 亿美元。^①外汇储备方面，2022 年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有所减少，当年 6 月恢复增长，2025 年 7 月达到 6906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②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战争消耗挤占长期产能投资，形成俄罗斯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2024 年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为 6%，2025 年提高到 6.31%。^③作为对比，普京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的国防预算分别占 GDP 的 14% 和 10%，并强调未来三年俄罗斯将逐步减少国防开支。^④根据预算法案，2025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2.5%（较 2024 年下调 1.6 个百分点），2026 年和 2027 年分别增长 2.6% 和 2.8%。^⑤2025 年俄罗斯经济已有所降温，头 5 个月 GDP 同比增长 1.5%。^⑥目前俄罗斯经济由产业政策主导，国家项目投资保持稳定，低烈度军事行动和战争消耗不会对固定资产投资造成破坏性影响，恶性通胀概率不大。俄罗斯经济受劳动力供给水平和产能利用率限制，难以保持快速增长，但不存在大幅衰退的风险。

（三）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

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当前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在逆境中继续苦撑。第一次是从基辅罗斯 862 年立国到 1240 年蒙古入侵被征服。第二次是从 1689 年彼得大帝改革到 1917 年沙俄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终结。第三次是从十月革

① 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тоги 2024 года. 7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directions/makroec/ekonomicheskie_obzory/o_tekushchey_situacii_v_rossiyskoy_ekonomike_itogi_2024_goda.html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езер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Еженеде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на конец отчетной даты. 18 июля 2025 г. https://cbr.ru/hd_base/mrrf/mrrf_7d/

③ Рос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шли объяснение. 13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lenta.ru/news/2024/08/13/rostu-rossiyskoy-ekonomiki-nashli-ob-yasnenie>

④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саммита ЕАЭС в Минске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27 июня 2025 г. <https://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316>

⑤ Сбербанк дал прогнозы на 2025 год. 6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7347787>

⑥ 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2025.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file/ec74ceb77d0fb6628bc761772674a45a/o_tekushchey_situacii_v_rossiyskoy_ekonomike_may_2025_goda.pdf

命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客观地看，某种程度上历史更加青睐俄罗斯：一是辽阔的国土奠定了大国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抵御外敌的战略纵深，二是强势领导人的集权确保了内部的集中统一，三是顺应潮流的改革创新积蓄了大国崛起的力量，四是巧妙的外交运筹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俄罗斯虽然历经三次衰败，却又三次重新复兴。大国情结贯穿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当前在俄罗斯高层领导和各界精英中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全社会的文化基因。

相比之下，俄罗斯可能更加善于摆脱困境，而不是维持优势。在顺境时，俄罗斯常常会犯一些战略性错误，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力不断增强，开始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最终在美苏争霸中败下阵来。但在逆境中，俄罗斯却往往能够苦苦支撑，甚至再度崛起。究其原因，俄罗斯蕴含在军事传统、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中的战略韧性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苦战是俄罗斯军事传统的基本内核。沙皇俄国存续 370 年（1547—1917 年），打过 37 场数万人参战的对外战争。^②俄军出国作战多次铩羽而归，或者勉强打成平局，只有条件十分有利，才能苦战取胜。俄军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将领无能、兵员不足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恩格斯曾指出：“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③俄国兵体格好，身体壮，步伐矫健，要求不高，吃喝随便，而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兵士更能听从自己的长官。^④目前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僵局和战争损失还没有逼近俄罗斯军事传统的苦战底线。坚忍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突出特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俄罗斯民族饱尝艰辛，形成了坚忍面对不幸与贫困的民族性格。当前，俄罗斯国内半数以上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依赖国家财政供养，属于普京的“核心选民”。这部分人群只要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就会继续支持普京的内外政策，而不是选择改变现状。

① 许昌志：“从俄罗斯的战略韧性看俄乌冲突”，《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135 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23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iiss.pku.edu.cn/fj/PDF/ciss_cn/upload/docs/2023-03-16/doc_6401678954523.pdf

② 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第 20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453 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年，第 270 页。

服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数百年的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给俄罗斯政治文化打下深刻烙印，集体主义和权力崇拜是其突出表现。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需要服从集体和社会的要求，否则将被视为异端。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普京始终保持较高支持率，俄乌冲突以来也未曾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政治文化的传承。

普京主政以来，俄罗斯逐步走出衰落期，继续探寻第四次复兴之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冲突只是近忧，国家的未来仍取决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从历史的长周期观察当今的俄罗斯，大国雄心是否能够得到综合国力的充分支撑，是否已经拥有第四次崛起的主客观条件，仍是一个未知数。^①俄罗斯战略界时常引用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的一句话：“在俄罗斯，20 年可以改变一切；200 年后，一切都未曾改变。”这也表达出俄罗斯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周而复始轮回的无奈。

五、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着手强化对中亚国家影响

乌克兰危机肇始于 2013 年，于 2022 年全面升级为俄乌冲突，成为俄罗斯的国运之战、乌克兰的存亡之战、美国的霸权保卫战。当前，俄乌冲突进入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新阶段，冲突停火冻结的可能性有所上升，但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几乎已经成为定局。普京的第五任期（2024—2030 年）与特朗普的 2.0 任期（2025—2029 年）基本重合。对俄罗斯的国运兴衰而言，未来五年是危险的五年；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保持而言，未来五年也是重要的五年。

（一）国际形势继续保持动荡与变革的阶段性的特点，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未因此改变

当前百年变局进入新的演进阶段，大国关系呈现出新的互动特点。国际

① 2025 年 6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中俄智库高端论坛（2025 年）”期间，笔者与俄罗斯前外长、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就此问题进行过交流。伊万诺夫没有正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是强调，对俄罗斯而言，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符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与其他各领域的实力。

形势动荡与变革的阶段性特点源自国际权力结构重组与霸权博弈。西方的传统领导地位面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各国政策更加内顾，加剧了贸易摩擦和产业链区域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以伊战事进一步暴露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回归，对全球安全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世界面临阵营对抗的现实风险。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动荡与变革只是新旧国际秩序转换的阵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体现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历史的基本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总体趋向平衡，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继续深化；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仍是主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强化；新兴力量通过合作逐步重塑国际规则，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俄罗斯依托综合国力，凭借老练手腕和冒险行动，仍是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心

俄罗斯通过激活历史积累的战略资产、重构非西方的国际合作网络、发挥资源和军事的比较优势，在“一超多强”格局瓦解后，勉力维持大国地位的基本盘。从单极与多极斗争的政治角度看，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世界多极化，是一支建设性力量。从战争与和平的安全角度看，俄罗斯运用军事力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宣布暂停履行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等威慑美西方，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朝鲜开展军事合作，是一支破坏性力量。从发展与合作的经济角度看，俄罗斯以粮食、能源为工具，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和世界经济复苏，是一支控制性力量。

俄罗斯立足有限实力，构建立体竞合体系，消耗对手的战略耐心，虽然难以全面突破西方围堵，但也能够在国力相对衰退时期保持特殊领域影响力，为自己赢得了战略喘息空间。但这种在战略冒险与能力边界之间走钢丝的策略对普京政权的要求越来越高，俄罗斯越来越面临资源透支风险和盟伴离心趋势。

（三）俄罗斯主动放低身段，充分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强化对中亚外交

俄乌冲突延宕损耗和美西方经济制裁相互交织，降低了俄罗斯对中亚的

经济影响，限制其发挥地区安全领导者作用。俄罗斯强化与中亚关系的意图与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须根据形势变化作出调整。

政治领域。在多边层面，截至 2025 年 4 月，“中亚五国+俄罗斯”已举行 8 次外长会议。2022 年 10 月 14 日，首届“中亚五国+俄罗斯”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以来，各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第二届峰会拟于 2025 年 10 月在杜尚别独联体峰会期间举行，将成为观察“后俄乌冲突时期”俄罗斯与中亚关系的重要风向标。在双边层面，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元首接触频繁，2024 年共 6 次会面、9 次电话交谈。乌兹别克斯坦已在俄罗斯开设 6 个总领事馆（圣彼得堡、喀山、顿河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即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设立首座总领事馆。俄罗斯约 80 个联邦主体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地方合作。^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025 年 1 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是普京访问次数最多的国家，达到 33 次，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②2025 年 4 月，俄罗斯将塔利班移出恐怖组织名单，试图继续将阿富汗作为地缘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加强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安全保障的依赖。

经济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和三大主要投资者之一。哈萨克斯坦则第一次成为俄罗斯的五大贸易伙伴之一。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额累计达 240 亿美元，其中仅 2023 年和 2024 年两年就超过了 45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累计投资 85 亿美元。截至 2024 年 11 月，约有 2.4 万家俄罗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经营，几乎占外资企业总数的一半。^③

截至 2025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登记俄罗斯企业 3000 余家，占外资企业的 22%。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超过 130 亿美元。能源是双方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两国 2024 年 5 月签署合同，在乌兹别克斯坦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欢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

①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②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Цель – укрепить экономику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3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akorda.kz/ru/kasym-zhomart-tokaev-cel-ukreplit-ekonomiku-i-suverenitet-20524>

③ Президенты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делали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СМИ. 2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684#sel=2>

2024 年，乌兹别克斯坦与该组织成员国贸易额增长 7.3%，达到 175 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于 2025 年 4 月加入欧亚开发银行。大约 110 万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务工。^①

人文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指出，截至 2024 年 11 月，超过 6 万名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在俄罗斯大学学习。哈国内有 7 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新建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阿斯塔纳分校计划 2025 年 9 月开始运作。哈萨克斯坦国立法拉比大学在鄂木斯克市开设分校，成为在俄罗斯的首家哈萨克斯坦高校分校。俄语是将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哈萨克斯坦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使用俄语接受教育。^②

在 2024—2025 学年，800 名乌兹别克斯坦大学生获得俄罗斯大学的政府资助名额，而在 2025—2026 学年，名额增至 810 人。截至 2025 年 4 月，在俄罗斯学习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达 5.6 万。乌兹别克斯坦共有 14 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在独联体国家中数量最多。俄罗斯高度赞赏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族际和谐、俄语地位、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约 100 万俄族同胞利益所作的努力。俄语作为乌兹别克斯坦 130 个民族的族际沟通手段，其作用非常重要。^③

2023 年 10 月 23 日，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提议，独联体元首理事会签署《关于建立俄语国际组织的条约》。该组织是具有国际法人资格的国际性政府间组织，旨在加强俄语作为国家间交流语言、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正式或工作语言的地位。^④该组织最高机构为部长级会议，成员包括各国政府相关部委负责人。秘书处为常设工作机构，设在俄罗斯索契市。秘书长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⑤

军事领域。首先，俄罗斯继续利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安全领域发

①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② Президенты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делали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СМИ. 2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684#sel=2>

③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④ Страны СНГ учреди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13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ria.ru/20231013/sng-1902615497.html>

⑤ Уста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13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supplement/6026>

挥主导作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成员国。该组织每年组织多场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编有 1.5 万—2 万人的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由成员国国防部、内务部和紧急情况部派出。平时驻扎本国，履行同盟义务时转归集安条约组织指挥。上述机制、部队和训练，在 2022 年初协助哈萨克斯坦平息“一月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俄罗斯是唯一在中亚拥有军事存在的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萨雷沙甘靶场等，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坎特空军基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第 201 军事基地等。第三，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有地区联合防空体系。其中，俄、哈、乌空防军自动交换空情，组织联合防空战斗值班。俄、吉、塔防空部队之间因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限制，只能进行信息的非自动化交换。第四，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军事装备技术合作，按俄罗斯国内价格提供防空系统、雷达、作战飞机、武装直升机、装甲汽车等各型装备。第五，俄罗斯继续大量培训中亚国家高级将领和军官。例如，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卡萨诺夫中将曾就读于俄罗斯阿尔马维尔高等军事航空学校、加加林空军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别克勃洛托夫中将曾就读于列宁格勒高等炮兵指挥学校和总参军事学院，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索比尔佐达中将曾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合成军事学院。

六、余 论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全球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地缘、人口、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二是制度稳定性、民族凝聚力、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三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战略能力，如国际战略理念和行动能力、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国际盟友体系等。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大国博弈的新内涵：关键在于更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变化，运用更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创更合理的生产方式，建立更完善的国家形态，确立更和谐的文明共处模式，提出更有号召力的国际合作理念。

当前在俄乌冲突逐步接近尾声的背景下，俄罗斯可能更趋保守，强调自

己是独特的“文明体国家”，^①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②更多依托自身传统文化和政治理念，不惜与现代文明有所割裂。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可能会继续缓慢下降，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趋势恐难逆转。但与此同时，由于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未必完全匹配，内部动因与外部影响时有抵触对冲，这一进程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其间也可能出现多次反复。特别是俄罗斯保有对中亚影响力的极大存量，继续吃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本”，目前看不成问题。

中亚国家的地区主体性有所提升，将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希望通过新一轮“去俄化”拓展新的发展路径，更广泛地参与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在确保与俄罗斯不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借助各方力量对冲俄罗斯的强势。但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传统联系仍十分紧密，未来发展难以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只能力图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和密切的国家间关系，在大国博弈中分散风险、趋利避害，根据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相应调整外交政策。

回顾历史，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起伏跌宕近 500 年。双方一直试图厘清“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区别，探寻符合各自利益的相处之道。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

① 俄文为“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强调俄罗斯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明。此概念在官方文件中首次见于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而后普京多次提及，引起俄罗斯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将“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试译为“文明体国家”的主要考虑：一是译为“国家-文明”或“文明国家”略显生硬，不太符合汉语习惯。二是译为“文明型国家”，将俄语的并列结构改为偏正结构，未必忠实原意。已有多位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的俄译应为“Государств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② 2022 年 9 月 21 日，普京在纪念俄罗斯建国 1160 周年音乐会上表示：“我们的文明独具一格，拥有自己的道路。”См.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концерте, посвящённом 1160-летию за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21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ve nts/president/transcripts/6939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is marked b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and thus cannot be easily explained by conventional paradigms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Instead, it must be examin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arly 500 years of interactions, and from historical, ethnic, and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s. The “change” in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arises from the ent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o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where the dynamics of a “once-in-a-century” global shift intertwine with regional restructuring. The “continuity,” however,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sha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great powe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autonomy of regional states, remains unchanged. The dominant side of this contradiction continues to be external powers, with Russia at the forefront. Yet, the intensity of this contesta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threshold where quantitative change turns into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Historically, Russia has undergone three cycles of “rise and decline” and has yet to find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both adapts to domestic and external realities and suits its own conditions. Nonetheless, relying on strategic resilience, it continues to endure adversity, stressing its unique identity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 and pursuing a distinct “Russian path” outside mainstream global trend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entral Asia has witnessed a third wave of “de-Russification.” However, this does not signify a turn to anti-Russian or pro-Western orientations; rather, Central Asian states continue to follow a diversified, balanced, pragmatic, and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line. At present, Russia, with an eye to the “post-Russia-Ukraine conflict era”, seeks to capitalize on its distinctive geopolit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advantages in an attempt to reinforce its influence over Central Asia. Yet it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 of a gradual decline in its strategic primacy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Central Asian States,

Nation-State Building

【Аннотац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никальны и сложны, что затрудняет прям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соседними малыми и средн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чти 500-летнего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хватывающ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аспекты. «Переменны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контекстом нового периода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сложны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м веков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конста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тем, что основны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м,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общ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её будущ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остаётся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м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и автономие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условлен внешними сил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оссией, и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ещё не достигла крит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перехода от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к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ла три цикла «взлёта и падени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нашла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менимую к её внутренним и внешни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 и отвечающую её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реалиям. Однако Россия, облад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подчёркивая свою уникальную позици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выбира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уть», стоящий вне рамок мировых тенденций. На фон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ли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ми или даже п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Напротив, он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проводить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ую,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прагматичную и проактивну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периоде «пос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спользуя свои уникаль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в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е,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это не переломит к лучш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снижения её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责任编辑 崔 珩)

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与前景研究*

周明 林宇晴**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亚地区“C5+1”多边合作机制盛行。然而，对于各国在“C5+1”机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合作结构及中亚各国的不同态度，既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通过引入“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概念，本文尝试对“C5+1”合作的深层特点与中亚国家在合作中的能动性形成新的认知。通过互动，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不同类型的“C5+1”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偏正式“C5+1”机制基于实力差异，强调“正”位的主导性和谐；俄罗斯维系式“C5+1”机制凭借相互依赖和霸权克制强化既有联系；中国共生式“C5+1”机制中，各主体的平等参与促进了和谐共生。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亚各国对不同类型“C5+1”机制的态度不一。当前，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是否关注中亚国家诉求等因素影响了三种“C5+1”机制类型的发展。如何有效优化“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合作结构，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

【关键词】“C5+1”机制 中国与中亚 俄罗斯与中亚 美国与中亚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093(42)

近年来，域外行为体相继与中亚五国召开“C5+1”元首级别峰会，并将机制提质升级。^①日本（2004年）、韩国与欧盟（2007年）等域外行为体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3VXJ03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24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战略发展专项项目“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jbkyzx003）资助。

** 周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林宇晴，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① “C5+1”多边合作机制是指以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域外行为体为一方，以中亚五国为另一方的综合性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内容。

率先与中亚五国建立外长级“C5+1”会议机制。2015 年，美国最先尝试与中亚国家启动“C5+1”合作机制，印度和俄罗斯（2019 年）、中国（2020 年）随后也建立了相应机制。至此，外长级“C5+1”对话机制已成为域外行为体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平台。不仅如此，印度和俄罗斯还在 2022 年竞相推动“C5+1”机制升级为元首级别；中美则在 2023 年将机制进一步提升为元首会晤机制。尚未建立外长级“C5+1”会议的德国则直接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元首级别会晤机制。2025 年，欧盟-中亚峰会和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已顺利召开，而且第二届海合会-中亚峰会和第二届俄罗斯-中亚峰会也正在酝酿之中。至此，元首级“C5+1”机制已成为域外行为体在中亚地区推进合作的关键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C5+1”机制在产生和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细化、扩散以及竞合等多重现象。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主导的背景下，各国在“C5+1”机制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合作结构？中亚国家对不同类型的“C5+1”机制秉持何种态度？基于此，本文以“C5+1”多边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尝试厘清“C5+1”机制的类型和运作逻辑，以期为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提供参考。

一、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文献回顾

当今，除大国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多边合作外，^①许多中小国家也在探索一种“中小国家组织机制+大国”的多边合作模式，旨在借助大国的力量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②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反映了“大国+中小国家”这一多边合作发展的新趋势，彰显了大国积极参与中亚事务并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决心，更体现出大国间博弈的加剧

① 方军祥：“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东南亚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14-17 页；扈大威：“走向‘有效的多边主义’——试析欧盟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5 期，第 43-48 页；G. W. Downs, D. M. Rocke, P. N. Barsoom, “Managing the Evolution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 Vol.52, No.2, pp.397-419; R. E. Wilson, S. Torjesen eds., *The Multilateral Dimension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15-34.

② 杨洁勉：“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挑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3 期，第 7 页。

和中亚地区国际影响力的上升。

学术界对中亚各类“C5+1”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聚焦大国发起的“C5+1”机制，关注其如何通过议题吸引、机制创新及联动等方式，增强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对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产生的影响。^①二是在中亚地区整体发展的新态势中研究“C5+1”机制，考察域外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及中亚国家对“C5+1”机制的作用。“C5+1”机制竞争既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结果，也得到中亚各国的默许甚至积极参与。一方面，大国纷纷加大对地区资源的争夺，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中亚国家也在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不同的“C5+1”机制在中亚地区形成了竞合关系。^②

当前，有关中亚“C5+1”机制的研究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中亚国家的主体性作用。中亚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出现通常被视为大国博弈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大国发起的“C5+1”机制，并侧重探讨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视角下，中亚国家自身的角色和作用往往被低估或被忽视。尽管该机制由大国主导，但中亚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参与，对于机制的运作不可或缺。因此，中亚国家在该机制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分析。二是既有研究忽略了国家在机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结构特征。现有研究集中分析了“C5+1”机制兴起的原因、机制的现状及其在中亚地区整体发展中的新态势，体现出学者侧重从宏观层面分析“C5+1”机制。但机制结构这一微观因素未得到充分关注。实际上，各国

① 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第59-75页；韩豪杰、金新：“中国、美国、俄罗斯‘C5+1’机制的比较与评析”，《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1期，第174-196页；邓轲：“大国与中亚国家间‘C5+1’对话机制的发展现状、动因与前景”，《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78-85页；Z. Kakenov, “U.S.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ithin the C5+1 Initiative: Trend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2024, Vol.93, No.1, pp.69-78.

② L. Alfred, K. M. Sean, M. Rubly, Y. Shokh, M. Tsitsishvili, R. Weitz, “US Policy towards Central Asia Under Trump”, *Revista UNISCI*, 2017, No.45, pp.41-66; 曾向红、庞卫华：“美国对华竞争加剧背景下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新变化”，《国际展望》，2023年第3期，第115-134页；杨双梅：“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第80-99页；顾炜：“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建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105-130页。

在中亚“C5+1”机制中的互动不仅为其兴起和扩散提供了动力，还塑造了特定的合作结构，这值得进一步探讨。三是既有研究以描述性为主，理论性研究较少。已有学者运用理论从整体上分析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态势，如“无声的协调”、^①“错位的竞争”^②等概念的提出，为更好地理解中亚“C5+1”机制的兴起和扩散提供了有益视角。但关于“C5+1”机制的结构特征及其行为影响的研究有限，仍需作进一步研究。

二、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及其运作逻辑

在“大国+中小国家”这一多边合作趋势中，大国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与中小国家共同构建起各具特色的合作结构。在偏正结构下，他国向自身运作权力或自身向他国运作权力时，均会根据传统的行为逻辑与生存心态去推测每一种行为会引起怎样的权力结构变化。^③在维系结构中，前政治实体消亡后新产生的独立国家，由于各国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使得去一体化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的成本。^④在共生结构中，各国从互为主体的情境出发，审视“自我”与“他者”，倡导主体间的协同、依赖、联动与共存。^⑤因此，本文拟对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其运作逻辑。

（一）“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

偏正结构源于汉语语法的构词方式，体现了中心语与修饰语之间的特定关系，其核心特征在于名词通常需要用形容词进行修饰。在汉语中，“中心”一词既指中央或中间位置，也可引申为事物的核心、重点、重心以及正中间

① 曾向红：“‘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0 期，第 42-70 页。

② 曾向红、王子寒：“‘错位的竞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23-48 页。

③ 周亚越、虞昊：“官僚场域中权力的偏正结构关系”，《领导科学》，2018 年第 27 期，第 21 页。

④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1-16.

⑤ 艾诗根：“走出轮回：共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教育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60 页。

的部分。与之相对，“偏”则用来描述位于旁边、侧面的元素，或者是次要的、倾斜的、辅助性的成分。

“偏正结构”这一术语最初由学者翟学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学者提出最接近偏正结构的主从结构，^①但其内涵并未超出前者。翟学伟强调，在社会交往的情境中，面子往往是相互赋予的。然而，从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地位背景出发，会随之形成一种单向性的力量，即结构性压力或权力。该力量确保在互动中有地位的一方，无论其行为表现如何，均能通过另一方给面子的方式维护自身的面子。^②基于此，翟学伟将“偏正结构”界定为：为确保面子的有效维护，会形成一种与之相协调的表达性结构。^③在这种结构中，权威总是（合法性地）同正确性画等号，脸面的运作又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维护面子的方向发展。

“偏正结构”在国际社会中亦有所体现。位置现实主义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划分为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强调二者相互联系。实力地位即权力差距大小，秩序地位则指现有国际制度规则是否有利于国家，以及国家是否具备影响现有秩序运作的能力。^④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实力差异所带来的权力差距大小，导致各国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地位。这种差距随之形成一种单向性力量，即实力较强的国家对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结构性压力。换言之，偏正结构即互动中的地位认定：实力较强的国家在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即所谓的“正”位，而实力较弱的国家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偏”位。^⑤通常情况下，实力较强的国家更关注如何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权力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⑥而实力较弱的国家由于受到自身实力限制，在现有的

① R. Thaxton, “Tenants in Revolution 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Modern China*, 1975, Vol.1, No.3, pp.323-358.

②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71页。

③ 翟学伟：《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④ 宋伟：“国际秩序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120-121页。

⑤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8页。

⑥ 宋伟：“国际秩序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121页。

国际力量结构之下寻求从配合维护大国的行为中获益，或改变某些不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规则。

综上所述，本文将“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界定为：通常情况下，在多边合作机制中，由于各国相对实力的差距，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即“正”位，而中小国家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偏”位。也就是说，这一结构性压力确保互动中占主导的一方（无论其表现如何）均通过另一方配合维护的方式使机制朝着“正”位设想的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偏正结构是一种包含决策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客观机制结构，不涉及结构是否合理或者合法的评判。

人与国家均具有主体性和关系性，因此国际关系可看成是国家行为体主体性和关系性的结合。^①在国际体系中，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会配合维护实力较强的国家发起多边合作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以获益。从国家角色互动的角度看，中小国家的这一倾向促使了偏正结构的形成，从而有助于促成多边合作机制在结构上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然而，这种偏正结构并非绝对，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消长，偏正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在特定情境中，中小国家甚至能够翻转偏正结构，确立自身在情境中的“正”位位置。

“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的运作逻辑如下：首先，明确谁是中心、谁处偏位。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实力通常决定其能否在特定多边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多方合作机制内，尤其在“大国+中小国家”组成的机制中，美国、印度、德国等主要行为体有可能处于主导和核心的“正”位，从而发挥着引领和决策的关键作用；而中小国家则相应地处于辅助和支持的“偏”位，更多地扮演着参与和配合的角色。其次，确立中心。这意味着权威性的确定。因为一旦中心得以确定，“正”位和“偏”位国家将在这种互动中建构出一种给面子式的关系，所以，偏正之间并非总是对立，其还存在和睦、协调、顺从和附和等多种类型的关系模式。^②最后，中小国家配合维护机制

① 尚会鹏：《人、国家与国际关系：心理文化学路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21 页。

② 翟学伟：《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48 页，第 255 页。

的倾向，确保了机制在结构上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中小国家主动配合、参与并维护机制，从而使“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维持一种主导性和谐的状态。各国均有机会就自身关切的治理问题进行交流、推进落实，从而确保机制顺畅运行。二是中小国家出于结构性压力被动配合和参与机制。中小国家往往采取表面上顺从和配合，但实际上却阳奉阴违的策略，以维持表面形式上的和谐，同时确保本国利益不受损害。这种方式虽维持了该机制表面的稳定，但却隐藏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

（二）“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

亚历山大·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将后苏联空间内的一体化定义为“维系式一体化”（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认为“维系式一体化”是一种地区一体化形式，由一组曾经共属一个单一政治—经济体（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国家发起，在初始阶段就具备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①与欧洲“聚合式一体化”不同，“维系式一体化”因去一体化成本高于维持现状成本，且国家间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故而能促进它们重新走向一体化之路。^②这也是中亚区域一体化的独特之处。

“维系式一体化”的目标是在原有联盟框架之外或维持既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或提升这些联系的水平。^③为实现这一目标，其一体化所采用的机制可能是根据当前形势和需求新创设的，也可能是沿用过去已经存在的某些机制。这些机制的核心在于减少创建机制的成本并保障机制的运作。

综上所述，本文将“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界定为：通常情况下，在多边合作机制中，一些国家曾属于单一政治—经济体，初始阶段就拥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赖程度，彼此间构建新机制的成本较高，因此各国选择沿用过去的某些机制或创建新机制以维系原有机制。“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依托共同拥有的历史经济联系，不必从零开始构建合作进程，其目的在于维持并强化既有联系。

①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1-16.

②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3-144页。

③ 同上，第143页。

“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介于“偏正式”和“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之间，兼具团结和分裂的特点。如前文所述，“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国家曾属于单一的政治-经济体，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经济联系。各国愿秉持民主和平等原则，在对话和理解中发展关系。故这些国家在机制的初始阶段便拥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互动框架，使得各方能够在已有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合作内容，从而更加高效地实现共同目标。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紧密的经济纽带，这些国家在合作机制中具有共生发展的潜力。实际上，“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的本质是霸权与竞争。在机制内，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而是存在地位等级差异。大国凭借资源、资金、技术等优势在机制中获得更大权利，既存在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偏向，也导致各国在资源分配、话语权重以及决策影响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在机制外，大国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对机制内的中小国家与其他大国之间开展合作持谨慎和警惕的态度，认为此类合作可能削弱自身在机制中的影响力，故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机制竞争力。因此，“维系式”亦有可能转变为“偏正式”。但“维系式”与“偏正式”的区别在于：大国在机制内实行的是一种克制的霸权。建立在共有观念、经济联系、对话理解等共识性基础上的霸权，同样也是对大国霸权的约束。^①

“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的运作逻辑如下：首先，前政治实体消亡后，新产生的独立国家从推进机制伊始就保持着较高的相互依赖。“维系式”源于更大政治实体的瓦解，各国通常拥有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历史，并且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这一认同感不仅体现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更深入到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领域。正是这种基于共同历史和身份认同的紧密联系，为各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维系式”依托现有的贸易、投资和设施等经济联系，根据新形势和新需求选择沿用过去的某些机制或创建新机制以维系原有机制。对于国家而言，从零开始构建全新机制的成本往往高于维持既有基础机制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普遍倾向于在已有联系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与

^① S. Roberts, U. Ziemer, “Russia’s Leadership in Eurasia: Hold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4, Vol.68, No.3, pp.1-13.

整合,以避免额外的经济负担和资源消耗,而这又成为推动国家追求更广泛合作的动力。基于此,“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除维系和强化既有联系之外,还将使一体化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也更可能最终达成一体化。

最后,大国维系合作机制的倾向保障了形式上的一体化。当大国发起或者加入区域机制时,就意味着其既享有特定的霸权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①机制中的大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目标,往往会向中小国家提供惠及地区的公共产品,以维持和强化既有合作关系,为形式上的一体化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但大国和中小国家在自然和人力资源、经济和军事能力,以及非物质资源等方面的不对称,亦使得大国在机制内的决策和行动存在偏正的可能性,即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在区域和全球的霸权地位,而忽视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或违背公平合作的原则,进而对中小国家形成了单向度压力,最终可能转变为“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尽管那些资源获取较少的国家仍会维持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以便从中获取利益,但也不能排除有些国家在机制中可能存在“偏好伪装”^②的现象。因此,“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在形式上的整合,虽保障了结构的连续性,但未必能消除内部利益分歧。所以,此机制呈现出团结与分裂并存的特点。

(三) “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

“共生”(Symbiosis)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安东·德巴里(Anton de Bary)提出,描述不同生物之间相互关联、共同生存的现象。随后,由学者袁纯清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构建了共生理论的核心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③在共生理论的框架下,各要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借助复杂的互动,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共生单元的多样性决定了共生关系的丰富性。共生模式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单元如何在动态中寻求平

① S. Roberts, U. Ziemer, “Russia’s Leadership in Eurasia: Hold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4, Vol.68, No.3, p.4.

② “偏好伪装”即当其他人掌握主动权或处置权时,你就会恭维他,让他感觉到你随时与他保持一致。参见[美]第默尔·库兰著:《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丁振寰、欧阳武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年,第4页;曾向红、李琳琳:“身份焦虑与偏好伪装——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民调偏差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1页。

③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47页。

衡，既可以是互惠共赢的合作形式，也可能是基于特定规则的竞争与协调并存的状态。而共生环境不仅为共生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共生模式的选择与调整。

基于此，学者金应忠将“共生”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强调“共生”应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①共生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聚焦于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化组合及创新。^②在国际关系中，共生理念强调国家之间互为主体，各国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协商解决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和谐共生。^③这一概念倡导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通过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以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关系模式应对全球性挑战。

综上所述，本文将“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界定为：通常情况下，在多边合作机制中，“自我”和“他者”互为主体，各国相互依赖，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一致的途径化解矛盾与冲突，进而构建一种和谐共生的互动模式。

“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既不是对“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汲取上述两种多边合作机制模式的合理性基础上，构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共生共长的生态。

与“偏正式”和“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中各国将他者视为客体的情况不同，在“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里，各个国家均被视为平等的参与主体。在这一机制下，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被赋予了同等的重要性和地位。大国不仅扮演着引领和推动的角色，更承担着协助中小国家共同发展的责任。在共生式结构中，大国积极支持和引导中小国家在多边合作机制中逐步认识到自身不应当仅是被动的参与者，还应是机制中的主体和责任国。这种认识的转变，有助于中小国家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推动大国与中小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成长和发展，最终达到合作共赢。

①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第 12 页。

② 艾诗根：“走出轮回：共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教育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60 页。

③ 任晓、门洪华、刘雪莲等：“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实回应和未来展望”，《国际观察》，2023 年第 6 期，第 79-83 页。

“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的运作逻辑如下：首先，明确共生单元均为平等的参与主体。在国际社会中，不同单元在资源、能力以及目标上的差异为其相互补充和协作提供了基础。通过平等参与，各国能够在合作中找准自身定位，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其次，各国在共生模式中可根据具体的合作情景“随时转换”自身所承担的角色。^①例如，在某些情境下，一个国家可能以引领者的身份出现，推动合作的大方向；而在其他情境下，这个国家则可以转变为支持者或参与者，为整体合作提供必要的资源或协助。通过动态调整角色定位，各国能够在共生模式中实现更高效的合作，促进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这种基于实际需求的“随时转换”，也进一步体现了共生模式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最后，各国通过合理参与，形成积极主动的共生环境，推动各方实现相互成就。唯有互为主体的共生单元均合理参与，各国之间才有可能产生双向的交互作用。这一过程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在文化和制度层面实现深层次的融合。在“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中，各国能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固的合作机制，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并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表 1 多边合作机制类型的区别

区别 \ 类型	“偏正式”多边合作机制	“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	“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
对象	主体-客体	主体-客体	主体-主体
起点	实力差异	相互依赖、霸权克制	平等参与
目的	主导性和谐	维持或强化既有联系	和谐共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以下，本文将中亚多个“C5+1”多边合作机制为例，检验前文提出的三种多边合作机制类型，尝试论述中亚国家对不同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立场与回应。

^① 艾诗根：“走出轮回：共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教育科学》，2017年第5期，第57页。

三、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与特点

近年来，域外行为体已逐渐认识到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并试图将这一变化转化为扩大自身在中亚影响力的关键契机。当前，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域外行为体与中亚国家建立的“C5+1”元首级别机制，均为“大国+中小国家”的合作结构。本文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为例，着重分析这三个在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与中亚国家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中的深层特点。

（一）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

2022 年起，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迎来了升级浪潮。但在升级后的“C5+1”机制中，国家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如表面那般和谐，各国在机制内形成了“差序互动”^①格局，并演化出了三种合作结构。

1. “偏正式”：美国主导的“C5+1”多边合作机制

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中，美国因自身实力处于“正”位，而中亚五国则处于相对较次要的“偏”位，由此构成了“偏正式”的合作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C5+1”机制中核心地位的确立需要中亚国家的参与和配合。

虽然美国较早与中亚国家建立“C5+1”机制，但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中亚国家并不是重要战略区域。虽然美国在“C5+1”机制内开展了众多合作项目，但直到 2019 年，美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仅 26 亿欧元，不足 2019 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268 亿欧元）的十分之一。^②而 2019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额为 262.07 亿美元，进口额为 202.76 亿美元。^③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利用与中亚国家的“C5+1”机制操弄涉疆反华

① 任何国家总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判断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关系，依据不同情境下利益关系的不同，形成差异化的互动形式。参见曾向红、张峻溯：“敌友难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差序互动模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6 期，第 35-36 页。

② Ali Akbar Jokar, “Russia and China, Prime Targets in New US Strategy on Central Asia”,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12, 2020, <https://www.ipis.ir/en/newsview/610072/russia-and-china-prime-targets-in-new-us-strategy-on-central-asia>

③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Future Outlook”, May 20, 2021,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and-central-asia-bilateral-trade-relationships-and-future-outlook/>

议题。^①美国要求中亚地区在美西方与中俄之间“选美”的做法，不符合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尽管中亚国家最初对美国抱有较高期待，且由哈萨克斯坦率先提出与美国建立“C5+1”机制，但美国只想着推进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使“C5+1”机制沦为空谈俱乐部，令中亚国家失望。^②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成为美国推动“C5+1”机制提质升级的关键契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提升了对“C5+1”机制的重视，进一步将中亚地区视为对俄博弈中可争取的中间地带，对其进行拉拢。一方面，美国通过提高“C5+1”机制的级别并加强与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安全联系，试图削弱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2022年美国明确表示希望中亚与俄罗斯脱钩；^③又提出“中亚经济可持续性倡议”（ERICEN），并提供2500万美元的资金。^④另一方面，美国进一步细化合作机制，建立“C5+1关键矿产对话”（CMD），对该地区关键矿产的开采和加工进行投资。2025年4月，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后，中国对稀土相关物项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为此，美国积极寻求在中国之外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样化，探索拥有可观储量的新兴市场。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地区蕴藏着近15种稀土元素，已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区域。^⑤2025年5月美国与中亚国家举行了第二次“C5+1关键矿产对话”，各方将在工业关键矿物领域建立并发展合作。

美国在合作中占据“正”位并发挥关键作用，推动“C5+1”机制从进展缓慢转向提质升级。在这一过程中，“C5+1”机制发展速度的快慢以及发展方向的规划调整，均深受美国的影响与掌控。而处于“偏”位的中亚国家也意识到，将“C5+1”机制作为平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①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with Central Asian (C5) Foreign Minist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2, 2019, <https://2017-2021.state.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with-central-asian-c5-foreign-ministers>

② S. Frederick Starr, “End Game in Central 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 Insights*, June 26, 2023,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articles/end-game-in-central-asia>

③ Бордачев Т., Рекеда Д.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22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tsentralnaya-aziya-i-ukrainskiy-krizis/>

④ Efgan Nifti, Samantha Fanger, “U.S. Supports Trans-Caspian Trade and Transport Diversification”, *Caspian Policy Center*, March 2, 2023,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security-and-politics-program-spp/us-supports-trans-caspian-trade-and-transport-diversification>

⑤ Ayushi Saini, “Analys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US-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March 27,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analysing-the-limitations-of-the-us-central-asia-partnership>

不仅有助于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还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2. “维系式”：俄罗斯发起的“C5+1”多边合作机制

当前，中亚地区合作进程处于“维系式一体化”，并与国家的多重转型相伴而生。^①俄罗斯基于与中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继承自苏联的共同能源基础设施，试图维系并强化与中亚国家的既有联系，由此构成了“维系式”的合作结构。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共有的历史和经济联系，使得前者将后者视为其“软腹部”。俄罗斯不仅着重强调与中亚国家之间共有的地理位置和既有的经济联系，还指出共同的“历史命运”是双方关系的根基。^②在安全层面，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拥有建立军事基地的专属权利，并密切关注中亚五国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的政治互动。在经济层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较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拥有相似的经济体系，且俄罗斯掌控着主要的天然气管道和贸易通道。在文化层面，俄语是中亚国家除民族语言之外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俄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工具，彰显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尽管部分中亚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未与俄罗斯接壤，但它们在地理区位上的关联性难以完全割裂。共同的历史和语言又进一步推动了各国之间的互动。相较于当前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有更多的共同点，更具备共生发展的潜力。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延宕导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与投入有所减少。各域外行为体也纷纷借助“C5+1”多边合作机制，试图填补该地区出现的势力真空。中亚各国也积极建立地区认同，部分国家甚至关闭了来自俄罗斯的宣传渠道，以削弱俄罗斯在认同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③中亚国家曾在诸多领域对俄罗斯存在高度依赖，但这一局面正在逐渐发生转变。一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在失去大部分欧洲市场后，积极寻求向包括中亚在内的

① 杨恕、王术森：“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51 页。

② S. Roberts, U. Ziemer, “Russia’s Leadership in Eurasia: Hold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4, Vol.68, No.3, p.4.

③ Otabek Akromov, “Central Asia: The Last Stronghold of a Declining Russia?” August 19, 2024, <https://www.e-ir.info/2024/08/19/central-asia-the-last-stronghold-of-a-declining-russia>

国家出口天然气。原本向俄罗斯输送天然气的管道现已改道，转而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供应俄罗斯天然气。^①二是俄罗斯经济亟需来自西方的高质量创新技术。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其他限制，俄罗斯难以进口这些技术产品，不得不依赖部分中亚国家的市场作为转口枢纽，这在无形中加深了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依赖。

面对美欧的经贸和融资限制，中亚市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故俄罗斯将“C5+1”机制作为维系和强化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平台，^②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互动。2022年2月—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亚五国，并与五国领导人举行了50多次会议。^③2022年10月，俄罗斯在首届“俄罗斯-中亚”领导人峰会中提议中亚五国加入其大规模进口替代倡议，在重新配置与中亚国家金融结算类似的系统机制的同时，希望与中亚国家建立新的跨欧亚交通走廊。2023年6月，在“俄罗斯-中亚”安全理事会秘书首次会议中，各方对进一步扩大在经济、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这些合作均可看作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霸权克制的一种表现，旨在巩固其在中亚地区的地位，并应对美国和西方等在该地区的活动。

俄罗斯维系机制合作的倾向保障了形式上的一体化。俄方积极利用“C5+1”机制巩固和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水平和战略互信，将其主导的多边组织与“C5+1”机制紧密联结，通过维系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增强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的回旋空间。尽管中亚国家普遍持谨慎态度，不愿在俄罗斯与美国、西方的对立和冲突间作明确选择，但考虑到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以及与中亚地区在文化、历史和民族联系上的深厚纽带，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持续存在，还不断加深。

3. “共生式”：中国与中亚国家倡导的“C5+1”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中亚精神”植根于中国和中亚五国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

① Otabek Akromov, “Central Asia: The Last Stronghold of a Declining Russia?” August 19, 2024, <https://www.e-ir.info/2024/08/19/central-asia-the-last-stronghold-of-a-declining-russia>

② Alexandra Sitenko,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are stepping up their gam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ips-journal.eu/topics/foreign-and-security-policy/the-central-asian-states-are-stepping-up-their-game-7020/>

③ Temur Umarov,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Never Closer, or Drifting Apart?” *Carnegie Politika*, December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2/12/russia-and-central-asia-never-closer-or-drifting-apart?lang=en>

念和价值。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均为平等参与的主体，秉承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理念，坚持深化互信和同声相应的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坚持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的精神，由此构成了“共生式”的合作结构。

“C5+1”多边合作机制作为专司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平台，自创立之初便得到有关各国的重视与大力支持。2023 年 5 月，中国与中亚五国举办了首届元首峰会，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2025 年 6 月，各方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共商合作大计，共绘发展蓝图。相较于《西安宣言》达成的 54 项合作共识，《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达成的合作文件多达 86 项。^①这表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正深化互信、同声相应，各方合作的精神凝聚力和理念向心力正持续强化。

针对和平赤字，中国借助“C5+1”外长和元首会晤机制，与中亚五国均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主权、安全和领土问题上相互予以明确、有力支持。在两届峰会上，中国均明确表示坚定支持中亚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并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中亚领导人也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在台湾和新疆问题上的主张。各国在主权和安全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理念，对彼此发展路线的相互支持，体现了共生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

针对发展赤字，中国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下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积极主动地对接各国经济政策，以投资、合作、援助带领中亚国家产业转型、脱贫攻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为回应中亚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国宣布将在“C5+1”合作框架内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而中亚国家也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积极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市场拓展提供支撑。各方在合作情景中找准自身定位，“随时转换”自身角色作用，以实现更高效的协作。

针对安全赤字，中国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① “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75140.htm；“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497.htm

与中亚国家进行反恐、网络、生态等领域的安全合作，并积极支持中亚国家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撒马尔罕团结倡议”、“杜尚别进程”。中国的目标并非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者或填补权力真空，^①相反，中国致力于与中亚国家携手打击“三股势力”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构建一个和平安宁、休戚与共的地区安全格局。

针对信任赤字，中国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下与中亚国家共建“文化丝绸之路”，互设文化中心、建设鲁班工坊、互办文化年，积极支持中亚国家举办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支持世界阿哈尔捷金马协会和阿拉拜犬协会活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项目丰富了中亚学生对中国的认识。诸多在华留学生对中国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相当一部分人还熟练掌握了普通话。这一转变促使中亚地区的精英群体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加的参与减少了疑虑。^②

无论是在倡议层面还是在实践中，中国始终将中亚国家的诉求纳入考虑范围，各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均在稳步发展。这一举措在凸显中国对战略纵深追求的同时，还积极推动中亚各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到“C5+1”多边合作机制中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达到互利共赢、和谐共生。

（二）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特点

不同类型的“C5+1”多边合作机制各具特点。美国主导的“C5+1”机制转向务实与施压并行；俄罗斯将“C5+1”机制视为维系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手段；中国与中亚国家则在共生式“C5+1”机制中践行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之道。

1. 美国在“C5+1”机制中的务实转向与施压并行

一旦偏正结构形成，就意味着服从、遵从、依附并忠实于“正”位，有维护、互补之义，即所谓确定中心的过程也是要求偏位聚拢围绕的过程。^③由

① Xiaoli Guo, “Explaining China’s Central Asia pivot”, *the-interpreter*, May 26, 202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explaining-china-s-central-asia-pivot>

② Niels Drost, Giulia Cretti and Babette van Giersbergen, “China’s consolidated position”, *Clingendael*, January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2025/central-asia-emerging-from-the-shadows/6-chinas-consolidated-position/>

③ 翟学伟：《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

于实力差距导致的权力差异，在最初的偏正式“C5+1”多边合作机制中，美国向中亚国家提供合作形式，后者通常选择接受。原先，美国积极地在其主导的“C5+1”多边合作机制中推行民主政策，试图将本国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和政治模式施加于中亚国家，以此塑造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进而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美国的民主促进政策造成了中亚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①美国通常将中亚地区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人权和法治政策的中介支点。但即便在美国国内，将规范性价值观付诸实践也颇具挑战。其在外交政策中践行这些价值观同样面临困难，因为它们往往与其他紧迫的利益发生冲突。^②因此，美国在“C5+1”框架内推行规范性力量的举措受阻。

然而，在制度竞争背景下，中亚国家完全有可能（无意识地）通过关系网络的方式重新分配权力，并在某些情境下翻转原有的偏正结构，确立自身的“正”位。随着不同类型“C5+1”机制的不断涌现并持续增多，中亚地区的合作出现了制度竞争态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改革以及乌克兰危机，为美国在中亚地区重塑信誉提供了机会。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布局，由此前的强调民主政策转向更加注重务实合作。一方面，美国降低人权与民主调门，提倡保护女性、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迂回地支持中亚国家民主转型。在美国-哈萨克斯坦人权和民主改革高级别年度对话中，双方强调通过“C5+1”平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弱势、边缘化人口及残疾人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鼓励加强公私联系以促进贸易。2024 年，美国设立了“B5+1”论坛，该论坛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策略，致力于打破阻碍外资流入的贸易壁垒。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所有中亚国家均派遣政府代表团出席了“B5+1”论坛。该行为明确表达了中亚地区各国对“B5+1”概念的兴趣。各方普遍认为，地区一体化进程，加上私营部门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将打破中亚地区在贸易上相对孤立的状态，从而使中亚成

① Otabek Akromov, “The US Approach Towards Central Asia Revisited”, *The Hague Research Institute*, September 2024, <https://hagueresearch.org/the-us-approach-towards-Central-asia-revisited/>

② George Krol, Nargis Kassenova, “How Will U.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Look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avis Center*, March 16, 2021, <https://daviscenter.fas.harvard.edu/insights/how-will-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look-under-biden-administration>

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①美国对中亚外交政策的最新变化表明，美方意图把握这一关键时机，优先发展务实合作关系，而非延续以往的民主优先策略。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对抗进一步加剧。美国不仅采取制裁措施警告中亚国家不要与俄罗斯建立过于紧密的关系，^②还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下就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展开商讨。尽管美国作为极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能够为中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径，并向中亚国家提供从俄罗斯难以获取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但其在“C5+1”框架内进行政治施压的举措，或引发中亚国家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不信任。

2. 俄罗斯将“C5+1”机制作为维系关系的一项重要手段

对于俄罗斯而言，地区共同体不仅是未来发展的目标，而且也是曾经过往的历史。^③基于与中亚国家在文化、历史和民族联系上的深厚纽带，俄罗斯支持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欧亚一体化。对于美国在 21 世纪初期试图西方化欧亚国家的尝试，俄罗斯作出了激烈反应，不仅对欧亚国家的政权当局给予支持，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还进行了俄格战争。在乌克兰危机导致美国 and 西方国家加大对俄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推行欧亚一体化的需求更加紧迫。为此，俄罗斯将“C5+1”多边合作机制视为推动欧亚一体化的重要平台，目的是维系自身与中亚国家的共同利益、相互信任以及现有的多边机制。

在“C5+1”机制中，俄罗斯主要关注维系与中亚国家共同的安全、发展等议题。中亚紧邻阿富汗，是阻止三股势力和有组织跨国犯罪等安全风险外溢至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区域。俄罗斯不仅在“C5+1”框架内强调防止阿富汗内战再次发生符合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利益，还就阿富汗问题与中亚国

① “United States launches initiative to foster Central Asian connectivity”, *Eurasianet*, March 14, 2024, <https://eurasianet.org/united-states-launches-initiative-to-foster-central-asian-connectivity>

② Maximilian Hess, “The impact of Russia Sanctions o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4/12/the-impact-of-russia-sanctions-on-central-asia>

③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142 页。

家进行持续磋商。此外，俄罗斯对于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合作秉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构建新的供应链，保障合资企业的平稳运营，建立替代性物流计划。^①俄方在合作中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在提升发电能力、发展数字技术、扩大石油运输路线等方面为中亚国家提供帮助。

在“C5+1”机制中，俄罗斯持续在多领域维系并深化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互信。一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下加强俄语合作项目。俄罗斯一贯将俄语视为其在域外的重要影响力。多年来，俄罗斯一直为中亚地区新建俄语学院和俄语小学提供资助。^②目前，中亚数字空间以俄语运作，而俄语 Facebook 和俄语 YouTube 上的内容，远超该地区各国的国语内容。^③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语的地位已然成为欧亚大陆的“试金石”，用以检验各国对于与俄罗斯关系的立场与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表示高度重视中亚国家的公共生活与数字化转型领域，愿意助力提升中亚公民的生活水平。在 2023 年的俄罗斯-中亚领导人峰会上，俄方提议愿意为恢复中亚联合能源系统提供实际援助。^④俄罗斯试图通过为中亚国家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机遇，进一步增进中亚国家对其的信任。

此外，俄罗斯还在“C5+1”机制中维系并补充与中亚国家的多边机制。在俄罗斯看来，西方势力企图阻碍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诸多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破坏各方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的联系，故将“C5+1”机制看作是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欧亚经济联盟（EAEU）、独联体（CIS）等现有机制的补充。^⑤在俄版“C5+1”机制联合声明和媒体公告中，除了在新冠疫情中的援助外，尚未有对联合项目的投资和援助说明。

① Admin, “В Астане состоялся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и”, *News Central Asia*, October 16, 2022,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2/10/16/v-astane-sostoyalsya-perviy-sammit-stran-tsentralnoy-azii-i-rossii/>

② Luke Rodeheffer, “Kremlin Prioritizes Russian Language in Moscow’s Near Abroad”,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October 31, 202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kremlin-prioritizes-russian-language-in-moscows-near-abroad/>

③ “专家：中亚的数字未来，还要看俄语”，2023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siluxgc.com/static/content/rcmnd/2023-06-16/1119428565789605888.html>

④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1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598>

⑤ В Астане состоялся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и. 16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2/10/16/v-astane-sostoyalsya-perviy-sammit-stran-tsentralnoy-azii-i-rossii/>

这或与俄罗斯主要通过双边层面、世界银行（WB）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渠道进行援助有关。^①换言之，俄罗斯在“C5+1”机制中的参与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单纯的经济驱动。将“C5+1”机制与其主导的多边组织互相补充，既可巩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又可避免其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

尽管俄罗斯发起的“C5+1”机制无需从零开始构建合作进程，但倘若该机制仅停留在合作协议层面，缺乏实质性投入，其效果和影响力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难以在复杂的地区事务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3.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中的共生共长

作为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国与中亚国家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以“中国-中亚精神”为核心，秉持睦邻友好意愿，夯实互信基础，凝聚团结力量，开展互助行动，在“C5+1”多边合作机制中携手共进，共同成长。实际上，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是最晚创设“C5+1”外长级机制的国家，但中国与中亚五国均积极参与两届中国-中亚峰会，并进一步推动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

第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中相互依存。“互尊、互信、互利、互助”是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自建交以来友好交流的最好总结与诠释。一方面，各方从战略高度和区域层面统筹推进合作。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见证签署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这是中国首次同周边单一区域内所有国家整体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该倡议强调包容性、合作性和开放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C5+1”机制将成为中国与中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对接平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各方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

① См. Ю. К. Зайце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мощь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тоги двадцатилетн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2021. №1. С.14; Россия выделила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мощь в размере 3 трлн рублей за три года. 20 мая 2021 г. <https://russkiymir.ru/news/288184>

②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年6月19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592.htm

代友好的原则。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共同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①这不仅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史上的一座新里程碑，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项开创性成果。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已实现“三个全覆盖”，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全覆盖、双边和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中国与中亚五国相互砥砺依存，携手共同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中共同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彰显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坚持相互支持和携手共进的决心。为了构建务实高效、深度融合的合作布局，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与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宣布 2025 至 2026 年为“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②在合作进程中，中国与中亚国家高度聚焦贸易畅通、产业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以及人员往来这六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优先方向。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大资金投入与项目合作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引入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促进文化交流与人才流动等具体举措，中国全力推动了中亚地区由以往相对封闭的“陆锁”状态向开放、合作的“陆联”状态转型，助力各国发展自己的振兴目标。

第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在“C5+1”机制中共同创新。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不仅重申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长期承诺，还在该框架内增设了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这标志着各方合作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模式，拓展至以基层为重点、更全面的合作模式。上述三大合作中心有助于改善中亚国家农村（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提高中亚国家的教育和技术水平，向中亚国家提供应对荒漠化的实用技术。而对于中国而言，三大合作中心的成立，既能开拓周边农业市场，又能塑造中亚国家对中国更为积极的认知，还能减少因生态因素导致的人口流离失所和社会紧张问题的外溢。显然，作为开放性区域，中亚地区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带来了战略机遇，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挑战。中国政府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并通

① “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473.htm

② 同上。

过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经济脆弱性问题，以稳定西部边陲、防止潜在溢出风险蔓延至中国新疆及邻近地区。

尽管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实力存在差异，但主体间平等参与所塑造的共生共长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互尊、互信、互利、互助的重要基石，使得各方能够在经济、技术、文化等多个领域找到契合点，实现优势互补、和谐共生。

四、中亚国家对不同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的态度

当今中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兴起与扩散，除了受到越来越多域外行为体的推动之外，更离不开中亚各国对该机制的认可与参与。其评判的依据主要源于物质性收益和象征性收益。同时，中亚国家对域外国家所持的不同态度，也使得其对不同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合作态度不尽相同。

（一）中亚国家的整体诉求

对于新近独立的中亚国家而言，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域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也需要依托域外力量。

首先，中亚各国在经济发展及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亟需来自域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苏联解体后，尽管中亚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但都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中亚各国在苏联时期主要扮演原材料供应地的角色，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复杂程度（ECI）^①较低，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矿产及农产品等原材料出口。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中亚国家在面对国际市场波动时显得尤为被动。故如何有效促进本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增强经济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已成为中亚各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其次，由于地区内部一体化进程缓慢，中亚地区的制度化合作依赖域外

^① 经济复杂性指数是衡量一国经济知识和能力的指数，主要有多样化和独特性两个衡量指标。经济复杂指数低的国家，如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出口的产品范围较窄。See “34 years of independenc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March 12, 2025, <https://kun.u.z/en/news/2025/03/12/34-years-of-independence-the-economic-transformation-of-central-asia>

行为体。^①长期以来,领土争端、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获取,是引发中亚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中亚区域一体化在 2006 年提出后一度陷入停滞。近年来,中亚地区越来越多“C5+1”机制的建立,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模式,即中亚地区的制度化合作进程依赖域外行为体,这与欧盟和东盟的内生型一体化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外长层级到元首层级,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有效推动了中亚地区获取域外资源支持,促进了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中亚各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国家的发展速度与区域合作的程度成正比。^②很明显,诸多“C5+1”机制的运行深化了中亚国家间相互协作的能力和经济损失。

(二) 中亚国家对“偏正式”和“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的态度不一

从整体层面来看,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的诉求一致,但具体到国家层面,中亚五国在对待域外国家的态度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每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各域外国家的态度也不同。这也影响了中亚五国对地区合作机制的参与情况。

哈萨克斯坦对美国的认知较为开放,对俄罗斯则持谨慎态度。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哈方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力的一项关键战略举措。美国是首批在中亚地区设立大使馆的外国政府,而时任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也成为首位访问美国的中亚国家总统。两国定期举行外长级会晤,并在能源、技术、人文等领域展开合作。哈萨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得益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言论方面鲜有俄罗斯及部分原苏联国家所固有的反西方叙事。^③时任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部长特列乌别尔季(Mukhtar Tileuberdi)曾强调,“C5+1”多边合作机制为吸引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水管理领域的投资、

① Eldaniz Gusseinov, Abakhon Sultonnazarov, “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in the Shadow of U.S.-China Confrontation”,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April 24, 2024, <https://cabar.asia/en/the-future-of-central-asian-integration-in-the-shadow-of-u-s-china-confrontation>

② Ibid.

③ Temur Umarov, “Can Russia and China Edg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Kazakhsta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3,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1/07/can-russia-and-china-edge-the-united-states-out-of-kazakhstan?lang=en>

获取该领域的尖端技术搭建了关键平台。^①该机制还为中亚青年提供技术技能培训以及英语学习的机会，帮助年轻一代增强竞争力。2025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在华盛顿会见哈萨克斯坦外长努尔特列乌（Murat Nurtleu），双方就通过“C5+1”机制加强区域一体化达成共识。哈萨克斯坦既期望通过与美国的互动，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又试图借鉴美国在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先进经验，推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

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哈萨克斯坦对与俄罗斯合作的态度趋于消极。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拒绝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②2022 年，超过 20 万的俄罗斯公民越境进入哈萨克斯坦，以躲避莫斯科的军事动员。^③乌克兰危机和联合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造成了困扰。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表示，哈萨克斯坦无意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的经济制裁。^④为此，哈萨克斯坦除了参与俄罗斯-中亚峰会之外，还积极谋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并深化合作关系。例如，哈萨克斯坦推动西方主要经济体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对话，其中包括 2024 年 9 月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的会晤。可见，哈萨克斯坦既重视与俄罗斯在能源、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同时也会在涉及自身主权、发展空间等关键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警惕性，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以维护自身在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独立地位。

乌兹别克斯坦倾向于借助美国和俄罗斯的力量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当前美乌的贸易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2024 年 6 月，美国时任贸易代表戴

① “C5+1 Can Enha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amid Geopolitical Turmoil, Says Kazakh FM”, *The Astana Times*, March 1, 2023,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3/c51-can-enhance-regional-cooperation-amid-geopolitical-turmoil-says-kazakh-fm/>

② Anastasiya Mahon, “Ukraine war: why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ant to move away from Russian control”, May 30,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kraine-war-why-central-asian-countries-want-to-move-away-from-russian-control-229678>

③ “Kazakh Interior Minister Says 200,000 Russians Have Entered Country Since Mobilization”, October 4, 2022, <https://www.rferl.org/a/kazakhstan-200-000-russians-enter-co-untry-mobilization/32064860.html>

④ “Kazakhstan won’t help Russia evade sanctions, president tells Germany”, *The Economic Times*, September 28, 2023,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kazakhstan-wont-help-russia-evade-sanctions-president-tells-germany/articleshow/104019599.cms?from=mdr>

琪 (Katherine Tai) 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明确表示全力支持美国国会续签普遍优惠制 (GSP) 计划。^①该计划将持续优化乌兹别克斯坦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 推动两国贸易的增长。此外, 作为中亚五国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倾向于借助美国维护自身安全。^②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一支装备相对精良的军队, 正积极推进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2024 年 9 月, 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海关互助协定》(CMAA), 旨在强化两国在防范恐怖分子、打击毒品走私以及瓦解跨国犯罪组织等领域的合作。除双边合作外, 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在区域问题上达成共识, 双方均认为 2024 年美国与中亚五国举办的“C5+1”外长会议、“C5+1 关键矿物对话”、“B5+1”论坛、“C5+1”残疾人权利特别会议是重要成果。^③乌兹别克斯坦试图通过与美国展开多方面的合作, 以增强自身的战略地位。

乌兹别克斯坦既未与俄罗斯接壤, 也并非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作为一个内陆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在贸易、劳务汇款、天然气供应等方面依赖俄罗斯。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声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一项调查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乌兹别克斯坦公民中, 30 岁以下的乌兹别克人对俄罗斯的看法远不如老一辈人积极。但即便如此, 受访者对俄罗斯的好感度依旧远高于美国。^④事实上,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而言, 对中亚地区秩序的主导远比制衡外部大国重要。^⑤而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助于乌兹别克斯坦提升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从而有助于其更好地主导区域秩序。因此, 乌兹别克斯坦除参与“C5+1”机制外, 还

① Jovana Blešić, “Strengthening Uzbekistan-US Rela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in Ukraine”, *Centar za geostrateška istraživanja i terorizam*, October 22, 2024, <https://cegit.org/strengthening-uzbekistan-us-relations-as-a-consequence-of-the-war-in-ukraine/>

② 杨恕、王术森: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 《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第 60 页。

③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Uzbekist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3, 2024, <https://2021-2025.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zbekistan-strategic-partnership-dialogue-3/>

④ Eric McGlinchey, “How Uzbek State and Society View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o-Ukrainian War”, *Ponars Eurasia*, May 30, 2024,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how-uzbek-state-and-society-view-foreign-relations-in-the-context-of-the-russo-ukrainian-war/>

⑤ 杨恕、王术森: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 《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第 69 页。

积极与俄罗斯开展双边合作。2023 年，双方决定将俄罗斯向乌兹别克斯坦供应的天然气量从 30 亿立方米提升至 2026 年的 110 亿立方米。^①2024 年 4 月，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又通过了一项旨在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能源巨头企业就业的计划。基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既能够缓解国内的能源和就业压力，又可借助俄罗斯的支持增强其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吉尔吉斯斯坦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同时对俄罗斯保持较强的依赖性。吉尔吉斯斯坦明确认识到，与美国开展合作对于自身发展以及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一定意义，尤其是在民主与人权等领域。在 2024 年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年度双边磋商中，双方回顾了 2023 年 9 月“C5+1”峰会取得的成果。吉尔吉斯斯坦强调“C5+1”机制对区域合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美吉两国共同致力于加强美国对与中亚区域伙伴关系的承诺。^②双方还将在安全、经济、法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并借助教育与语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增进交流。对于美国于 2024 年发起的“B5+1”论坛，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副部长表示，期望该论坛能发展为年度性会议，并宣布比什凯克已做好主办明年会议的准备。^③这一行为展现出吉尔吉斯斯坦参与地区事务，推动与美国合作发展的积极态度。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长期依赖于俄罗斯。在中亚五国当中，吉尔吉斯斯坦属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该国副总理巴基特·托罗巴耶夫（Bakyt Torobaev）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电力短缺问题，并宣布吉方的能源于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进入紧急状态。^④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能源需求上升且发电能力

① Eric Mcglinchey, “How Uzbek State and Society View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o-Ukrainian War”, May 30, 2024,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how-uzbek-state-and-society-view-foreign-relations-in-the-context-of-the-russo-ukrainian-war/>

②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Kyrgyz Republic Annual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U.S. Embassy in the Kyrgyz Republic*, April 23, 2024, <https://kg.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on-the-united-states-kyrgyz-republic-annual-bilateral-consultations/>

③ “United States launches initiative to foster Central Asian connectivity”, *Eurasianet*, March 14, 2024, <https://eurasianet.org/united-states-launches-initiative-to-foster-central-asian-connectivity>

④ Sergey Kwan, “Kyrgyzstan Turns to Alternative Energy to Address Power Deficit”, *The Times of Center Asia*, March 28, 2025, <https://timesca.com/kyrgyzstan-turns-to-alternative-energy-to-address-power-deficit/>

有限,其只能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此外,大量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俄罗斯务工,这些劳务汇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在能源供应方面,还是在劳务汇款方面,吉尔吉斯斯坦都离不开俄罗斯所给予的支持,故积极参与俄方发起的“C5+1”机制。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试图鼓励吉尔吉斯劳工移民加入其军队,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对俄罗斯的看法明显恶化。^①这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塔吉克斯坦在深化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对俄罗斯保持着较高度度的依赖。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于深化与塔吉克斯坦关系的兴趣愈发浓厚。2023 年 9 月,塔吉克斯坦与美国在“C5+1”机制框架下,围绕双方共同面临的地区问题、发展经贸关系、加强能源与环保领域合作以及吸引美国对优先领域投资等事项交换了意见。塔国还在《美国与中亚国家政府间贸易与投资协议》(TIFA)框架内与美国开展合作。2023 年,双边的贸易额达 2 亿美元,相当于 2022 年的 132%。^②截至 2024 年 1 月,双方已在不同领域签署了 35 份文件。其中 22 份为政府间协议,^③彰显了两国合作的广泛性和深度。2024 年 11 月,美国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访问塔吉克斯坦,推动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水资源与冰川保护、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塔方期望通过与美国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本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及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能力。

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相似,对俄罗斯的依附比较强。若以国家贫困率、国际极端贫困线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来衡量,塔吉克斯坦仍是中亚地区最为贫困的国家。^④在经济方面,塔吉克斯坦劳工的汇款最高时期

① Andrei Kazantsev-Vaisman, “Attempt to Capitalize on Neutrality: How Central Asian States Shape their Policies on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September 27, 2023, <https://besacenter.org/attempt-to-capitalize-on-neutrality-how-central-asian-states-shape-their-policies-on-russian-ukrainian-conflict/>

②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January 18, 2024, <https://mfa.tj/en/main/view/175/relations-between-the-republic-of-tajikistan-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③ Ibid.

④ Muhayyo Rahimzoda, “Renewable energ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June 10, 2025, <https://cabar.asia/en/renewable-energy-and-poverty-reduction-in-tajikistan>

能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①这些汇款不仅让塔吉克斯坦的众多家庭得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还推动了当地消费市场的发展，更弥补了国家的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此外，塔吉克斯坦严重依赖水电来满足大部分的电力需求，但也因水库水位波动而面临电力供应不稳的冲击。因此，塔国也依赖从俄罗斯获取廉价燃料。在安全方面，塔吉克斯坦借助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第 201 军事基地的存在，在内部冲突、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冲突以及阿富汗边境冲突中稳固了自身权力。基于此，塔吉克斯坦对俄罗斯发起的“C5+1”机制持积极态度，期望借此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迫从塔吉克斯坦撤离了大量驻军，也使得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有些许疏远。

土库曼斯坦更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且在天然气市场上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土库曼斯坦首要关注的是本国的能源问题。^②随着土库曼斯坦表示出扩大对外伙伴关系并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意愿后，美国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关系开始加速发展。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支持土库曼斯坦实现现代化以及升级其铁路基础设施的计划感兴趣。尤其是土库曼斯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甲烷排放国，美国多次强调推动该国能源结构多样化以降低其对气候重要性。美国时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任期间曾经强调了土库曼斯坦在减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甲烷排放方面发挥的作用。^③而这一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域外行为体对土库曼斯坦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运输物流现代化的投资。因而，土库曼斯坦在“C5+1”机制内，不仅着眼于技术和资金支持，还希望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提升本国能源领域的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成了土库曼斯坦的重要合作对象。

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在天然气市场上呈现竞争态势。土库曼斯坦声明，

① Andrei Kazantsev-Vaisman, “Attempt to Capitalize on Neutrality: How Central Asian States Shape their Policies on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September 27, 2023, <https://besacenter.org/attempt-to-capitalize-on-neutrality-how-central-asian-states-shape-their-policies-on-russian-ukrainian-conflict/>

② 杨恕、王术森：“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60 页。

③ Haley Nelson,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t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Turkmenistan”, *Caspian Policy Center*, April 27, 2023,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central-asia/the-united-states-looks-to-expand-cooperation-with-turkmenistan>

有兴趣建设一条横跨里海的天然气管道，这一设想或能解决欧洲的能源安全问题，并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支持。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条管道将对其潜在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俄罗斯甚至暗示，倘若土库曼斯坦试图建设该管道，俄方可能会施加军事压力。^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土库曼斯坦甚至拒绝允许俄罗斯使用其输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这一立场既表明土库曼斯坦在能源外交上正试图寻求更大的独立性与多样化合作，也反映出该国对俄罗斯在地区内强势姿态的警惕。尽管双方在“C5+1”机制内仍维持着一定的合作，但潜在的紧张关系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对美国发起的“C5+1”机制持欢迎立场，而对俄罗斯发起的“C5+1”机制的态度较为复杂。尽管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导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却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这些发展表明，中亚国家在外交策略上正展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既要抓住新的合作机遇，又要维护传统伙伴关系的稳定。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中亚国家也在积极探索与其他重要国际力量合作的可能性，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中亚国家积极参与“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

与“偏正式”和“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相比，“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的主要区别在于，机制内唯一的大国不附带不平等条件，并且给予中亚国家一定的商议空间。共生式“C5+1”机制强调平等对话与互利共赢，推动中亚国家在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影响力。因此，中亚各国在参与共生式“C5+1”机制时能够保持较高的自主性，不会因大国的强势干预而丧失主权或利益。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提出合理的诉求，并在协商中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共生式”的合作结构不仅有助于增强区域内国家间的互信，还能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中亚五国在诸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战略伙伴。在

^① Andrei Kazantsev-Vaisman, “Attempt to Capitalize on Neutrality: How Central Asian States Shape their Policies on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September 27, 2023, <https://besacenter.org/attempt-to-capitalize-on-neutrality-how-central-asian-states-shape-their-policies-on-russian-ukrainian-conflict/>

“C5+1”机制内，各方保持着紧密且友好的联系，集中精力和资源集中处理最迫切的议题，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中亚各国元首对与中国的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方的无私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一方面，作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之一，中国积极致力于与哈方发展经济关系。202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达438亿美元，同比增长6.8%。^①此外，哈萨克斯坦出于对石油可能在俄罗斯管道中遭受制裁的忧虑，以及面临次级制裁的风险，加上哈萨克斯坦寻求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促使哈萨克斯坦进一步与中国深化合作。另一方面，考虑到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定，且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哈萨克斯坦也在思考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携手应对潜在威胁。2025年6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第二届“C5+1”元首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谈中称赞，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和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战略伙伴，并强调，中国在与哈萨克斯坦的“C5+1”多边合作中从未附加任何政治条件。^②近年来，中哈共叙传统友谊，携手推进多领域合作，一系列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项目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逐渐惠及两国人民，为中哈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

乌兹别克斯坦重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额累计超140亿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企数量超过2300家；双边贸易额突破140亿美元。^③这一显著的增长态势，充分反映出两国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其中，比亚迪公司还计划在当地设立工程与服务中心，进行电动巴士的组装，并实现零部件的本地采购。这一举措在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将推动周边产业链的发展，助力当地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此外，中国呼吁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进程，

①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年，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00/sbgx_676504/

② “China is a good neighbor and time-tested partner of Kazakhstan, says Tokayev”, *Kazinform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June 16, 2025, <https://qazinform.com/news/china-is-a-good-neighbor-and-time-tested-partner-of-kazakhstan-says-tokayev-518e66>

③ James Durso, “With the US looking elsewhere, Uzbekistan and China quietly cement a regional alliance”, February 5, 2024,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442832-with-the-us-looking-elsewhere-uzbekistan-and-china-quietly-cement-a-regional-alliance/>

契合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利益，此举将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的交通枢纽。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omonovich Mirziyoyev）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增进与中亚国家的友谊、落实具体项目和推动中亚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①乌兹别克斯坦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与中国紧密合作并全面落实这些倡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在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增进了两国互信和友谊。

吉尔吉斯斯坦重视中国的投资和双边贸易。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 年双边贸易额达 22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②相较于俄罗斯，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媒体中更受青睐。一项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新闻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比对俄罗斯的报道更为积极。^③这主要归因于媒体围绕中吉经济联系及其可能给吉国带来的影响等话题所展开的报道。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在第二届“C5+1”元首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明确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吉兴业，愿同中方共同实施好中吉乌铁路建设等项目，加强能源、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为丰厚的福祉。^④中吉的合作领域并不局限于传统行业，而且逐渐向高科技与绿色能源领域拓展，同时加强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这种“全域化”的合作模式，使中吉关系呈现出更为多元化、深层次的发展态势。

塔吉克斯坦重视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合作已成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典范，具体体现在中国华为投资建设监控基础设施、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中塔联合开展军事演习等方面。实际上，面对地区威胁和内部不稳定状况，塔吉克斯坦政府往往主动寻求中国的协助，双方共同确

① “President of Uzbekistan puts forward initiatives for expanding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June 17, 2025, <https://president.uz/en/lists/view/8232>

② “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48/sbgx_676552/

③ Dante Schulz, “China-Kyrgyzstan Relations”, *Caspian Policy Center*,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economy/china-kyrgyzstan-relations>

④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6/t20250617_11651479.shtml

定安全合作范围和具体内容。^①双方定期的高层访问与会晤，以及在安全和技术领域签署的协议，均表明两国关系正逐渐走向制度化。1992—2023 年期间，两国高级官员围绕安全议题至少举行了 117 次会晤，^②涵盖了边境安全、反恐合作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不仅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还在技术应用和人员培训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Emomali Rahmon）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对中塔两国间的地区合作表示满意。^③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模式使得两国的安全合作更加务实高效，为地区稳定注入了强劲动力。

土库曼斯坦加快推进与中国的关系。2023 年 1 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Serdar Gurbangulyevich Berdimuhamedov）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 2023 年首位访问中国的中亚国家领导人。在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中，中土两国进一步拓展了双边关系。2023 年 10 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土库曼斯坦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宣布将与中国携手参与其重要的全球倡议和举措。^④也是在 2023 年 10 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签署了重要协议，此举推动了土库曼斯坦与中国新疆区域间关系的深化。2024 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稳步推进。双方一致认同相互支持彼此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加强民间交流，以及在政治、经贸、能源、交通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是共同关注的重点。土方愿全面拓展对华合作，造福双方人民，^⑤巩固中土全面战

① Edward Lemon, Ruslan Norov, “How China is Adapting to Tajikistan’s Demand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5/03/how-china-is-adapting-to-tajikistans-demand-for-security-cooperation?lang=en>

② Ibid.

③ “Meeting with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 Jinping”, June 17, 2025, <https://www.president.tj/event/news/51206>

④ Farzad Ramezani Bonesh, “The role of BRI and Energy in China-Turkmenistan relations”, *Only Natural Energy*, October 1, 2024, <https://www.onlynaturalenergy.com/the-role-of-bri-and-energy-in-china-turkmenistan-relations/>

⑤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592.htm

略伙伴关系。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安全、信任四大赤字不断加重，作为周边邻国和“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的双核心区，中亚自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和示范区。中国尊重各国主权与利益，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家，积极引领中亚国家参与“C5+1”机制，彰显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以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

五、不同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前景

当前，多数“C5+1”机制仍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机制内唯一大国是否关注中亚国家的诉求，均影响着不同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偏正结构的翻转导致美国参与“C5+1”机制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俄罗斯将“C5+1”机制视为维系现有多边机制的工具或将削弱机制的独立性；中国共生式“C5+1”机制正朝着机制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影响三种类型“C5+1”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的主要因素

通常而言，多边机制的推进既需要主要大国发挥引领与支持作用，也离不开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是否关注中亚国家诉求等因素，均影响“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从而影响合作机制的成效。

首先，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削弱了各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①近年来，大国博弈回调以及彼此间互信的缺失导致多边合作让位于地缘竞争。当大国间的博弈激烈进行时，部分国家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利益和战略优势，而忽视了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甚至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视为一种战略竞争的手段，而非共同的责任。乌克兰危机叠加美国霸权护持的安全焦虑，使得美中、美俄、欧俄关系紧张，多边机制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C5+1”多边合作机制或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成为大国博弈的平台。事实上，美国偏正式“C5+1”多边合作机制并未真正从促进中亚国家的诉求

① 沈逸：“大变局下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与中国的回应”，《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 年第 2 期，第 61 页。

出发,而是以与中国、俄罗斯竞争为中心展开活动,其对中亚事务的应对具有临时性和投机性。在中亚国家看来,美国与其接触是短期性的,并质疑美国的承诺。^①俄罗斯则依托“C5+1”多边合作机制,致力于在乌克兰危机后修复并巩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开拓新市场以缓解西方制裁带来的压力。美国和俄罗斯所构建的“C5+1”机制似乎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对冲关系。在此情况下,两国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增强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上,影响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也削弱了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换言之,许多全球性挑战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合作,而在于各国已丧失了为何要合作的方向感。^②

其次,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C5+1”多边合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长期以来,美国主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通过遵守国际法、尊重主权平等、多边合作平台等方式来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但特朗普第二任期间秉持的是“内部调整、外部收缩”的基本治理原则,以排他取代包容,以强硬取代协商,以单边取代多边。^③这一全球治理理念的转变,虽彰显了美国试图重新界定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但也使得其他国家对其领导力产生了质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试图利用“C5+1”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一个涵盖阿富汗安全、稳定和繁荣的跨区域一体化。然而,美方并无意愿在“C5+1”机制中进行财政投资,该机制至今尚无常设机构和机制。尽管美国“C5+1”机制设立了虚拟秘书处,但协调工作仍由美国国务院承担。^④在缺乏大国支持的情况下,美版“C5+1”多边合作机制往往进展缓慢。俄罗斯认为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形成,^⑤欧亚地区将成为其重要的支点。为此,俄罗斯通过将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与“C5+1”机制组化,借此

① Navbahor Imamova, “US Eyes Closer Ties to Central Asia After New York Summit”, *Voice of America English News*, September 22, 2023, <https://www.voanews.com/a/us-eyes-closer-ties-to-central-asia-after-new-york-summit/7280302.html>

② 沈逸:“大变局下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与中国的回应”,《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2期,第62页。

③ 王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张及其多重影响”,《国际展望》,2025年第2期,第27页。

④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люс»-новый форма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17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e-cis.info/news/566/103999/>

⑤ “Plenary Session. Law in a Multipolar Word”, June 30, 2022, <https://legalforum.info/en/news/plenarnoe-zasedanie-pravo-v-mnogopoljarnom-mire/>

拉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纽带。^①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仅涵盖部分中亚国家，俄罗斯希望将“C5+1”机制与自己主导的地区组织相配合，弥补这一合作的真空。该机制为俄罗斯强化与中亚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更加具体、细致的工具，有利于巩固俄罗斯在多极化格局中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地位。^②中国始终将中亚国家视为命运与共的好伙伴，致力于与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C5+1”机制内，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能源合作等项目；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人民之间的相知相亲，携手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最后，机制内的唯一大国是否关注中亚国家的诉求，影响了整体合作的深度。2017 年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中亚各国展现出了加强合作、互信互利的意愿，中亚一体化进程重启。随着区域身份认同的提升，中亚国家希望以“C5”整体方式发展“多元”外交关系，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中亚地区不仅凭借乌克兰危机改变了自身“全球边缘地带”的境况，并朝“全球枢纽地带”方向发展，还利用大国间制衡达成了多元平衡状态。基于此，充分关注中亚国家的实际诉求，有助于大国在“C5+1”机制中更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源和支持，推动合作项目的精准落地。反之，若中亚国家的核心诉求未得到充分关注和回应，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信任度可能会有所下降。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合作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中亚国家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还展现了大国负责任的态度和务实的合作精神。换言之，谁更注重中亚国家的实际需求，谁在实际行动中能对这些需求作出有效回应，谁就能在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二）三种“C5+1”多边合作机制类型的发展前景

受上述因素影响，中亚地区偏正式、维系式和共生式“C5+1”多边合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国主导的偏正式“C5+1”多边合作机制因偏正结构翻转而削弱了其参与的积极性；俄罗斯将“C5+1”多边合作机

① 邓浩、李天毅：“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外长会释放新信号”，《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0 期，第 29 页。

② 欧阳向英：“以多极对抗单极：俄罗斯推动多极化的理念与实践”，《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制视为维系现有多边机制的工具或削弱该机制的独立性；中国的共生式“C5+1”多边合作机制虽正朝着机制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但需警惕其他势力对中国的污名化。

偏正结构的翻转削弱了美国参与偏正式“C5+1”机制的积极性。近年来，随着多边机制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机构间开展分散合作的“论坛购物”（Forum Shopping）现象。^①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域外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积极发起并推动“C5+1”机制，中亚各国在制度和资源选择上的自主性也显著增强。这不仅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合作机会，也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谈判筹码和决策空间。换言之，在制度竞争态势中，中亚国家极有可能翻转原有的偏正结构，实现角色的转变，成为占据“正”位的一方。一旦结构翻转，域外行为体在机制内需将中亚国家的优先利益纳入考虑。这种从以本国利益为中心，逐步过渡到兼顾他国利益，再到以他国利益为先的转变，可能导致域外行为体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尤其是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置于全球治理之上，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国内政治方面，^②对中亚“C5+1”机制的投入与关注可能会减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与中亚的“C5+1”元首级别峰会和“B5+1”论坛仅举办过一届，其合作成果尚待进一步落实。

俄罗斯将“C5+1”机制视作维系现有多边机制的工具或许会削弱该机制的独立性。中亚地区的国际制度建设主要由外部推动，具有形式多样化、领域全覆盖的特征，^③但如何妥善处理新机制与原有机制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大问题。当前，俄版“C5+1”机制仅发布过三次联合声明，一次关于合作战略方向、一次关于阿富汗局势、一次关于元首峰会成果，其余均以媒体公告形式发布。俄版“C5+1”机制更像是其原有多边机制在区域层面的一个下沉以及双边关系的维系，旨在更精细地规划与中亚国家的沟通渠道与战略合作。然而，将“C5+1”机制当作维系现有多边机制的手段或工具，

① J. C. Morse, R.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 Vol.9, No.4, pp.406-409.

② 王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张及其多重影响”，《国际展望》，2025年第2期，第48页。

③ 周卓玮：“‘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国际制度的重合与失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77页。

本质上也削弱了该机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俄罗斯对现有多边机制的依赖，限制了“C5+1”机制在新形势下的反应能力与拓展空间，使得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逐渐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作为专注于与中亚国家互动的综合性平台，俄版“C5+1”机制应当有其自身独特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不是片面地被用于维系现有多边机制。因此，“C5+1”机制如何对接和整合现有多边机制的相关资源与议题，并与之发挥协同效应，而非仅将其作为维系现有多边机制的工具，俄方仍需进一步思考。

中国的共生式“C5+1”多边合作机制朝着机制化、多元化方向发展。随着中亚“C5+1”机制的兴起和扩散，中国为提升本国方案的竞争力，在机制发展过程中将“C5+1”机制化，并进一步细化、发展和延伸出更具体的新次级平台。中方不仅设立了实体性的中亚秘书处，还建立了 13 个部级合作平台，^①形成多轨并行的合作格局，提升了机制运行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根据自身优势和中亚各国的具体需求，拓展和引入新的合作议题。如，中国深耕智慧农业助力中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通过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同中亚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最新技术成果；中国加强同中亚国家立法机构、政党、妇女、青年、智库等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但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警惕其他势力对自身的污名化，进一步提升软实力传播能力。一方面，中亚依旧存在“中国威胁论”，文化差异和域外国家的煽动加剧了这一疑虑。^②一些中亚公民倾向于从殖民主义看待的中国投资，^③美国官员则趁机宣称自己是中亚“抵御中国债务”的替代方案。^④另一方面，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推动与国家规划，现有教育交

①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592.htm

② Gunay Khalilova, “Russia’s Reaction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Central Asia”, August 1, 2024, <http://www.e-ir.info/2024/08/01/russias-reaction-to-us-china-competition-in-central-asia/>

③ Ayjaz Wani, “Ami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dvantage China in Central Asia”, November 23, 2023,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amid-russia-ukraine-conflict-advantage-china-in-central-asia>

④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tep up its rivalry with China and Russia for geopolitical sway in Central Asia”,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2/09/16/united-states-wants-to-step-up-its-rivalry-with-china-and-russia-for-geopolitical-sway-in-central-asia>

流等项目更注重语言、思想、文化传播而非“情感”浸润，^①更缺乏像日韩那样能带动潮流的娱乐流行文化交流和民间自发参与。为此，中国需增加与中亚国家民间社会的互动，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以化解污名化。

六、结 语

“偏正式”聚焦于互动中权力与关系的动态，强调在特定情境中“正”位对“偏”位的影响和限制。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实力的差异导致权力分配上的差距，进而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等级地位。故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实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处于次要位置。前者能够凭借其实力地位对后者施加结构性压力，而后者通过关系联结等权力再生产方式，也能在某些情境下翻转偏正结构。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间的“默会”，通常转化为诸如信任、感激、道义、恩惠等情感关系的形式出现。但“正”位和“偏”位并非总是形成一种对立或冲突的关系，二者也有可能保持一种协调一致、顺从配合或相互依赖的关系。

“维系式”强调在现有的多边框架体系下维持或提升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构建新机制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的成本，各国在进行合作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沿用过去的某些机制，或创建新机制以维系原有机制，使其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基于共同的历史和经济联系，“维系式”多边合作机制不同于从零开始的合作进程，各国在机制的初始阶段就保持着较高的相互依赖程度，具有共生的潜力。但“维系式”的本质是一种克制的霸权和竞争，即对内呈现等级分化，对外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这种基于交易关系和态度波动的互动关系往往导致机制内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缺乏稳定性，而在外部则可能引发更多的竞争与冲突。

“共生式”倡导各国皆为平等的主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来实现共同发展，以达到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目标。这一理念既不能理解为一国超越另一国的“能力”，也并非片面强调国家间“理想”、“和谐”的合作状态，更不追求各国之间的“同质化”

^① “China and Russia vie for soft power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June 6, 2024, <https://daryo.uz/en/2024/06/30/china-and-russia-vie-for-soft-power-influence-in-central-asia>

发展,而是承认国家在政体、资源、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因此,“共生式”模式是在汲取“偏正式”与“维系式”模式合理性的基础上,构建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共生共长的生态。

通过对中亚“C5+1”机制中域外行为体与中亚国家以及域外行为体之间互动的案例分析,本文论证了在中亚“C5+1”机制中存在着三种合作结构关系。在偏正式“C5+1”机制中,美国往往主导机制发展速度的快慢以及发展方向的规划调整;在维系式“C5+1”机制中,俄罗斯积极借助这一机制维系与中亚国家的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及现有多边机制;在共生式“C5+1”机制中,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与此同时,本文也发现,当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时,中亚各国可能会寻求更大的话语权或更强的自主性,对参与“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多边合作机制的态度也不一样。这种态度的变化不仅考验“C5+1”机制的韧性,还敦促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合作策略。

“C5+1”多边合作机制有助于各方更快、更有效地协调行动,也促使各方更加聚焦于地区问题。但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是否关注中亚国家诉求等因素,均对“C5+1”机制的发展产生影响。偏正结构的翻转影响美国参与“C5+1”机制的积极性;俄罗斯仅将“C5+1”机制视为维系现有机制的手段或许会削弱该机制的独立性;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警惕西方对自己的污名化。如何切实有效优化“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合作结构,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如此,方能确保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而推动各方构建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the “C5+1”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have flourished in Central Asia.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still fall short in analyzing the cooperative structures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in these mechanisms and in addressing the varying attitude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asymmetric”, “maintenance-oriented”, and “symbiotic” models, this paper seeks to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er characteristics of “C5+1” cooperation and the agency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within it. Through interactive processe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have each developed different types of “C5+1” mechanisms in the region. The U.S. asymmetric “C5+1” mechanism is based on power disparities, emphasizing the dominant role and harmonization of the “core” actor. Russia’s maintenance-oriented “C5+1” mechanism strengthens existing ties through mutual dependence and restrained hegemony. China’s symbiotic “C5+1” mechanism highlights equal participation among all parties, fostering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Since the Ukraine crisi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demonstrated divergent attitudes toward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C5+1” mechanisms. At present,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nsity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global governance visions of major power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Central Asian concerns are addressed all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C5+1” types. How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asymmetric, maintenance-oriented, and symbiotic structures of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that requires further in-depth exploration.

【Key Words】 “C5+1” Mechanism,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механиз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C5+1» приобрёл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оперативных структур,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м стран в рамках механизма «C5+1», и различий в подход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 ним остаются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и. Вводя понятия «частично формальных»,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х» и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и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авторы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пытаются дать нов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C5+1» и рол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эт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я, СШ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типы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C5+1»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Частично 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C5+1» США,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неравенстве сил, делает акцент на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гармонии в «позитивной» позици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ый Россией механизм «C5+1»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взаимную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ое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связей; а в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ом механизме «C5+1» Китая равнопра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сех сторон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гармоничному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разному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азличным типам механизмов «C5+1».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а развитие трёх типов механизмов «C5+1» влияют такие факторы, как острота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их философ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внимание к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о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ть «частично формальны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е» и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ал темой,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требующей глубоко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ханизм «C5+1», Кита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Ш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责任编辑 杨 辉)

留苏教育与中国革命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干部教育 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陶 源**

【内容提要】国际列宁学校是由共产国际创办的高级干部培训学校，其中的中国部于1928年成立。本文从国际列宁学校的筹备、创办、领导沿革、课程设置等方面对该校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探究，并进而研究了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创建问题。总体来看，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条件；理论联系实际是干部教育的基本准则；教学相长是理论教育的重要手段；党的干部教育应注意和周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干部教育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财富，培养了一批党和新中国的教育干部。

【关键词】国际列宁学校 干部教育 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135(18)

20世纪20—40年代留学苏俄的干部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共“派遣干部”留苏，与建党活动大致同步，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国语学社”，^①为派员留苏作准备。出于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考虑，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中央先后于1921年4月和19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27）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 陶源，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① 郝淑霞：“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第58-61页。

年 10 月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东方大学”）^①和“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②。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许多人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1926 年 5 月，国际列宁学校（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成立，1928 年，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以下简称“中国部”）成立。

1927 年，中国国内大革命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并创造性地探索、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迫切需要大批适应形势需求的具有相当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优秀干部。^③与此同时，20 世纪 20 年代的共产国际重视苏联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波斯（今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家共产党干部的培养，认为这一工作对于保障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列宁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备工作的。^④

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国际列宁学校是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精英”的教育机构。目前，关于国际列宁学校的研究仅见于一些中共党员的 personal 研究中，^⑤因此，对于该校的组织结构、教学内容、领导沿革、教师群体等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一、国际列宁学校的组织结构与历史进程

（一）国际列宁学校的筹备

国际列宁学校的论证与筹备始于 1924 年 7 月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① 孙会修：“旅莫支部成员的入党之路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历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② 陶源：“俄藏革命时期中共留苏干部档案及其整理研究”，《光明日报》，2024 年 4 月 26 日第 11 版。

③ 杜君、赵志宇：“浅谈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18-23 页。

④ В. Н. Усо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д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5.

⑤ 张玉菡：“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莫斯科之行述论”，《党的文献》，2016 年第 3 期，第 117-123 页。

会。本次大会通过了关于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级人才培训学校必要性的决议。大会批准的文件《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指出：“为了至少满足最重要的党对合格理论工作者的需要，共产国际将长期派遣德国、英国、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东方国家以及其他支部的党务工作者到莫斯科，他们应在那里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会强调，“考虑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目的是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党的教育必须与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共产党的战术和组织任务联系起来，避免抽象的教学计划”，“学习的目的是让学员深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学员在理论上独立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①

这次大会以及《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的文件为国际列宁学校的筹建奠定了政策基调。在此基础上，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兼军事人民委员的贝拉·库恩（Бела Кун）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了建立专门培训共产党高级工作人员的国际教育机构的计划。^②1924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贯彻这一计划，决定为40名外国学员开设为期两个月的国际课程。^③1925年2月，国际课程在共产国际文件中被称为高级国际党校；^④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计划开设为期一年半的国际课程，并将学员人数增加到70人。4月，高级国际党校更名为国际党课；1926年4月更名为国际列宁课程。^⑤1926年5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其组织结构的最初草案。1928年，国际列宁课程更名为国际列宁学校，^⑥1930年更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大学。但是，在各类文献中均使用约定俗成的“国际列宁学校”这一称呼。联共（布）中央参与了课程安排和教师遴选工作。^⑦因此，国际列宁学校始于1924年10月的国际课程，1928年“国际列宁学校”这一名称正式确定（见图1）。

① Пяты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17 июня - 8 июля 1924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В 2-х т. Т. II. М.-Л.: Госиздат, 1925. С.106.

②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8.

③ Адиев Г. М., 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 М., Шириня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С.127.

④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3.

⑤ Там же, Л.7.

⑥ Бабиченко Л. Г. Роль Школ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идей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обучении кадров компартий. С. 120.

⑦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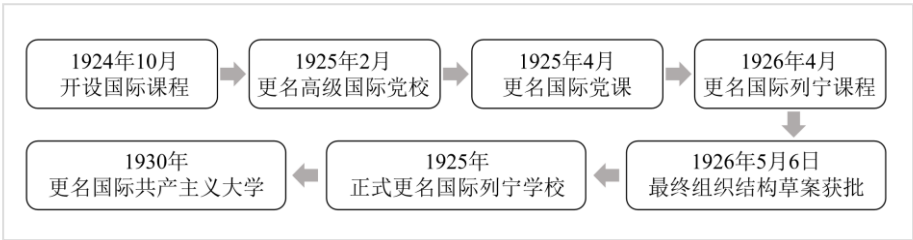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列宁学校名称演变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国际列宁学校自建设之初就具有高级党校的性质，共产国际对其的投入均高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之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为学校制定的年度预算为 718520 卢布，比莫斯科中山大学多出 168500 卢布。^①1932 年起，国际列宁学校与 1921 年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并开始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宣传部。列宁学校学员们领取的津贴高于苏联工人平均工资。^②且“宿舍条件不错，家具都是新的。学校食堂也很不错。”^③学校宿舍位于莫斯科州克拉斯科沃赫尔岑街 51 号、^④沃尔洪卡街 16 号、^⑤卡卢加公路 58/62 号。自 1937 年起，莫斯科附近的罗斯托基诺也设有学员宿舍。^⑥

（二）国际列宁学校的领导沿革

国际列宁学校校长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负责监督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教职员工的聘用同样需要通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⑦校长通过教务处和分配到各部门的教员来监督教学工作。学校机构包括人事部（即秘书处）、实践部门以及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党委由 16 名成员组成，

① Галицкий В. П. Цзян Цзинго. Трагедия и Триумф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М., 2002. С. 18.

② Бабиченко Л. Г. Роль Школ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идей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обучении кадров компартий // Коминтерн: Опыт, Традиции, Уро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70-летию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122.

③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年，第 83 页。

④ B. McLoughlin, “Proletarian Academics or Party Functionaries? Irish Communis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1927-1937”, *Saothar*, 1997, Vol.22, p.63.

⑤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01. Л.24.

⑥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42. Л.51.

⑦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8.

负责党建方面的教育工作。

1926—1930 年,国际列宁学校校长由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成员、《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①担任。国际列宁学校的第二任校长是叶·伊·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基尔萨诺娃(К. И. Кирсанова)。十月革命后,基尔萨诺娃曾担任纳杰日金斯克市(Надеждинск,今谢罗夫市)苏维埃主席、韦尔霍图尔斯基(Верхатурский округ)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东线第三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起,她担任莫斯科俄共(布)卡莫夫尼切斯基区委书记;1919年秋,她担任彼尔姆军区政治部主任;1920年9月起任鄂木斯克市党委书记;1922—1924年,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后任国际列宁学校副校长;1931年年底,基尔萨诺娃被暂停职务。第三任校长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的威廉·皮克(В. Пик),皮克仅在校长职位上工作了几个月。1932年年底,基尔萨诺娃重新担任校长,直到1937年。^②

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维尔科·契尔文科夫(В. В. Червенков),契尔文科夫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在保加利亚从事地下工作至1925年,之后与妻子流亡苏联。1928—1933年,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3—1936年,切尔文科夫担任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校长。^③1937年起任国际列宁学校校长。

(三) 国际列宁学校的总体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干部教育思想是列宁学校运行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知识人才”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证团结一致”^④等。列宁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和路径

① Бухарин К.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1888-1938. М.: Прогресс, 1989.

② См. Громова И. Клавдичка (К. И. Кирсанова). Женщин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С.158-168.

③ См.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56-457; Адибеков Г. М., 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 М., Ширня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С.208.

④ 赵志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长春:吉林大学,2013年,第17-18页。

选择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列宁学校的重要理论基础。列宁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他强调，干部不可能自发地成长，也绝不是可以不花力气便使干部队伍成长起来，这需要培养教育。^①根据列宁的干部教育思想，干部教育应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干部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②

国际列宁学校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干部教育思想指导下创办起来的，并于 1926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课。^③国际列宁学校创建之初就确定了其精英性质，且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具有更高的保密级别。这一保密性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列宁学校的所有学员均使用化名。学员与国内亲友的通信只能通过行政部门转寄给学员，禁止在信封上和信件中写学校地址。^④郊游或需要学员到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行时，学员证仅可以一次性使用。^⑤第二，学校培养学员的保密技能。学员在与外人的交谈中不得谈论他们在苏联的目的，不能提及学校、同学和自己的过去，只能称自己为政治移民（политэмигрант）。^⑥第三，关于国际列宁学校的任何材料都不允许在公开报刊上发表。^⑦

1931 年和 1932 年的课程设置为三年，其他年份均为两年制，此外还设有为期九个月的短期课程。两年制或三年制课程的任务是培养理论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专家和党务工作者；而短期课程的目的则是对已经有一定理论或实践经验的学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教育。从 1932 年起，学校开设为期两年的研究生课程。^⑧

① 赵志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长春：吉林大学，2013 年，第 2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87 页；《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06 页；《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285 页。

③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3. Л.25.

④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8. Л.40; Klehr Harvey, Haynes John Earl, Firsov Fridrikh Igorevich,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02.

⑤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2. Л.2.

⑥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8. Л.40.

⑦ Klehr Harvey, Haynes John Earl, Firsov Fridrikh Igorevich,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02.

⑧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18. Л.2; Д.27. Л.5; Д.233. Л.4.

1926 年学校建立之初，国际列宁学校按照语言分为三个部门：德语部、英语部和法语部，学生需要精通其中一种语言才能被学校接收。^①1927 年增加了俄语部。^②1929 年起设有 19 个部门。部门主任受教务处副处长领导，负责该部门的教学和党的教育工作。所有部门主任，作为联共（布）党员或“友党”成员，必须定期参加课程并对教师进行评价。^③

（四）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建立

1926—1927 年，国际列宁学校成立之初，只有懂英语的中国学员在该校接受教育。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国部，这些学生被分配到英语部，与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的学员一起学习。1927 年俄语部成立后，一些俄语水平高的中国学员，以及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学员进入俄语部学习。^④1928 年，学员根据国籍被分配到各部门，中国学生被转入中国部。中国部最初有两个短期学员组和一个长期学员组，后增设了研究生组。1931 年，在之前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两个短期组。

中国部负责人是 1918 年加入俄共（布）的汉学家、经济学博士雷斯卡娅（М. Я. Райская）。雷斯卡娅 1922 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短期班，192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经济系，1933 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经济系。雷斯卡娅从中国部成立至 1937 年间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中国部的副职是切贝金（А. В. Чебыкин）和齐曼（Л. Я. Зиман）。切贝金 1934 年毕业于当时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和红色教授学院东方系。他在列宁学校一直工作到 1938 年 5 月^⑤学校关闭，从 1939 年 5 月起担任中国部人事部门高级顾问。^⑥经济地理和地图专家齐曼在加入列宁学校之前，曾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参与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并于 1938 年起担任苏联高等外交学校副校长，1937 年起担任联邦测绘局总编辑。^⑦

1931 年秋至 1933 年 3 月，卜士奇担任中国部副主任。1933 年 12 月 21

①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1. Л.8; Д.71. Л.30.

②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15. Л.44.

③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2. Л.3.

④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年，第 83 页。

⑤ См. РГАСПИ. Ф.531.

⑥ РГАСПИ. Ф.495. Оп.18. Д.1278. Л.101.

⑦ Соломон Е. К. Новодевичий мемориал: Некрополь монастыря и кладбища. М.: Арт-Бизнес-Центр, 1998. С.251.

日，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为中国部副主任。^①1937 年 1 月 29 日，因康生即将回国，他的职务由中共‘一大’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潭秋（别名徐杰）接替。陈潭秋在中国部工作到 1938 年 1 月 16 日，后被调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工作，^②1939 年 9 月奉命回国。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学员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是具有三年以上党龄和一年以上党内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和活动家，申请者要对理论工作有兴趣，有文化素养并了解当前政治形势。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不同，国际列宁学校学员是根据共产国际人事部的要求进入学校的，入学前要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参与组织的学校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特别教育审查。^③

申请者要回答特殊问卷，包括护照信息、民族、家庭状况、受抚养者人数、教育程度、政治素养、职业、兵役状况、工作经验、党龄和党内工作地点、工会和合作社运动的工作经验等 20 项。^④预入学学员要接受体检和面试，面试期间，考核学生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主要著作了解的情况。学生入学后立即参加理论考试，然后是为期六周的入门课程。^⑤

1926 年到 1931 年是国际列宁学校学员人数最多的时期，共有学员 956 人，其中中国学员 95 名，占学员总数的 10%。其中，1929 年有 28 人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进入国际列宁学校；1930 年有 8 人转入；1931 年又有 6 名中国学员入学；1932 年有 43 人转入；1933 年有 40 人进入短期班学习。^⑥1934 年有 15 名中国学员毕业，1935 年有 17 名新学员进入中国部的短期班，15 人进入长期班。1935 年有 4 人毕业。1936 年，中国部有 29 名中国学员，^⑦1937 年有 20 人，^⑧1938 年有 6 人。资料显示，先后有超过两百名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在中国部接受教育。

① РГАСПИ. Ф.514. Оп.1. Д.836. Л.40.

②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2852.

③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8; Д.7. Л.21.

④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17.

⑤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7. Л.21.

⑥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32. Л.20; Д.29. Л.1; Д.4. Л.12; Д.47. Л.28.

⑦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06. Л.9. 另有资料记载，1936 年中国部有 14 名中国学员。
См. РГАСПИ. Ф.514. Оп.1. Д.1037. Л.11-16.

⑧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31. Л.15.

国际列宁学校旨在培训中高级党务工作者，因此学生的年龄为 23—36 岁（共青团员除外），他们或者已有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或者已有领导党和群众工作的经验。^①因此，在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也都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或丰富的实践经验，如刘仁静、董必武、高自力（周鹤仙）、黄平、李立三、陈郁，以及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周达文、俞秀松和董亦湘。多年来在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学习过的中共党员还包括王观澜、王若飞、刘长胜、彭泽湘、宋一平、吴克坚、陈刚、陈潭秋、陈云、杨秀峰、杨之华和阎红彦。

（五）国际列宁学校的课程

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国际列宁学校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向学员传授布尔什维克经验。根据政治局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如布哈林、拉狄克等参与了课程的制定。

1926—1927 年，课程包括联共（布）的历史、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人运动史和列宁主义。之后学校的课程被分为四个部分：经济学科目，包括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以及转型期（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历史学科目，包括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工人运动史、学员所属国家的战前工人运动史，以及第三国际及其分部门历史；列宁主义科目，包括联共（布）的历史、列宁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战略和战术，以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建设科目，包括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结构。^②1930 年首次提出了在列宁学校设立讲座课程的问题，其主要任务是培训具有较高理论和管理水平的共产党员，以便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部门和共青团等机构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到 1937 年，参加讲座课程的人数已增至 91 人。其中有 12 名中国人。^③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的是，俄语学习仅作为学校成立之初几年的必修课，^④自 1928 年起，俄语不再作为必修课。^⑤

① Cohen G, Morgan K. “Stalin's Sausage Machine. British Stud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1926-1937”,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002, Vol.13, No.4, p.334;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42. Л.42.

②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5. Л.41.

③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 Л.3.

④ Там же, Л.31.

⑤ B. McLoughlin, “Proletarian Academics or Party Functionaries? Irish Communis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Moscow, 1927-1937”, *Saothar*, 1997, Vol. 22, p.65.

国际列宁学校的课程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书面作业、撰写论文和访问图书馆。鼓励学员自学和向教师个别咨询。学员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自己国家的进一步实践工作中应用理论知识。

二、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条件

师资是保证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的基础，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中，师资队伍建设始终备受关注。造就一批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同样是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加强干部教育的基础性工作。

国际列宁学校的教师由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门选拔，主要来自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即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师来源相同的教育机构。该校教师的挑选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教员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还要求他们了解学员将返回从事组织和政治工作的国家的政治形势。

在中国部成立之初，教师的遴选遇到了很大问题，因为学校找不到既懂中文又了解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到了 1930 年，情况有所改变，一些中国学员在完成基础课程后被留校任教。从 1933 年 3 月起，国际列宁学校领导层通过研究班，专门培训各部门的教学人员。

总体来看，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教师群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在教学中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落实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①这部分教师包括王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陈维一、郭绍唐、陈云（化名史平）、饶漱石（化名梁朴）、陈潭秋和赵毅敏等（见表 1）。其中俞秀松和周达文讲授联共（布）党史，董亦湘讲授政

① 这是 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统一战线的重要纲领性发言。См. Димитров Г. В борьбе за единый фронт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и войны. М.: Партиздат, 1937. С.76-77.

治经济学，陈维一讲授工人运动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郭绍唐讲授列宁主义，王明讲授“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问题”。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的是，到 1933 年，中国教师占部门教师的一半左右，且教师群体的中文水平较高，约有 89% 的教师掌握俄文。^①

表 1 中国教师情况表

教 师	在列宁学校工作的时间	所授课程
俞秀松	1930—1933 年	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
周达文	? —1933 年	联共（布）党史
董亦湘	1928—1933 年	政治经济学
陈维一	缺失	工人运动史
王明	缺失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问题
陈云	1935—1936 年	党的建设和工会建设
饶漱石	缺失	缺失
陈潭秋	缺失	缺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类是懂汉语并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教师。在国际列宁学校，这类教师包括新来的满洲问题专家罗戈夫（В. Н. Рогов）、雷斯卡娅等。中国部的重要课程由该类教师担任：工会运动由一名来自美国的拉脱维亚政治移民约翰森（К. Э. Джонсон）授课；工人运动史由东方大学前学术部副主任库丘莫夫（В. Н. Кучумов）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亚兰采夫（И. В. Яранцев）等授课。学校的一些重要领导也给学生授课，如中国部主任雷斯卡娅亲自讲授苏联经济学，副主任齐曼讲授政治经济学，中国部副主任切比金以及教务处第一副处长阿尔图福夫（В. С. Алтуфов）讲授联共（布）历史等（见表 2）。

第三类人员是刚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教师，他们在翻译的帮助下进行教学。^②

另外，20 世纪 20—30 年代，国际列宁学校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常常邀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来校讲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贝拉·库恩都曾为学生讲过课。1930 年以前，布哈林也

①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28. Л.11.

②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978-979.

定期给学生讲课。这些领导人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的培养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表 2 苏联教师情况表

教 师	对中国或汉语的了解情况	所授课程
罗戈夫	苏联翻译，特约驻华记者，熟悉满洲问题	缺失
阿尔图福夫	缺失	联共（布）党史
亚兰采夫	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	政治经济学
库丘莫夫	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工人运动史
约翰森	懂汉语	工会运动
齐曼	汉学家	政治经济学
雷斯卡娅	汉学家	苏联经济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国际列宁学校教育培养的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向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准则在 1948 年 12 月刘少奇的讲话中得到总结和体现：“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①这种干部教育理念，既为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又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不断的中国化。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教学工作也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体现了这一原则。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们注重联系实际讲授理论知识，例如，周达文“把革命实践的经验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以其良好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学员的兴趣”；陈潭秋在列宁学校讲授中共党史课程，他在课堂教学中常把马列主义理论和苏区的武装斗争、苏区的政治和经济等内容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举例生动，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喜爱”^②；奥尔林斯基“把深奥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693 页。

②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2852. Л.112.

理论问题讲得清楚易懂，能联系当时的问题”；党的建设课程教师罗日诺夫“拥有丰富的材料和经验，教学方法也很好，能够解释复杂问题”；齐曼“在他的课堂上以必要的党性锋芒奉行正确的党的政治路线，充分涵盖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①

除了课堂上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国际列宁学校还注重教学活动中的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结合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即所有受教育者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投身社会实践，从而做到以教育提高生产劳动，以生产劳动促进教育。二是教学活动与革命实际工作相结合。

在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层面，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管理层重视在实践培训中提高学员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能力，以实践活动“检验学员是否正确吸收理论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在实习开始之前，学员们停课五天进行实习准备工作。在这五天里，学员们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实践的主题和实践说明，并选出一名负责组织实践的指导教师。^②指导教师一般由社会主义和党建课程的教师担任。

列宁学校中国部最初的实践形式是参观：学员与当地工人交谈，参加工厂会议。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学员们开始到企业工作。地方党组织为开展实践培训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必要时，他们为学员提供住宿，参与制定参观计划以及上述其他形式的实践培训。

首先，学员们参观工厂，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会见车间主任、工匠、劳动模范、组长、工人、老党员和国内战争参与者。会议和座谈结束后，学员们参观工人住所，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其次，列宁学校的学员在工人会议上讲述参加实践活动的体会，并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③如1931年，中国部教师带领学员参加了全校暑期实习。实习在苏联一些最大的工厂进行，这些工厂包括：列宁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的农业机械制造厂和下诺夫哥罗德的索尔莫沃工厂。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实践课，学员们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特定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些小组要分析生产中群众工作的特殊性，另一些小组则要分析动员群众实现

① РГАСПИ. Ф.495. Оп.65а. Д.6096. Л.3; Ф.531. Оп.1. Д.220. Л.82.

②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33. Л.9.

③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01. Л.24.

工业和财政计划的形式和方法。^①每个小组由一名中国部教师担任组长，一名学员担任助理。^②1930 年暑假，董必武就前往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③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教师参与组织的另一项实践活动是组织学生参与党的建设。1935 年 7—8 月，学校选派了 23 名中国学员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部分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④他们参与了国际共产执委会出版物的材料准备和简报编写工作，并协助翻译工作和秘书工作。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学员们被分配到不同部门，并根据与校务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分领个人任务。中国部的学员还被派往区党委直接从事党的工作。^⑤实习期为冬季两周或夏季一个月到一个半月^⑥。自 1928 年起，许多学员（通常是二、三年级的学员）在共产国际、共青团和苏联其他国际组织的机构中实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学校管理部门认为，“实习在列宁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许多学员认为，“实践给予他们的东西比一切理论学习都多。”^⑦

（三）教学相长，寓学于教

国际列宁学校教师群体在理论学习中不断加强对马列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在对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和翻译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并把积累的相关经验应用于教学之中。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教师群体的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参与校刊《列宁学校》和《为冲锋工作》两本杂志的编辑、翻译和教材编写活动中。上述杂志用俄文出版，然后由各部门的师生进行翻译，其中也包括中国部。

列宁学校成立之初就非常缺乏既通晓多种语言、又能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这一现状使得培养教师的必要性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学校教师带领学员从 1927 年开始用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出版

①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27. Л.23.

②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33. Л.27.

③ 郑惠、张静如：《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董必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7 页。

④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6. Т.1. Л.63-64.

⑤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21. Л.6, Л.16.

⑥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31. Л.7.

⑦ РГАСПИ. Ф.531. Оп.1. Д.11. Л.8; Д.2. Л.53; Д.33. Л.22

校刊《列宁学校》。根据学校领导的设想，该杂志“在学校领导层和支部（即党委）总路线的基础上，为列宁学校集体的思想和组织凝聚力服务。”从1933年开始，学校教师编辑的杂志《为冲锋工作》出版。其任务包括直接和最全面地向学员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校领导称其为“激进的政治机关刊物”。^①该杂志不超过20页，每二十天出版一期。杂志报道各部门在完成教育和生产计划、实践培训以及社会主义竞赛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外，还定期报道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研究工作计划包括：组织对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各共产党情况的研究，编写必要的课本和教材，出版关于革命运动的专著，汇编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参考资料以及关于当前国际政治的报告。

（四）注重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所办的军政学校强调来自各区域学员们之间的联系，旨在使得这些区域的革命均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学校的教学努力构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网络，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中国革命的国际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党的联系等。中国革命与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在学员们的共同学习中得以构建和加强。

一方面，从学员构成上看，该校不仅有中国学员，还有来自英国、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人，这种多元背景的学员群体为跨国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该部门一些校友的回忆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与世界共产党在列宁学校形成了密切联系。马员生提到了他在该校学习期间（1926—1928年），和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学员之间关系十分友好，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他与朱代杰同时到达莫斯科，一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都转到了国际列宁学校，^②并与在英语部学习的董必武、刘仁静、黄平、周达文、俞秀松和朱代杰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互动不仅限于日常交流，还体现在共同参与政治活动和理论学习中。蔡和森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在列宁学院学习，与来自多国的学员共同探讨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加深了对马克思

^① РГАСПИ. Ф.531. Оп.2. Д.31. Л.38.

^②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主义理论的理解，也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渠道。此外，列宁学校还组织学员参观苏联农村和工厂，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节等重要节日的集会游行活动，使中国学员与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另一方面，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校友网络成为中共与国际共运联系的重要纽带。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该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骨干，这些学员回国后在党的核心岗位上发挥关键作用，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沟通的重要桥梁。蔡和森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后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选举为执委会委员，并将毛泽东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名单，这表明国际列宁学校校友在共产国际中的影响力。^①董必武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期间，与来自各国的学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继续与共产国际保持沟通，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刘仁静、黄平、张国焘、李维汉等人同样通过列宁学校的校友网络，加强了中共与国际共运的联系。

三、结 语

20 世纪 20 年代，为解决国际无产阶级干部培养的问题，成立了国际列宁学校。国际列宁学校自建设之初就具有高级党校的性质，共产国际对该校的投入高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 年，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成立并成为之后十年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刘仁静、董必武、高自力、王若飞、李立三等一批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曾经在这里学习。

国际列宁学校的实践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提供了经验和借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严谨的教学管理模式、教学相长的方法、注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等，为新中国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① 张寿春：“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如何与共产国际联系”，2019 年 6 月 17 日，http://zhounenlai.people.com.cn/n1/2019/0617/c409117-31163981-3.html?uc_biz_str=S:custom%7CC:smrobot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历史经验表明，干部教育必须立足实践，面向国际，注重实效，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些经验对新时代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干部；三是注重师资队伍的多元化和专业化，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四是根据不同干部的特点和需求，实施分类、分层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新时代干部教育应当汲取列宁学校中国部的经验，同时也要避免其历史局限性。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在培养干部过程中，有时过于强调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因此，新时代干部教育应当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出既有坚定理想信念又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历史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实践，它和国内的干部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的连续谱系。从历史维度看，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干部教育模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从现实维度看，列宁学校的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全球视野等，至今仍是值得继承与重视的重要经验。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found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as a senior cadre training institution, with its Chinese Section established in 192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preparation, founding, leadership evolution, and curriculum design, focus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ection. Overall,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provid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several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ese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faculty a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cadre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adre training;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maintaining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s cadre education and the proletarian partie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Lenin School thus left behind a relatively rich legacy of ideas for cadre education, cultivating a group of educators who later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CCP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 Cadre Training,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Аннотац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 созданн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 являлась высшим учебным заведением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артийных кадров. 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тор школы был основан в 1928 году.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люче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школы: этапы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основания, эволюц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 структура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с особым акцентом 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ектора. 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тор сыграл важную форм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в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ПК)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целом, оставив ряд цен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роков. Среди них –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креплен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как основы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адр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теории с практикой как ключевой принцип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заимное обучени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и учащихся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ый метод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а также важность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вязей с пролетар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 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т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не только обогатил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рсенал КПК, но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 воспитанию поколения педагогов, сыгравших важную роль как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так и в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 обучение кадр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теории с практикой, китаизация марксизма

(责任编辑 崔 珩)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远东华人教育问题*

孙会修**

【内容提要】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远东地区为解决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劳动力问题，一度对华人采取友好政策，让其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权。根据苏联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远东政府举办扫盲班、夜校等，在全区建立众多华人小学，并推动职业教育和党校教育，意图达到利用华人建设远东和改造华人思想相偕并进的效果。然而，过高的目标与有限的资源导致华人教育的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巨大，大部分“成绩”仅停留在纸面上，华人学习所需要的师资、场地、教材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受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远东政府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情绪挥之不去。为解燃眉之急提出的华人教育问题，很快被远东政府视为累赘，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华人华侨教育运动以失败收场。20 世纪 30 年代远东华人教育工作的历程，透露出苏联开发远东和民族国家整合的困境。

【关键词】苏联远东地区 华人教育 苏联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153(27)

受研究充分与否等因素影响，在谈及华侨华人历史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东南亚华侨或欧美日等地的华侨，对苏联远东华侨则认识有限。但这丝毫不影响远东华侨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学术研究价值。1858 年《璦琿条约》签订后，中国外东北居民坐地成侨，成为独特的华人华侨群体。十月革命后，远东地区华人数量波浪式增长，至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 12 万人左右，约占当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27）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 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地人口五分之一，成为当时与中国接壤国中规模最大的华人华侨群体之一。他们是开发远东和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与东北亚局势变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时，远东政府借助苏联的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计划，大力推动华人教育工作，促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由政府统一推动的华人华侨教育运动。但是，华人教育工作的效果却远不如预期。背后原因，与苏联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有关。远东华人在教育问题上的困境，是其生存状况的缩影，对认识苏联史、东北亚区域史亦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远东华人教育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利用远东官方华文报纸《工人之路》，^①兼及俄罗斯远东国立档案馆、滨海边疆区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材料，探究造成相关问题的历史原因以及背后的文化机制。^②

一、远东政府推动远东华人教育工作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设有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远东边疆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рай，当时有华人称之为“沿海边疆区”）。该区域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外东北区域，主要城市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工人之路》（Рабочий путь），1922 年 3 月在赤塔创办，后来办刊地转至伯力，是联共（布）远东边疆委员会和苏联远东边疆职工苏维埃机关报，由华人负责编辑，是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远东地区最大的中文官方报纸，1938 年停刊。

② 在现有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远东华人的研究中，有学者论及教育制度问题，不过缺乏对制度如何运行的讨论。См. Залеская О. 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58-1938 гг.) ГОУ ВП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9. С.302-321; [俄] 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恰著：《中国人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 年）》，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289—342 页。围绕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沿革探讨，较为平面，且缺乏对整体教育问题的讨论。其他有代表性的关于远东华人的研究鲜有涉及教育问题。参见 [俄] А·拉林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阎国栋译，《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17 页；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孙会修：“工运训练与工人革命：大革命结束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华工中的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6—29 页；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Ляшковский В.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1858-1938. Хабаровс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аму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9.

（Владивосток，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伯力）、乌苏里斯克（Уссурийск，双城子）、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原鄂温克语地名为“哈喇泊”、“海兰泡”，^①庚子国变后当地华人多以汉译名“黑河”称之，与现今中国黑河市隔黑龙江相望）、尼古拉耶夫斯克（Николаевск-на-Амуре，庙街）、帕尔季赞斯克（Партизанск，苏城）和萨哈林州（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库页岛北半部地区，南半部当时为日本统治）等。^②这些地方和诸多城镇、村落均有中文名称，当时华人袭用称之，本文亦是如此。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起，东北亚地区局势剧烈变动，远东地区华人人口规模出现起伏。1926 年，远东边疆区华人登记人口为 72005 人。1929 年 6 月，中东路事件爆发。远东各地随后出现以各种理由打压华人的情况，7 月至 9 月中旬，在伯力被捕的华人约 1000 人；9 月，海参崴监狱中竟关押着 1600 名华人。一些华人选择回国。1932 年，远东华人登记人口为 57711 人，与 6 年前相比降幅明显。^③不过，随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局势混乱，以及中苏关系随后回温，并于 1932 年 12 月复交，远东华人人口规模迅速回升。

其实，远东华人人口的变动幅度并没有登记数据所呈现的那样剧烈，且实际人口规模远大于登记数字。1900 年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大屠杀给远东华人带来了长期的心理阴影，中东路事件前后官方的任意处置，令当地人颇感忧虑，在他们当中流传着“总有一天华人会被俄国人扔进黑龙江（阿穆尔河）淹死”的说法，^④故在面对人口登记时难免出现故意不报的情况。当然，同样不能随意夸大人口规模。据 20 世纪 30 年代在远东工作过的华人

① 荆宇航：“近代中俄冲突下的黑河地区中国商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6 年，第 73 页。

② 当时库页岛被苏联、日本分北南两区分别占领。1925 年 5 月，苏联在库页岛北部成立萨哈林区。1932 年 10 月，萨哈林区改称萨哈林州，由远东边疆区管理（<https://sakhalin.gov.ru/index.php?id=22>）。1938 年 10 月，苏联将远东边疆区划分为哈巴罗夫斯克区（Хабаровский район）和滨海边疆区（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北库页岛由哈巴罗夫斯克区管辖（<https://primorsky.ru/primorye/istoriya>）。为叙述方便，本文将上述地区均称为“远东边疆区”。

③ Залесская О. 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58-1938 гг.). ГОУ ВП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9. С.383, С.394-395, С.410.

④ Там же, С.383, С.410, С.262.

后来估计,当时远东最大城市海参崴的华人有 10 万人以上。^①这一数据常被中国研究者引用。的确,海参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当时城市街道两旁华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街上形形色色的华人络绎不绝,与同时期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国东北城市的景观并无太大差别。西南岁子是海参崴最大的华人社区,^②中国学校、剧院、电影院、寺庙等设施颇为齐全;^③这里华工人数众多,仅在该区第一段就有 582 名中国运输工人。^④但是,对海参崴和远东华人的数量不能估计过高。1933 年 4 月,边疆区统计,全区各族人口共有 67.4 万。^⑤据此而言,仅海参崴一个城市的华人不可能超过 10 万。

华人潮汐性流动的特征又加剧了掌握群体数量的难度。华人中一些人农忙时在中国境内,闲时到远东务工,或者在远东工作几年,而后回到国内,客观上使远东华人数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远东地区气候寒冷,资源型为主的厂矿企业以及农业、渔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华人的流动性。1931 年 4 月,远东地区天气渐暖,工农业生产日趋活跃。在苏城地区,当月有 166 名华工抵达,250 名华工离开;5 月,新来 185 名华工,同时有 210 人离开。这是远东华人流动状态的缩影,以至于报纸发出“工人流动性太甚”的感慨。^⑥流动性强,加上喜欢聚集性生活,苏联人^⑦常以侮辱性和歧视性的词汇“Фазан”(读音译为“法赞”,是“野鸡”之意)来称呼华人。

尽管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一些材料中可以得到华人规模的大致数字。1931 年 4 月,《工人之路》透露:“在苏联远东一带有七万多中国工人和劳动者。”^⑧这一数字仅就工人和农民而言,并未计入老幼和闲散人员。同一时间,伯力市政府统计,辖区下洪口区有华人 1131 人,其中仅有 340 人是

① 方未艾:“海参崴的中国党校”,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等编:《辽宁文史资料总第 53 辑:历史珍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33 页。

② 因该区域有数量众多的华人聚居,被一些俄罗斯族人称之为 Миллионка(百万庄)。

③ [苏]叶华著:《我们一见钟情——我与萧三》,祝彦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第 52 页。

④ “中国运输工人为图集速度二斗争”,《工人之路》,1931 年 6 月 17 日第 1 页。

⑤ “远东边疆的人口”,《工人之路》,1933 年 4 月 18 日第 2 页。

⑥ “工人流动性太甚”,《工人之路》,1931 年 7 月 3 日第 1 页。

⑦ 本文的苏联人指当时的俄罗斯族人,特此说明。

⑧ 相:“坚决消灭东方工人中的流动性”,《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4 日第 3 页。

工人，占总人数的 30%。^①该地位于中苏边境，与抚远县（当时为吉林省下辖县）仅一江之隔，华人人员构成复杂。而在距离边境较远地方工厂和农场的劳动者，一般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大，老弱与其他闲散人口比下洪口区少。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经过调查给出比例数字：工人占远东华人的 50%，农民占 15%，其他人口占 35%。^②由此推算，20 世纪 30 年代远华人有 12 万左右，约占远东总人口的 18%。此外，十月革命以来，受战争等因素影响，苏联男少女多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一些俄罗斯族女性与华人男性结婚生下的混血儿被华人称为“二转子”，属于广义上的华人范畴。^③总之，为数众多的远华人与朝鲜人共同构成当地重要的少数民族群。

除传统居民外，华人新移民多来自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山东、河北等省，他们对来苏均有各自考量。1931 年 6 月，海参崴砖窑工厂新来 200 余名华工，他们将新工作与在国内的工作进行对比：在国内每天工作近 16 个小时，收入仅为 2 毛 5 分，吃住条件极为恶劣，雨天停工无报酬，且常遭受来自警察的无故打骂和征拉无偿做工；在海参崴则每天工作 7—8 小时，工资比国内高“几十倍”，吃住条件也非常好。苏联媒体意图通过“两个世界”的对比，展现苏联的社会优越性，虽然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却也道出了华人大量涌入远东的主要原因。^④

主体性较弱是远华人的另一特征。在历史上，华人曾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人群和主人。后来沙俄大规模向此地移民，当地人口构成逐渐发生变化。远华人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引起了沙俄以及苏俄政府的恐惧，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防范。1900 年海兰泡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故 1858 年以来，远华人总数虽偶有波动，但其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却逐渐降低，至 20 世纪初期已低于 50%。^⑤与世界其他地

① 英合：“整顿下洪口”，《工人之路》，1931 年 5 月 8 日第 4 页。

② 《党校五年计划》，1931 年 5 月 27 日，См. ГАПК. Ф.432. Оп.1. Д.12.

③ 方未艾：“海参崴的中国党校”，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等编：《辽宁文史资料总第 53 辑：历史珍忆》，第 234 页。

④ 老乡：“新从中国到苏联的中国工人的认识”，《工人之路》，1931 年 6 月 13 日第 3 页。

⑤ [俄]А·拉林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阎国栋译，《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2—7 页。

区华人华侨群体相比,远东华人群体的社会发育持续受阻,不仅不存在独立性强的社团,且没有单独的学校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育体系。对于此种情况,华人群体持静默态度。一方面,由于赴远东的华人主要为谋生而来,能吃苦、忍耐度高;另一方面,华人精英普遍对地方政府存有较强依附性,鲜有发生主动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的群体运动,更未出现东南亚等地华人群体为争取平等教育权而抗争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远东政府对当地华人的主导性地位。

从 1928 年起,苏联结束了列宁逝世后的政治动荡局面,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被提上日程。远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林业、渔业资源,这迅速激起地方的开发热情。“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该地的地缘政治价值迅速上升,因此,苏联急切需要提高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但不同于苏联欧洲部分,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不能满足资源开发所需的人口数量。秉持本国优先原则,苏联积极从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等地移民至远东,并给予免除三年农业税等优惠待遇。但由于距离遥远等原因,移民效果有限,且苏联欧洲部分同样缺乏人口,又受战争威胁,移民政策效能逐年递减,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初仅勉强保持一定数量。^①人力缺乏成为五年建设“最困难”之事。^②1931 年上半年,苏城半站采煤月度完成率仅在 50%上下徘徊,被媒体称为“持续着可耻的亏空”,当地煤矿管理部门认为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工人数量不够,仅 7 月份就有 1520 人的缺额。^③

从内部解决问题的道路受阻后,远东政府开始考虑大量使用华人。华人中虽有抽大烟、爱赌博者,但总体比苏联人勤劳,不酗酒,少误工,服从意识强,是不可多得的劳动力资源。根据苏籍工程师的统计,1929 年 10 月至 1930 年 10 月,远东苏联工人的生产率下降了 34.5%,而华工的生产率提高

① 王晓菊:“苏联的远东移民政策与人口增长”,《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② 《党的全体大会》,1929 年 12 月 14 日,См. ГАПК. Ф.432. Оп.1. Д.3。

③ “苏城半站采煤的亏空应当急速弥补上去”,《工人之路》,1931 年 7 月 3 日第 1 页。

了 18%，^①两者差距一目了然。因此，远东积极设法从中国吸引劳动人口，甚至使用一些非常措施。1928 年，苏联某靠近中国的地区工业生产任务较重，当地竟以“吸食大烟方便”作为招募华工的条件（第二年，因担心上级追究方才停止这一做法）。^②受此影响，华工占远东工人比例持续攀升，1931 年 5 月达到 40%，^③是远东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远东华人主要从事厂矿、伐木、捕鱼、种田等苦力工作，日常生活较为单调，打麻将、抽大烟等是他们最常见的休闲方式。远东华人虽然成为苏联建设的重要生产力，但其素质与苏联社会主义对国民和工人的要求相差甚远，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甚至政治安全。1928 年 10 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调研报告称，远东“中国工人不但不识字和没有一点政治的意识，并且大半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出身”，信奉帮会或“红胡子”的行事规则。^④苏联政府认为，流动性强、在局部地区自成小社会甚或秘密社会的华人群体将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远东政府对华人的担心进一步增加。1931 年 4 月，伯力市政府统计，在下洪口区华人中竟有 500 多“什么也不做的闲人”，这些人主要从事大烟馆、咖啡馆、私人银行、走私等行当，他们当中经常发生抢劫、打架等问题，甚至成为散播“反苏联的各种谣言”的重要人群。^⑤显然，现实的生产需要令苏联政府不得不对华人委以重任，但华人群体非无产阶级的散漫特征，又使当地政府很难放下心中顾虑，做到用人不疑。

为突破两难困境，边疆区政府意图通过教育让华人掌握知识，接受社会主义文化，并将华人纳入苏联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如此，现代工农业生产要求生产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也是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苏联政府因而非常重视对华人的教育问题。1927 年 12 月举行的联共（布）十五大指出：“把文化建设计划与国家工业化衔接起来，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计

① “苏城中国工人状况及为实行列宁民族政策的争斗”，《工人之路》，1931 年 2 月 18 日第 3 页。

② 《对远东东方工人工作的决议案》，未署时间，См. РГАСПИ. Ф.530. Оп.2. Д.113.

③ 《党校五年计划》，1931 年 5 月 27 日，См. ГАПК. Ф.432. Оп.1. Д.12.

④ 《黎本益等三人致支部的信》，1928 年 10 月 20 日，См. РГАСПИ. Ф.530. Оп.2. Д.64.

⑤ 英合：“整顿下洪口”，《工人之路》，1931 年 5 月 8 日第 4 页。

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后，苏联大力推动扫盲和适龄儿童入学工作。1930 年 8 月，政府推行青少年普及小学四年义务教育和城镇青少年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后者为 7 年制教育。^①1933 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对教育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消灭苏联国民中的文盲和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中的半文盲，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而且要实行 7 年制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②扫盲和让适龄儿童上学，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远东华人教育工作亦是题中之意。

远东华人多是来自中国东北或山东、河北等华北地区的农民或其后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1931 年 4 月，据抽样调查统计，远东华工的识字率仅为 30%，^③如果算入老弱妇幼群体，识字率更低。而 1930 年苏联国民的识字率已达到 62.6%。^④另据统计，当时海参崴共有工人 1.67 万人，其中 1.5 万人不识字，文盲率为 90%；而华工不识字者有 0.53 万人，占总文盲数的 35%。也就是说，识字华工仅占极少数。^⑤这两个数字可能有抵牾之处，但均揭示出华人受教育程度之低。不过，一旦政府重视并推动，华人教育工作效果显著增强。20 世纪 30 年代，相当比例的远东华人保有中国国籍，^⑥苏联政府仍比照苏联国民进行管理，享有受教育权益。受这一政策推动，1928—1929 学年仅 18.7% 的华人儿童入学率，到 1930—1931 学年迅速增长至 87.5%，发展速度极快，当然也有提升的空间，例如，情况类似的朝鲜人入学率已达到 95%。^⑦这样的提升，对于重视数目字考核的远东政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故

① [苏]H. A.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吴式颖、周蕙、朱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24 页，第 429—430 页。

② 《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1934 年 2 月，载《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377 页。

③ “检阅我们过去的工作”，《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6 日第 4 页。

④ [苏]H. A.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吴式颖、周蕙、朱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29 页。

⑤ 印度：“海参崴文化大检阅的总结”，《工人之路》，1931 年 5 月 16 日第 4 页。

⑥ 有研究认为当时 98% 的远东华人未入苏联国籍，可参考[俄]A·拉林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阎国栋译，《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0 页。此说法稍显夸张，但多数华人不是苏联公民应是事实。

⑦ “小统计：东方工人的儿童中初级普及教育发展的速度”，《工人之路》，1931 年 3 月 10 日第 4 页。

在 30 年代推动华人教育工作的力度持续加强。

对于华人而言，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提升和阶层流动机会并不多，但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地方社会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也使其具有较强的学习动力。在俄语主导的社会中，华人文盲的生活多有不便。他们能说汉语，但不识汉字，对俄语既不能说也不识字。一位华工在乘坐电车时买票需要找零，女售票员对其说：“Гражданин, Найди деньги для тебя（作者按：公民，找钱给你）。”因他不懂俄语，对售票员的话无动于衷，连续三次均是如此。缺乏耐心的服务员于是大声抱怨：“Китайц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стали！（作者按：中国人真是落后）”，称“Гражданин”（公民）不懂，非要叫“伙计”、“法赞”才有反应，但她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怎能这样叫呢？这位售票员最后大声喊道：“Гражданин Китайцы（中国公民）。”华工听到熟语“Китайцы”始有反应。同为乘客的海参崴职工学校华人学生由此感慨华人扫盲工作的重要，遂致书媒体建议各地在推动扫盲工作和教华人读中文书报时，也教一些常用俄语。^①

华人知识水平低，不能达到苏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同样不利于自身的成长。一般而言，华人接受教育程度往往与收入直接挂钩。矿工、农场工人、渔民、伐木工等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基础，而这些低门槛的工作条件艰苦、收入低，且远离都市，生活环境恶劣。收入相对较高的工厂工人、驾驶员、餐饮行业工人、教职员或政府公务员等职业，均需一定知识基础和专业技能。在苏城的煤矿中，“装车”、“传材料”等重体力活基本由华工承担，而相对高级的 445 名“刨镗”工中仅有 60 名华工，占 13.3%。^②朴素地提升生活层次的观念，赋予华工通过学习改善自身境遇的强烈意愿。尽管不少远东华人只将远东视为暂居地，但掌握的知识在回国后依然有用武之地，甚至可能成为命运转变的关键因素。

中国传统的崇文重教和互助观念亦对远东华人有深远影响，他们对于知识充满崇敬与向往，愿意为族群内的教育工作提供帮助。1931 年 3 月，伯力东方工人李大钊俱乐部举办募捐晚会，以购票方式募捐，华工“都非常踊跃

① “加紧中国工人中的扫除文盲工作”，《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8 日第 4 页。

② “苏城中国工人状况及为实行列宁民族政策的争斗”，《工人之路》，1931 年 2 月 18 日第 3 页。

地购买”，票很快被卖完，筹集了近 1000 卢布，创下该俱乐部募捐晚会的“新纪录”。^①远东华人是苏联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远东政府经常向华工号召：“加紧学习军事和政治，准备到必要时，回国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②这种宣传客观上唤醒了远东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价值的重估，成为学习的重要情感支撑。

二、远东华人教育体系的建立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已经有意识地在远东华人中开展政治和扫盲教育工作。1927 年 11 月，远东政府开始在华人中设置中国人指导员（*китайские инструкторы*），担任此职务的人，或是精通汉语的苏联人，或是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并熟练掌握俄语的华人，但符合要求者极为有限。因此，担任指导员者往往是一些不专业的临时人员，他们不会按要求开展社会工作，反而利用职务之便向妓院和赌场的经营者收取贿赂。^③苏联当局于是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远东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选派华人学生到远东华人群体中，以指导员的名义开展工作。1928 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向远东派出 14 名学生担任华人工作指导员，将金矿厂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华工的政治水平。^④此举不仅便于远东政府管理华人，还锻炼了学生的政治才能。不过，此时远东对华人教育的工作力度总体有限，指导员多属于学生实践范畴，工作内容多限于政治教育和社会调查等方面，对推动华人教育工作效果并不明显。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至 30 年代，受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热潮影响，在边疆区少数民族教育厅的推动下，华人教育工作发展迅速，呈现出政府主导、计划性强、辐射面广、方法多元的特征。对边疆区来说，扫盲是有中央政府指标要求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推动。1931 年，边疆区教育厅制定了华工教

① “壮大的募捐晚会”，《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10 日第 4 页。

② “远东工厂中国工人召集大会”，《工人之路》，1932 年 6 月 20 日第 4 页。

③ Залеская О. 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58-1938 гг.) ГОУ ВП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9. С.258.

④ 《黎本益等三人致支部的信》，1928 年 10 月 20 日，РГАСПИ. Ф.530. Оп.2. Д.64.

育年度计划，要求招收 4.3 万人进入识字班学习，^①占能动员华工文盲的多数。显然，当地意图用最快的时间完成扫盲工作，推动工作意愿之迫切可见一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下级对上级提出的要求往往留出可操作的伸缩空间，客观造成层层加码效应。为解决华人识字问题，伯力城市教育部门许诺，只要有五六个华人报名，上级便会派教师开班教学。^②这一许诺稍显冒进，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热情期待下，远东华人教育工作被强力推动起来。

远东政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开展华人扫盲工作。第一，依托华人组织建立识字班。边疆区各华人小学、海参崴中国师范学校、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以及海参崴中国剧院等地，均有常设的识字班。海参崴中国剧院更因其场地优势，常年开设各种形式的扫盲班和补习班。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政府支持下，远东各城市一般都建有中国工人俱乐部，这是政府开展管理和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平台，被视为训练和教育群众“最好的机关”。^③1931 年，庙街成立东方俱乐部，配置图书、中文影片和无线电话，计划将辖区华工 100%吸收到俱乐部。^④有鉴于此，远东边疆区政府常常在俱乐部之下建立识字班，作为扫盲工作的重要载体。它有时还为其他小型华人组织提供扫盲场地。黑河华人工艺联合会人数较少，东方工人俱乐部便与其合作开展扫盲和其他文化工作。^⑤更有甚者，远东地区还建立新的华人组织以推动扫盲。1931 年 7 月，伯力成立中国夜校师范短期传习所，动员一些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暑期或业余时间进行文化调研和扫盲工作，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组织了 3 个识字班。^⑥

第二，继续选派指导员负责考察和督导扫盲工作。1930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之前，向远东派出最后一批华人指导员。此后，远东政府完全从当

① 华白：“造就自己的下级干部：政治的干部”，《工人之路》，1931 年 6 月 13 日第 4 页。

② 佩：“这是一个病象呢！”，《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8 日第 4 页。

③ “加紧伯力东方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工人之路》，1931 年 11 月 19 日第 4 页。

④ “远东边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少数民族部一九三〇年在中国劳动者中所做的工作和一九三一年应有的任务”，《工人之路》，1931 年 2 月 8 日第 3 页。

⑤ 海：“实行提高了民族文化”，《工人之路》，1931 年 7 月 13 日第 4 页。

⑥ “伯力中国夜校师范短期传习所学生的号召”，《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2 页。

地培养或选拔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合格的知识分子担任指导员，负责调查分析各地华人文化情况，督促当地开办华人识字班，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兼任教员工作。这些毕业生主要从事扫盲等文化工作。随着扫盲工作力度增强，指导员需求量骤增，远东政府于是采用速成的方式集中培养扫盲教师兼指导员。1931 年春，海参崴中国党校设立“中国消除文盲速成班”，在整个边疆区分片按名额招收 90 人，分成 3 个班教学，6 个月速成。因受政府的重视，速成班学员待遇优厚，不仅在校期间每月享受 100 卢布的津贴；毕业后，政府还承诺会将其分配到中国工人群体中，在工厂、农庄、船队或车队中担任指导员，做扫盲工作或其他文化工作，每月薪金不低于 125 卢布。正因承担着边疆区华人扫盲工作的重任，速成班对生源设定较高的政治和文化要求：必须是工人或劳动者，具备工会会员身份；有 1 年以上生产建设经验；中文达到“相当的程度”，能够保证毕业后担任补习学校教员。^①中国党校培养的学生是华人扫盲工作骨干，但对于远东的华人规模来说并不多，因此各地设法补充和培养更多指导员。1931 年，黑河设置为期 6 个月的指导员训练班，培养了 24 名指导员。^②1931 年秋，远东最高级别的党校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招收 41 人，比前一年扩招一倍以上，招生区域扩展至全苏联的华人。^③

第三，通过突击队或劳动竞赛等形式推动扫盲。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苏联常用突击队和劳动竞赛等形式推动建设，远东扫盲工作中同样广泛应用此法。1931 年年初，海参崴城市建设中国部发起第一次中国工人文化建设突击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4 月，鉴于双城子发起了文化建设“五一”竞赛，该部发起第二次突击运动，计划“将一切不识字和少识字的中国工人尽量吸收到补习学校念书”，^④要在半个月组织 1500 人到补习班读书。^⑤市内的扫盲突击竞赛再掀高峰，海参崴小通南区渔业造船厂华人补习班中的突击队员“号召海参崴各区的补习学校来比赛”，并亮出班上有 30 人“每天百分

① “远东边疆中国消除文盲速成班招生通告”，《工人之路》，1931 年 3 月 10 日第 4 页。

② “加紧训练中国工人积极分子”，《工人之路》，1932 年 1 月 4 日第 4 页。

③ 夫：“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本学年招生的总结”，《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3 页。

④ 印度：“海参崴扫除文盲的突击运动”，《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8 日第 4 页。

⑤ “海参崴中国工人扫除文盲的情形”，《工人之路》，1931 年 5 月 6 日第 4 页。

之百上课”、“百分之百遵守学习的纪律”、两个月内都能识字和说常用俄语的成绩。报纸称赞他们为“全远东中国工人文化革命的榜样”，号召华人向其学习。^①此后，远东各地华人扫盲突击队或竞赛经常出现，偶有阶段性高峰。1932 年夏，远东推行汉语拉丁化运动。在拉丁化新文字推行前，华人均是文盲，故各地发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字扫盲突击队和竞赛。1934 年 9 月，黑河东方工人俱乐部识字班宣布参加刊物大竞赛，以新文字创办刊物。^②这对华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远东华人扫盲教育要求全覆盖，这必然需要对特殊人群投入较多力量。远东华人妇女文盲率接近百分之百，因此成为扫盲工作的重点。在海参崴、伯力等远东较大城市，均设有妇女俱乐部，在其之下常常开办妇女识字班。偏远地方亦受到关注。1931 年 1 月，正是伐木工人工作淡季，南以地区中国森林工人组织了三个识字班，参加者共 45 人。他们不仅学习中文，还学习算术和政治常识，参加者均反映较有收获。^③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民也有识字学习的机会。1936 年，华人妇女张锦荣加入四站地区的斯大林集体农庄，“每天在工作之后，还能参加免费的学习”。^④

在推行扫盲教育时，远东政府曾考虑直接用俄语扫盲，这既能缓解师资问题，又尽可能教授华人俄语。1931 年，华人指导员多次督促缺乏教员的通西地区进行扫盲工作，矿工工会和建筑工会于是成立了俄文补习班。^⑤1933 年 4 月，吉夫达（Кивда）煤窑成立了华人扫盲班，用俄语授课。^⑥不过，在华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直接用俄语教学导致师生无法顺利切入教学流程，舍本逐末。故纷纷改回中文扫盲，兼授日常使用俄语。

在苏联的设计中，扫盲仅是初级阶段，边疆区希望通过传授知识，最终

① “海参崴小通南葫芦岁渔业托拉斯造船厂东方工人补习学校突击队”，《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2 页。

② “黑河东方工人俱乐部识字班宣布参加刊物大竞赛”，《工人之路》，1934 年 9 月 22 日年第 3 页。

③ “南以中国工人的生活情形”，《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4 日第 4 页。

④ 张锦荣：“我过着富裕和文化生活”，《工人之路》，1937 年 3 月 8 日第 2 页。

⑤ “通西东方工人扫除文盲的情形”，《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8 日第 4 页。

⑥ “吉夫大煤矿东方工人底党和文化工作的转变”，《工人之路》，1933 年 5 月 5 日第 2 页。

让华工掌握更多文化,知晓苏联的价值观念。1933 年上半年,国际师范大学中国部设立了华工夜校,在教人识字的同时,还讲授政治常识、中文、俄文、算术、中国问题等内容,^①希望达到提升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的双重目标。不仅如此,为更快捷地服务工业化建设,远东华人扫盲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得非常紧密。1935 年 7 月,海参崴“五一”俱乐部成立缝衣组,首先教妇女缝纫机使用技术,而后让其做工,晚上在补习学校读书,“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这既为工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又可增加他们的文化知识。^②通过一年的努力,她们缝制的衣服质美价廉、款式新颖,受到好评。而其夜校学习内容也已不限于识字,开始学习政治课并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③当然,远东地区不乏专门的华人职业教育。1931 年,海参崴远东建筑工会开办建筑工人工艺讲习所,招收 25 名华人,传授俄式建筑建造技巧。^④依托工厂进行职业教育的针对性更强,半站地区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监工讲习所,斯巴斯克苏维埃农庄成立拖拉机讲习所,吸收十几位中国工人入学,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文化工作领域的职业教育亦有推动,伯力印刷所技术组补习班在传授印刷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媒体呼吁将其经验“普及到全边疆中国工人中去。”^⑤

远程职业教育在远东华人中也已出现。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伯力无线电编辑处与远东共产主义大学合作,用汉语进行无线电函授教学。根据莫斯科函授学院的讲义授课,每月播报 6 次,还设置了电话答疑时间;在学年结束时,组织为期 20 天的讨论会,以便测试成绩。^⑥1932 年秋,莫斯科电信大学及附属劳动学院招收远东华人和朝鲜人共 18 人,同样为无线电授课。^⑦

① “国际师范大学中国附设工人夜校”,《工人之路》,1933 年 6 月 2 日第 2 页。

② “‘五一’俱乐部缝衣组的改组”,《工人之路》,193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③ “海参崴中国妇女缝衣组情形”,《工人之路》,1936 年 3 月 8 日第 2 页。

④ “海参崴远东建筑工会通告”,《工人之路》,1931 年 3 月 8 日第 4 页。

⑤ “在生产中技术教育应当普遍的施行吸收大批的中国工人学习技术是执行史大林同志指示的重要任务”,《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3 页。

⑥ “伯力无线电话党的积极分子讲习班招生通告”,《工人之路》,1931 年 11 月 13 日第 4 页。

⑦ “莫斯科电信大学招生广告”,《工人之路》,1932 年 6 月 10 日第 4 页。

子女教育最受华人看重，边疆区政府也将其视为让华人安居乐业和提供源源不断劳动力的重要工作。在远东的华人聚居区，地方政府均设有主要服务华人子女的幼儿园，这成为华人教育工作的有益补充。1930 年，远东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决定在苏城、双城子、海参崴、黑河、庙街、伯力等城市建立新的东方或国际幼儿园，招收华人和朝鲜人的子女，^①便于华工抽身从事工作。

普及小学教育是苏联向世界展示建设成就的重要方面，故远东华人的小学教育工作一度受到重视，尽量为入学儿童提供便利。1931 年 10 月，伯力华工子弟小学开学，学生人数由 19 人增加至 35 人。增加学生甚多，与学校提供的较好待遇有关。该校免费提供教科书和文具，并酌量发放棉大衣、棉靴、套鞋等，还为家中困难的 9 名学生提供早餐。^②其他地方提供的待遇亦较优厚。1932 年，海参崴华工子弟小学发布招生广告，培养 7—14 岁年龄段的学生，入学儿童年龄须在 8—10 岁之间，携单位证明可随时入学，且伙食、服装、纸笔费用全免。^③

华人小学的师资是华人教育的关键。华人小学的老师既要懂中文、又要懂俄文，同时须具备科学知识——这样的人才在远东并不多。边疆区政府积极为华人小学教育提供辅助支持，推进师范教育。海参崴中国师范学校是为华人中小学培养师资的专门学校，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华人师范学校。^④该校的入读门槛并不高。1931 年 3 月的招生公告显示，凡具备浅近政治常识、四则算术、懂浅近的俄语、认识一千以上汉字的 15 至 25 岁之间“在苏联的中国公民的子弟”，凭地方党委和工会介绍信均可入学，入校后可以享受每月 40 卢布的津贴。^⑤该校本科生班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年招生 30 人，学制 3 年半；预科招生 60 人，学制 1 年，在校资金和物资补贴较丰。^⑥优越的学习条

① “远东边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少数民族部一九三〇年在中国劳动者中所做的工作和一九三一年应有的任务”，《工人之路》，1931 年 2 月 8 日第 3 页。

② “伯力华工子弟小学应有新的转变”，《工人之路》，1931 年 10 月 29 日第 3 页。

③ “海参崴华工子弟小学校招生广告”，《工人之路》，1932 年 9 月 14 日第 4 页。

④ “站在文化革命战线上加紧为培养师范干部而斗争”，《工人之路》，1931 年 11 月 9 日第 4 页。

⑤ “海参崴中国师范学校春季招生”，《工人之路》，1931 年 3 月 10 日第 4 页。

⑥ “海参崴国际中国师范大学招生”，《工人之路》，1932 年 7 月 28 日第 4 页。

件，毕业后的工作保障，以及归国后仍受认可的文凭，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学校生源。

在教育后勤保障方面，地方政府也颇为用心。对于教材和教辅材料，远东边疆区政府会根据华人学校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1931 年 8 月，远东边疆区教育厅发出通知，要求华人和朝鲜人小学将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详细列表报告国家联合出版部远东分部，以便制定 1931—1932 学年教科书的出版计划。^①前述伯力华工子弟学校仅有 9 名学生需要学校供给早餐，餐食因人数少而难以准备，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学生被安排至附近的东方工人食堂用餐。^②当时苏联所有的学校都要服务工业化建设，进行各种程度的职业化教育。华人小学亦有经常性、系统性参观工厂的制度设计，政府要求接待单位积极提供支持。^③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教育是远东和远东华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最终也要服务革命需求。在和平年代，暴力革命理论和方法已不占其重要比重，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工农业生产技术教学为主，兼授党史、历史等知识。位于伯力的远东共产主义大学（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高级农业学校”）中国部（又称中国系）成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专门培养华人政治工作干部，董必武和吴玉章曾先后担任主任。^④低一级的城市党校则往往建有中国部。1929 年，远东边疆区将海参崴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建立以中共早期工运领袖苏兆征命名的“苏联远东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简称“中国党校”，成为远东地区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华人政治干部的高级党校。^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的背景下，中国党校被称为“在苏联唯一的中国学校”。^⑥1933 年春，中国党校合并伯力远东边疆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更名为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 Повышенного

① “远东边疆各区教育厅及高丽、中国各高、初两小学校注意”，《工人之路》，1931 年 8 月 15 日第 4 页。

② “伯力华工子弟小学应有新的转变”，《工人之路》，1931 年 10 月 29 日第 3 页。

③ 华白：“教育职业化与中国小学”，《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10 日第 4 页。

④ 吴玉章：《履历书》，1937 年 10 月 19 日，См.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93.

⑤ 张锡畴：“难忘的往事——回忆林伯渠同志”，载中共临澧县委编：《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9 页。

⑥ “列宁学校学年工作的总结”，《工人之路》，1934 年 7 月 6 日第 2 页。

Типа)。5 月 2 日,在 1300 余人参加的新学校成立大会上,地方政府称这是远东“执行列宁民族政策又一个新的胜利。”^①1934 年,学校又将海参崴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中国部合并进来,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高级列宁学校实际是一所职业学校,分为 2 年制党建班、3 年制政教班、4 年制师范班,在校生人数在 300 人左右。该校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竞赛,1934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学校与各班和每名学生均签订了竞赛合同,并定期进行检查和总结。^②

政治性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教育的基础特征,这在远东华人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华人学习的知识通常都包含政治性,即使数学试题也常渗透着列宁、斯大林指示和工业化建设成就,令学生在不知不觉间时刻接受政治教育。在特殊时间点,远东华人还会接受专门的政治学习。1933 年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远东地区社会主义竞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高级列宁学校将推动华人政治教育列为工作重点,决定在 4 月开展突击月运动,大力开展校外工作,组织开办 4 个党夜校和 4 个短期政治学校,向华工传授政治知识。^③在海参崴西南岁子区,80%的工人被吸收到短期夜校和党训班,学习政治、军事,以及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等。^④

教育工作并非孤立进行,苏联视其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远东华人教育工作的边界大大拓宽。伯力中国夜校师范短期传习所不仅办扫盲班,还组织演剧组,强调“戏剧也是教育实际工作的一种”。^⑤当时,整个远东地区的华人剧院和演员均努力将中国传统戏剧改造成符合苏联价值观念的新剧,进而成为帮助华人树立新价值观念的有力工具。远东华人的文学创作、曲艺、舆论宣传均在进行革命化改造,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都构成了远东华人文化工作的有效组成部分。

① “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成立晚会”,《工人之路》,1933 年 5 月 26 日第 2 页。

② “海参崴中国学校准备迎接十月革命纪念节”,《工人之路》,1934 年 10 月 18 日第 2 页。

③ “高级列宁学校校外群众工作号召社会主义比赛”,《工人之路》,1933 年 4 月 20 日第 2 页。

④ “党校校外群众工作近况”,《工人之路》,1933 年 4 月 10 日第 2 页。

⑤ “伯力中国夜校师范短期传习所学生的号召”,《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2 页。

三、远东华人教育工作的成绩及其局限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华人教育工作。1931 年 7 月,远东政府总结东方民族(中国人和朝鲜人)教育工作三年半以来的成绩,并做出计划:建成小学 483 所,学生人数 16589 人,1931 年下半年计划增加 836 所小学,新增学生 30021 人;高级学校 10 所,学生人数 1403 人,计划在当年秋季学期增加 16 所学校,新增学生 1126 人;专门学校 2 所,学生 220 人,计划在当年秋季学期增加 5 所学校,新增学生 1520 人;党校 2 所,在校生 475 人。远东政府指出,扫盲工作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1929—1930 年,有 18000 人实现扫盲,1931—1932 年预计完成 98000 人的扫盲任务。远东的华人和朝鲜人数量大致相等,两个群体的受教育人员规模均较为可观。远东政府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奠定东方民族劳动者中的文化建设基础”。^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只有极少数华人有机会接受教育相比,远东华人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远东政府普遍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华人学校或班级,为华人提供学习机会。1931 年 1—2 月,苏城迅速建立起各种华人学校或班级,招收数百名华人学习:办有 3 个识字班,招收 50 人;1 个提高生产技术班,招收 15 人;1 个党宣传班,招(收)15 人;2 个少共政治班,招收 25 人;1 个初级政治班,招(收)18~20 人;创办 1 所党校,招收 18~20 人;以及 1 个东方工作人员研究班,招收 15 人。^②群众组织想方设法动员和吸引华人参加扫盲或送子弟入学,短时间内颇有成效。1931 年 3 月 18 日,斯巴斯克三道河子远东稻业场成立扫除文盲班,最初仅有 15 名华工入学,工会设法在班上组织了新剧组,每十天演出一次新剧,颇能吸引人,入读人数快速增加,4 月 1 日增至 20 人,十天后骤增至 40 人。^③也是在 1931 年,海参崴中国党校设置扫除文盲参谋部,动员所有在校学生参与,使 2000 名华工

① “远东边疆东方民族劳动者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段落”,《工人之路》,1931 年 7 月 13 日第 4 页。

② “苏城中国工人状况及为实行列宁民族政策的争斗”,《工人之路》,1931 年 2 月 18 日第 3 页。

③ “三道河子识字班的情形”,《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8 日第 4 页。

识字。^①

统计数字的变化,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可能意味着生活的巨大改变。不少远东华人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受纲常伦理压迫的女性,对比感更强。邹罗氏是当时的山东蓬莱县籍妇女,1921年,19岁的她随丈夫抵达海参崴。1930年,在苏联政府推动扫盲工作背景下,已经做工多年的邹罗氏到海参崴的“五一”俱乐部学习。1936年,她进入俱乐部的缝衣组,学会缝衣技术,并于次年参加苏联政治文化人员工作,政治地位同样得到提升。^②有些妇女有意识地用自己受教育前后的经历,参与当时流行的官方宣传叙事。张锦荣随同丈夫在“四站”斯大林农庄工作一年,每天“参加免费的学习”,过上家畜齐全、鸡鸭成群的富裕生活。在中国国内的生活相比较后,她认为,只有在苏联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③教育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小学教育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正向外溢影响。11岁的海参崴中国小学学生孙宝庆在家中与抽大烟的父亲作斗争,最终其父戒掉大烟,并努力工作,成为远东造船工人中“最优秀的突击队员”。^④

不过,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苏联华人教育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主要体现在统计数字和实际情况明显不符,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不足。从各地的报告来看,华人扫盲教育快速提升,受到各方面肯定和赞扬,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931年下半年,是扫盲工作的关键时段,黑河成立了13个华人扫除文盲班,经过积极宣传动员,共有238人报名,基本符合预期。但工作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经过调查统计发现,所有报名者中仅有60人经常上课,上课率仅为25.2%,其中粉条庄(15人报名)、船坞(20人报名)、晨光组合(22人报名)这3处实际上课人数竟然是0。^⑤不同于正规学校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缺课现象,但如此多的缺课情况,乃至于多处长时间无人上课,让人深感意外。此前伯力的情况揭示了问题出现的

① “海参崴二千中国工人已学会了识字”,《工人之路》,1931年9月21日第4页。

② 邹罗氏:“我的过去和现在”,《工人之路》,1937年3月8日第2页。

③ 张锦荣:“我过着富裕和文化生活”,《工人之路》,1937年3月8日第2页。

④ “海参崴中国小学的突击队”,《工人之路》,1933年9月24日第2页。

⑤ “扫除文盲班已经到处成立,应巩固经常上课的学生”,《工人之路》,1932年1月4日第4页。

原因。1930 年冬季，伯力组织了一些华人的中、俄文补习学校，入读开班率同样较低，扫盲成绩不佳，其原因是开班地点大多“过于偏僻”、缺乏教具、且教员常常缺课。^①无怪乎严寒天气下，华人不愿去教师极大概率旷工的偏远地方上课。次年秋，伯力全市已无华人识字夜校。^②20 世纪 30 年代，制约华人扫盲工作的教员、教室、教具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招生广告与实际情况差别甚大，甚至愈加严重。1937 年 2 月，苏城的二号煤矿开设了补习班，有 50 多名华工报名，但实际仅有 24 人参加学习，其余并未参加。其原因与先前其他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学习班郑重呼吁远东边疆区教育厅“赶快供给”必需的教材、汉文课本、粉墨、练习册等物品。^③

华人义务教育工作是实现远东边疆区少数民族扫盲工作的关键，尽管政府非常重视，但同样存在问题。1931 年，伯力中国小学共有 30 余名学生，根据年龄和基础分成 4 个班上课，但学校资源严重不敷使用，仅有 1 名教师和 1 个教室，任意一个班上课，其他三个班的学生则在旁边“吵嘴和嬉笑”，屡禁不止，成为学校教学情况的常态，造成“十二分的不便”。^④伯力华人小学教育出现问题的地方不止一处，起初曾想解决，但问题频频，又难以化解，于是，敷衍塞责、视而不见的情况随即出现。伯力华工子弟学校建校初期曾多受照顾，但后来多是搪塞，致使“学校一般的设备很少改善”，在本就缺乏的教室中，有一间在拨付时就处于被侵占状态，市教育厅和监察厅检查后方才腾退，但因缺材料房子未得修理，之后又被另一工人侵占，导致 40 多名学生没有合理分班。宿舍、食堂、游戏室、玩具、体育场等设施更是问题百出。^⑤伯力出现的问题，其实是远东华人小学教育的缩影。

远东华人积极自救，积极设法解决问题。1931 年 11 月，苏城 2 号矿井 20 余名华工联名通过报纸反映，他们报名参加的补习学校在开学 2 个月后因未落实校址，未上过一次课，他们呼吁在工人阶级的国家应该给工人提供

① 访：“伯力教育厅注意东方工人中的扫除文盲工作”，《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10 日第 4 页。

② “伯力没有一个中国工人识字夜校”，《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4 页。

③ “苏城消灭文盲工作还很少转变”，《工人之路》，193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④ “伯力中国小学校应有新的转变”，《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10 日第 4 页。

⑤ “对于伯力华工子弟学校的一点意见”，《工人之路》，1933 年 2 月 18 日第 3 页。

学习机会。^①这次呼吁可能没有传到当地政府部门，华工们没有收到回应，有些华人则选择直接向政府要求。1933 年 9 月，海参崴“五一”俱乐部召集全城中国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分析中国小学学生从 120 余人减少至 80 余人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教学资源匮乏，根本原因是政府支持不足，遂向城市教育厅提出保证教员供给、教学设施、按大纲教学等 5 项要求。^②作为民间社团，“五一”俱乐部提出的要求犹如石沉大海，中国小学存在的困难境况并未改观。之所以未有回应，与远东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多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远东的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假繁荣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普遍较高，远东工业生产的月度、年度报表常常出现完成度不高的情况，教育工作计划亦存在高目标的情况。一般而言，扫盲教育和普及教育需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势解决，但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远东政府将这两个目标合并，结果注定成为无法完成的目标。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党代会称，1933 年全区在校小学生总数为 24.7 万人，接近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共有教师 4000 人，生师比约为 62:1，基本达到要求。但是，在 4000 名教师中，43% 是工作不满 1 年的新任教员，缺乏工作经验；另外部分教师的经验也不充足，占总数 30% 的人仅有 1 到 3 年的教龄。也就是说，73% 的教员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才担任教职，共计 2920 人。这些人怎么走上教师岗位的呢？报告进一步揭示，他们当中有 59% 的人仅有初级教育学历，且多数人年龄在 15—17 岁之间，而其所教学生中不乏 18 岁的年轻人。^③小学毕业生担任小学教师的场景在远东较为常见。不难看出，远东多数小学教师是通过“拉壮丁”等形式拼凑而来，仅有表面上数字的合格，而无水平质量可言。

换言之，远东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他们的顺序中，俄罗斯族人遇到的问题被放在首位，然后才是其他族群。1931 年 7 月，远东边疆区约有 7000 名包含朝鲜人在内的东方木业工人，其中一半不识字，需要 46 名教员开展扫盲工作，但远东木业管理处只配备了 3 名。在分配文化工作人员时，

① “苏城中国请求给补习学校的地方”，《工人之路》，1931 年 11 月 9 日第 4 页。

② “海参崴中国小学校应夺取工作的新转变”，《工人之路》，1933 年 9 月 24 日第 2 页。

③ “联共边疆党部的报告”，《工人之路》，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4 页。

木业管理处仅将 15% 的人员用于东方工人，而 85% 用于仅占少数的俄罗斯族人。^①这其实是远东各单位的惯常做法。远东政府尽量将有限的资源投给问题不断的俄罗斯族人，解决华人教育的问题只能搁置。

在与东方民族交往时，俄罗斯族人往往表现得高傲自大，甚至有粗鲁的态度。一些远东地区的干部将华人教育视为政府教育工作的点缀，有时又认为是急于摆脱的负担。1931 年，使用单位早早地与边疆出版社中国分部签订了中文教材出版合同，到 9 月下旬开学已 3 周，远东华人学生普遍没有收到教科书。“小学教科书只出版了一本，党校教科书一本也没有出版，工业补习夜校用的书印出了两本。印刷局只执行了出版社计划的百分之十五还不到。”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教材书稿仅完成了 65%，仍有 35% 未交稿。^②出现这一问题，不是少数干部不负责，而是教科书出版发行系统本身并不重视，双城子的干部更是将对华人教育不重视的观念公开表达出来。1933 年 8 月 30 日，在远东中小学开学日前一天，双城子教育部门干部对记者明确表示：“明天不能开学”，因为上课教室才开始找，教员仍在招，仅数学课本已备好，“其余无着落”。记者感慨，双城子对于中国小学的“开学准备工作完全忘记了”。^③此后的一个月中，报社多次督促双城子中国小学尽快开学，但市教育部门一直以无教师、无教材搪塞，一位官员最终不耐烦地表示：“去年中国小学校弄了个乱七八糟，今年倒不如不组织的好！”^④情急之语往往是真情流露，像这样并没有将华人教育放在心上的远东干部应不是少数人。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仅靠俄罗斯族群及其干部做事风格拖沓烦琐来解释，不重视应是根本原因。这实际是一种民族歧视观念的现实投射，海参崴西南岁子食堂两任主任对中国工人极不友好，并数次驳回食堂工人于连水去劳动班上课的申请。^⑤

情感是一种双向的力量，当感受到不受重视与尊重时，华人的态度也在

① “三千五百个不识字的可能只有三个教员”，《工人之路》，1931 年 7 月 13 日第 4 页。

② “中文教科书应按时出版”，《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3 页。

③ “双城子教育厅忘记了中国小学校”，《工人之路》，1933 年 9 月 8 日第 3 页。

④ “双城子中国小学校没有开学”，《工人之路》，1933 年 9 月 30 日第 3 页。

⑤ “给与那些不让工人上学的官僚以严重的打击”，《工人之路》，1931 年 9 月 21 日第 4 页。

发生变化。去扫盲班读书地点的路偏远，其他学习条件无保障，到小学读书学习环境不佳，华人读书学习的意愿大受影响，故报了名不学习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不报名的情况。1933 年 8 月，鉴于上年招生数量并不理想，海参崴华工子弟学校登报敦促各工会、集体农庄干部、招生专员为招生工作提供“切实的帮助”，实现适龄学童“百分百的吸收到小学”。^①这种情况进而蔓延到高等教育。伯力开办无线电函授讲习班，招生公告播报两周后，竟无一人正式报名。华人报纸批评各地各部门不注意宣传。^②客观而言，华人对无线电函授这一新事物了解有限，讲习班又没有说清楚毕业证书有何用途和毕业后的待遇，这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其背后则是对政府的不信任。

苏联政府开展对远东华人的教育工作，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完成民族国家的整合是苏联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开展体系化的国民教育是其主要依托手段，这是远东大力推动华人教育工作的背景。华人群体具有非常的文化凝聚力，群体文化的传承性极为稳定。远东政府积极设法重构华人群体的文化和政治认同，以进步为旗帜推行汉语拉丁化运动，并在教育领域极力推动俄语教学。

华人小学的教员一般为华人，以汉语教学，开设汉语（母语）、俄语、数学等课程。不过，小学毕业之后，如果学生要继续读书，就需要进入普通的国民学校，也就是在俄语环境下读书。换言之，远东边疆区没有华人或华文中学。1931 年，远东边疆区教育厅针对华人制定了各等级学校招生计划，其中包括小学、师范学校等 8 类学校的招生计划，但就是没有中学的招生计划。^③1934 年，苏联统一学校的学制，规定小学（1—4 年级）、不完全中学（5—7 年级）、中学（8—10 年级）。^④即便如此，远东边疆区此后依然未建设华人的不完全中学或完全中学。究其原因，除远东边疆区需要完成苏联

① “海参崴华工子弟小学校招生广告”，《工人之路》，1933 年 8 月 20 日第 4 页。

② “无线电函授讲习班是培养广大干部人才的新方法”，《工人之路》，1931 年 11 月 13 日第 4 页。

③ 华白：“造就自己的下级干部”，《工人之路》，1931 年 6 月 13 日第 4 页。

④ 周建英：“苏联远东地区普通教育的发展”，《西伯利亚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77 页。

普及初级教育的任务外，还有更深的制度设计，这点在远东的华人高校中可以观察到。

作为一所华人高级学校，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最初使用汉语、俄语双语授课，后来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被大幅压缩。以该校 1937 年的教学计划为例，两年制党建班母语（汉语）总课时为 261 课时，是俄语 522 学时的一半；而“历史/现代史与苏联史”有 220 学时，“联共（布）党史与共产国际史”有 303 课时，两者合计是中国史 172 课时的 3 倍。^①三年制政教班和四年制师范班的汉语、中国历史课程与俄语、苏联史相关课程的比例差距也均在一比二以上。^②这其实不是简单的比例问题，华人子弟从小在苏联境内生活，所知中国知识并不多，甚至有些人只会说汉语而已，又因常与苏联人接触，俄语和苏联文化知识有一定基础，在中苏文化知识相差并不明显的情况下，远东边疆区政府有意识地让华人学生多学俄语和苏联历史，是在引导其通过学习无形中形成苏联共同体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远东报纸所描绘的华工生活幸福的事例中，往往是华人男性和俄罗斯女性结合而成的幸福家庭，这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

政治和文化认同是一种深层次思想和心灵交融，彼此尊重是情感基础，但很多远东的俄罗斯族人却难以做到。日常生活中，在面对华人时，远东的俄罗斯族人较为普遍地流露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称呼华人为“小国人”或“法赞”。远东政府认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只会强化“东方劳动者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因此坚决反对，^③并制定了打击“大俄罗斯主义”的法律，甚至通过公审公判、开除出党的方式严厉处罚。但是，这些法律基本没有被执行，徒具空文。^④许多干部私下里也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只

① “Типовой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2-х годови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Д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вышенного Типо”, РГИА ДВ. Ф.102. Оп.1. Д.93.

② “Типовой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3-х годовичного политик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Д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вышенного Типо”; “Типовой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4-х годович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Д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вышенного Типо”, РГИА ДВ. Ф.102. Оп.1. Д.93.

③ “远东边疆中国工人研究社工作指令”，《工人之路》，1931 年 4 月 26 日第 2 页。

④ Залесская О. 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58-1938гг.) ГОУ ВП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9. С.262.

看重华人提供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思想上却极度不信任，有极强的疑虑和防范心，并不认可华人在远东的合法性。当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心理平衡被打破时，这种情绪会不受控制地表现出来。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东北亚战云密布，苏联政治高压加强，远东开始收紧对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并加大对华人工商业的打击力度。在“肃反”名义下，10 多万华人被安上莫须有的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日本特务等罪名，惨遭驱逐甚至杀害，华人教育工作不复存在。1937 年 1 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联华侨锐减至 38527 人，^①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远东地区已经没有华人。^②朝鲜族居民的境遇亦是如此，1937 年 8 月，苏联政府要求采用强力手段，在 3 个月内将朝鲜居民全部迁出远东边疆区。^③

四、结 语

20 世纪 30 年代，为解决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发远东所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苏联政府在征调欧俄地区人口东迁而不得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华人参与远东开发，并努力通过扫盲教育和普及小学教育等手段，掌握、改造华人。但是，在数目字管理的要求下，远东华人教育工作往往只追求字面达标，未考虑现实条件，导致诸多扫盲班和中国小学徒有其名。这种勉强敷衍的态度，折射出远东政府对华人的轻视，到后来流露出华人教育工作是累赘的埋怨，本质上是其大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在东北亚战云密布之时，远东政府对华人的疑虑和敌视情绪迅速滋长，直至将其驱逐甚至屠杀。这种心理长久伴随着远东政府，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远东开发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对于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沙俄帝国或苏联来说，进行民族国家整合是重要的任务，教育是其重要手段。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推动俄国有史以来

① [俄]A·拉林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阎国栋译，《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2 页。

② 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89-293 页。

③ “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决议”，1937 年 8 月 21 日，载沈志华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64 页。

最大规模的扫盲和普及教育运动，远东少数民族群是重要目标人群，旨在塑造其文化观念和政治认同。教育需要付出长久努力和持续不断的投入，远东政府无法快速完成目标，也缺乏耐心和恒心。靠数百年征服积攒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令苏联和远东地方政府更信奉暴力的力量，远东华人因此成为历史的过客。但是，苏联难以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所有少数民族群，因而其民族国家整合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Abstract】 In the 1930s, the Soviet Far East, in order to meet the labor demands of the Five-Year Plans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nce adopted relatively friendly policies toward the Chinese population, granting them full rights to education. In line with the Soviet campaigns for literacy and universal primary schooling, the Far Eastern authorities organized literacy classes and night schools, established numerous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cross the region, and promote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arty school education, aiming to simultaneously mobilize Chinese lab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o reshape their ideology. However, overly ambitious goals combined with limited resources created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statistical report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Much of the “progress” existed only on paper, as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eachers, faciliti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education remained unresolved for years. Influenced by Great Russian nationalism,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toward the Chinese persisted among local authorities. As a result, what began as an urgent policy initiative quickly came to be regarded as a burden, and the first government-led educational movement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world history ended in failure.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Soviet Far East during the 1930s reveals the deeper dilemmas facing Soviet efforts in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 multinational state.

【Key Words】 the Soviet Far East, Chinese Education, Soviet Educational Stud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30-е годы,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рабочей силой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ятилеток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ие власт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на определённом этапе проводили политику благоприятствова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китайским мигранта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я им полноценный доступ к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и и всеобщем началь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вла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открыли школы обучения грамоте, вечерние школы и т. д., создал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начальные школы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по всему региону, а такж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развитию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партий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Эти меры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как на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так и 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их сознания. Однако несоразмерность между завыш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привела к глубокому расхождению между отчёт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ой и ре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заявлен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лишь на бумаге, тогда как дефицит учителей, помещений и учеб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для обучения, годами оставался нерешённым.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ла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охраняли глубокую настороженность и враждебность к китайским мигрантам. Изначально принятая как экстренная мера, первая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кампания сред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вскоре была воспринята властям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ак обуза и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неудаче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30-е годы выявил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задачами освоения региона 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вет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责任编辑 李坤璘)

远东中国剧院与革命叙事传播机制研究*

李 杰**

【内容提要】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活跃于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剧院，作为革命与政治宣传的重要平台，在苏联文化体制的支持下，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导向的宣传机制。本文在梳理其发展历程、制度嵌入方式与政治功能转型的基础上，聚焦其是如何通过剧目创作与剧本批评构建并进行“革命叙事”的传播的。文章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地的档案资料与《工人之路》报刊为核心史料，选取《死里逃生》《满洲农民》等代表性剧目及相关评论文本，分析剧院如何借助舞台实践与评论机制宣传并强化革命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远东中国剧院的跨境传播职能和影响。研究表明，远东中国剧院在党政宣传机构与剧目管理机制的联动下，构建起以政治导向为核心的剧场传播体系；其通过典型情节设计与评论话语引导，将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政治情感，使工人观众在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革命立场的认同建构。

【关键词】远东中国剧院 革命戏剧 革命宣传 社会主义文化宣传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180(21)

远东中国剧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当时，这些剧院主要由民间自发组织，服务于华人移民社区，以传统戏曲为主，具有民间自治和营利性质。20 世纪 20 年代，苏维埃政权在远东地区逐渐建立起来，当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27）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俄乌冲突对中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KYCX24_035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东南大学陶源教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 李杰，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地面向华人群体开设的中国剧院，逐步成为传播语言、塑造阶级意识以及开展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表演形式，远东中国剧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承担起了文化启蒙与政治动员的双重功能。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苏联中国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第一，探讨苏联对中国戏剧制度与表演体系的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援华实践。如李贤年分析了苏联戏剧专家在新中国话剧表演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指出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输入对中国表演教学制度具有深远影响。^①胡星亮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批评苏联“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当代戏剧造成的束缚与误导。^②第二，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分析中苏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与影响。庄宇从跨国文化交流视角出发，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过程，强调了中国文化在苏联社会的影响力。^③尽管已有研究在宏观层面描绘了中苏戏剧互动的总体格局，但对苏联境内专门面向华人群体、服务政治宣传目的的中国剧场组织，关注仍显不足。扎列斯卡娅（О. В. Залеская）虽简要提及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剧院，但其研究重心集中于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对华战略，并未涉及地方剧院的文化逻辑与制度实践，且叙事受限于既有的政治框架，难以客观呈现远东中国剧院的历史作用。^④科罗廖娃（В. А. Королева）立足城市空间研究，分析了中国传统剧院在远东城市的建筑格局及其在华人社区的社会功能，但未论及剧院的政治转型。^⑤赵慧青关注了远东中国剧院的宣传属性，主要论述了其组织背景，但未延伸至剧目生产、评论机制，以及与观众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对远东中国剧院在地区历史中的

① 李贤年：“苏联援华戏剧专家与中国话剧导演表演人才培养体系”，《美育学刊》，2023年第6期，第96-101页。

② 胡星亮：“论苏联戏剧左倾教条与中国当代戏剧”，《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第63-69页。

③ 庄宇：“1950年代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俄罗斯文艺》，2019年第3期，第33-42页。

④ Залеская О. 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58-1938 г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 С.340-355.

⑤ Королева В. 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атр и его роль в жизн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1935 г.) // Грамота. 2015. №.60. С.115-121.

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认识仍较为有限。^①

本文所称“远东中国剧院”，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在苏联远东地区（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由地方工会、宣传机关或民族事务部门出资主办、以华人劳工与青年为主要观众、以宣传革命理念为目标的中文剧场组织。该剧院嵌入苏联文化管理体系，在制度支持下承担宣传任务，并在剧目内容与舞台表达中强调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跨国革命话语的重要载体，这些剧院的活动为理解苏联远东地区华人文化空间的构建，以及革命传播与文化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上述界定，本文拟系统分析远东中国剧院在苏联文化体制与政治宣传体系中的制度性嵌入，梳理远东中国剧院与地方党组织、工会、宣传机关和《工人之路》报社之间的协同关系，探讨其是如何由民间文艺团体转型为社会主义宣传机构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远东中国剧院剧目创作与剧本批评等核心环节是如何协同构建具象化的革命叙事的。研究主要依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档案馆（ГАПК）、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РГИА ДВ）、俄罗斯国立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ГАХК）等机构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远东中国剧院的档案资料，以及《工人之路》等报刊文献，围绕《死里逃生》《满洲农民》^②等有代表性的剧目及其评论文本展开分析，揭示远东中国剧院如何借助舞台与舆论平台，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绪表达与意识形态符号。

一、远东中国剧院的制度化嵌入与政治功能转型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体制转型路径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远东地区的中国剧院多为私人所有，作为民间文化娱乐的场所，这些剧院以传统戏曲为主，服务本地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

① Чжао Хуэйцин.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жизнь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1920-1930-е год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 С.188-223.

② 这部作品所述“满洲”指的是当时的中国东北。

具有明显的民间自治性质和营利目的。此阶段的剧院缺乏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导，其内容和组织方式主要反映侨民社区的自发文化需求。

20 世纪 20 年代，苏维埃政权在远东地区逐渐建立起来。当时在远东共有六家中国剧院，其中两家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余四家分别分布在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和斯帕斯克。^①这些剧院是华人工人阶层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虽然剧院数量不算少，且吸引了大量中国工人作为观众，但其经营仍以私营为主，并未纳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也未以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加以规范。传统剧目的保守性和管理上的松散状态限制了剧院功能的进一步发挥。1927 年，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党组织远东地区委员会扩大会首次将中国剧院明确定位为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并建议人民教育部门应“特别关注中国剧院的活动”。^②这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开始有意识地介入和改造这些民间文化组织，推动其向政治宣传工具转型。然而，由于缺少系统的监督和联共（布）的指导，远东中国剧院的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

随后，1928 年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宣传鼓动部^③召开的中国工作专题会议指出，远东中国剧院存在党的领导缺失、管理纪律松弛、剧目缺乏革命性、财务制度不透明等方面的不足。^④这些批评不仅揭示了剧院体制化进程中的瓶颈，也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对民间文化领域更严格管理的要求。1929 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政府加强了对远东中国文化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远东中国剧院在此背景下被进一步纳入苏联国有体制，地方党委开始主导剧院干部任命与剧目管理，标志着远东中国剧院实现了从民间组织向苏维埃体制文化机构的关键性转型。

然而，剧院国有化并未立刻解决诸多难题。财政紧张、演员短缺、剧目更新滞后等问题仍制约着剧院的有效运作。^⑤对此，远东中国剧院负责人基

① Чжао Хуэйцин.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жизнь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1920-1930-е год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 С.188-223.

② ГАХК. Ф.П-2. Оп.1. Д.45. Л.202.

③ “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是联共（布）在远东地区的地方党委下属的机构，承担苏联远东边疆区的宣传鼓动职责。

④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96. Л.5.

⑤ ГАХК. Ф.П-2. Оп.9. Д.75. Л.1.

留琴科（Н. З. Кирюченко）提出，建议从苏联在校时参加过戏剧社活动的远东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新演员，^①并建立专门的中国剧院培训班，计划招收 30 名学员，其中包括 10 名女性和 20 名男性，主要来自中国中等师范学校（Китай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техникум）、工农技校中国部（Китай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рабфака）以及远东中国苏维埃党校（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крае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овпартшкола），预算为 6.55 万卢布。^②这一培训机制最终促成了青年工人戏剧社（Театр рабочей молодежи, ТРАМ）^③的建立，成为体制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人才短缺，也体现出体制从被动接管向主动建制化转型的战略调整。1931 年，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民族事务负责人（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й по делам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при президиуме ДКИК）进一步推动了青年工人戏剧社与地方剧院统一人才培养和演出体制的发展，^④标志着中国剧院体制向规范化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尽管远东中国剧院的体制化进程在组织整合与政策引导下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其发展仍受到文化融合、资源配置与人才支持的多重制约。首先，传统戏曲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艺术理念与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剧目创作面临适应与转化的挑战；第二，剧院虽获得一定财政补助，但整体经费仍显不足；第三，专业演职人员的培养体系也未能同步建立，制约了剧院的持续发展能力。^⑤自 1934 年起，青年工人戏剧社与传统剧院开展合作，尝试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⑥推动剧院向融合民族特色与苏维埃国家文化政策方向演进，逐步形成制度化文化表达的初步样态。但 1937 年后，随着整体政策环境的收紧，远东中国剧院被关闭，青年工人戏剧社亦遭解散，相关体制化探索由此中断，剧院制度建设陷入长期停滞。

远东中国剧院的体制转型，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逐步过渡到制度化管理、并在政策环境趋严背景下发生调整的演变过程。各阶段的发展轨迹不仅

① ГАХК. Ф.П-2. Оп.9. Д.75. Л.2.

② РГИА ДВ. Ф.Р-2413. Оп.4. Д.1744. Лл.219-220.

③ 关于“青年工人戏剧社”的表述，参见《工人之路》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4 页。

④ РГИА ДВ. Ф.Р-2413. Оп.4. Д.1744. Л.105.

⑤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67. Лл.2-3.

⑥ Эми Сяо во время своего посещен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оказал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китайскому театру – он обратился с призывом к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города писать пьесы для театр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звезда. 27 мая 1934 г.

展现了苏维埃体制下对华人文化空间的制度整合路径，也揭示出文化机构在制度嵌入过程中所面临的政策取向与文化延续之间的协调难题。

（二）政治宣传职能的嵌入与功能扩展

远东中国剧院作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重要文化机构，深度嵌入苏联党政体系，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前沿阵地。剧院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严格服从联共（布）的党政领导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化机构“工具化”的政治逻辑。联共（布）中央远东地区委员会^①及其宣传部门^②直接负责剧院的政治指导与监督，制定总体宣传方针，严格管理剧目的内容，确保文化产品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要求。作为执行层级，各有关市委的宣传部门^③是剧院宣传工作的直接领导机关，具体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审核剧本与演出内容，强化对剧院的政治控制，确保党的宣传策略有效落实。

在内部管理上，剧院实行行政体系与联共（布）政治指导机制相结合的运行模式。院长和主任虽名义上负责剧院的日常运作与演出安排，但他们所履行的职能完全受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与指导，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宣传政策，将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具体化为剧本创作与舞台实践。剧院内部设有党代表，地区党委也会派遣政治检查员参与剧院工作，监督思想动态和政治纪律，确保演出内容与宣传方向始终符合党的路线。^④剧目选择须经过严格的政治管理，如《冯沃亭》《满洲事件》《太平天国起义》等，均为服务于联共（布）与中共双重宣传目的的革命戏剧。^⑤凡未能体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等主题，或未突出苏联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作用的剧目，往往会被批评或取消。如《上海滩》因“模糊历史人物的背叛史实”而被取消演出，《干涉》因“未充分突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作用”而遭否定，^⑥凸显出政治标准对艺术创作所施加的强大指导力。

演员作为政治宣传的直接承担者，其政治背景与思想表现受到严格指导

①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 Л.3.

② ГАПК. Ф.П-1190. Оп.1. Д.6. Л.51.

③ 海参崴市党部检查队：“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加紧改造中国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机关——中国戏园”，《工人之路》，1933年4月24日第3页。

④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 Л.13, Л.26.

⑤ Там же, Л.26.

⑥ ГАПК. Ф.П-1190. Оп.1. Д.6. Лл.51-54.

与持续关注。剧院要求演员定期参加政治学习与思想教育，同时通过生活作风考察，强化其政治立场与纪律意识。联共（布）中央发送给远东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委书记的文件指出，剧院因党团组织“极其薄弱”受到批评：51 名演员中仅 17 人具苏联国籍，其余持中国护照，另有 12 人存在吸食鸦片问题，联共（布）中央认为，此类问题将损害剧院的政治纯洁性与宣传效果。^①针对上述问题，剧院着力提升演员的政治觉悟与表演表现力，强调其“政治宣传员”的职能定位。^②为加强对华人群体的政治动员与组织建设，苏联有关部门要求剧团在思想层面进行审查与规范，引导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并鼓励中国籍演员申请加入苏联国籍，以推动政治认同与融合。^③

远东中国剧院还积极承担了对外革命宣传的任务，是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跨国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剧院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海外组织保持了密切联系，共同推动了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工作。中共驻远东代表张锡传^④曾受苏方委托，参与剧院政治事务协调，除协助组织文化演出外，还在新剧上演后主持剧院与演员积极分子会议，围绕剧目内容开展批评与工作改进的讨论，增强其政治教育功能。苏方还要求张锡传选派 10 名党团员骨干，协助剧院党小组开展群众工作，改善剧院与观众群体的联系与互动。^⑤

为扩大宣传覆盖，剧院还组织大量跨地区巡演，除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本地演出外，还深入工厂、矿区及边境地区，向当地的华人群体进行革命宣传。^⑥这些活动既服务于苏联地方党委的工人宣传工作，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拓展群众基础的海外策略，使远东中国剧院在中苏两党政

①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 Л.10, Л.27.

② ГАХК. Ф.П-2. Оп.9. Д.75. Л.2.

③ ГАПК. Ф.П-1190. Оп.1. Д.6. Л.53.

④ 张锡传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代表，曾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中国部主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校长。1948 年 2 月，张锡传回到中国。此后，历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第一副校长、东北财经委员会中属中长铁路沈阳办事处处长。1949 年 11 月，张锡传调任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副局长兼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校长，还负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工作。

⑤ ГАПК. Ф.П-1190. Оп.1. Д.6. Л.52.

⑥ Чжао Хуэйцин.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жизнь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1920-1930-е год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 С.188-223.

治合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尽管远东中国剧院在体制设计上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宣传职能，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与挑战。第一，在思想宣传方面，剧院被联共相关文件批评，认为其宣传工作极其薄弱，学习活动流于形式，思想引导作用难以落实，导致意识形态贯彻过程中普遍存在“动力不足、执行力差”的问题。^①第二，在人员构成与政治管理方面，剧院以中国籍演员为主，政治背景复杂，联共（布）组织难以实现有效覆盖和统一引导。联共检查员更指出，剧院内部“吸食鸦片现象严重”，^②威胁到政治纪律建设与对外形象塑造。演职人员政治素质参差不齐，使宣传工作难以深入推进。第三，在物质条件层面，剧院长期面临经费短缺、设备老化、道具服装匮乏等问题，直接影响演出质量与传播效果。巡演报告多次提到，基层演出中因缺乏基本布景与灯光设备，剧目感染力难以发挥。^③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出文化宣传机构在实践中面临的制度约束与资源瓶颈，也揭示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政治任务与现实条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总之，远东中国剧院依托完善的组织架构和政治指导，融入苏联党政宣传体系，承担意识形态传播与革命宣传的核心职责。其政治宣传职能不仅体现在剧目内容与演员管理上，更通过制度化的党政指导与协调机制得以加强和拓展，体现了文化机构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发展。

（三）从剧场到纸媒：远东中国剧院的跨平台宣传路径

在远东地区的革命宣传体系中，远东中国剧院不仅是无产阶级戏剧创作与演出的核心机构，还通过与《工人之路》报社的深度合作，构建起联合剧场与纸媒的宣传网络。双方在物质资源、文化内容和意识形态表达等层面进行互补和协同，使戏剧与报纸共同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平台。

作为革命报刊，《工人之路》定期刊载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评论与文章，在拓展观众群体、塑造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它还承担了剧目翻译与批评的功能，通过调整剧本语言风格与表现形式，提升了剧目的社会接受度与传播效果。更为关键的是，报社利用自身平台动员社会舆论，号

①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Л. 9.

② Там же, Л.27.

③ Там же, Л.13, Л.36.

召公众支持革命剧院发展，例如鼓励工人群众参与剧本创作与演出，并通过购买公债、捐款等方式支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①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国剧院需定期向《工人之路》报社提交工作进展报告，确保宣传工作的透明度与可持续性。剧院在推动剧目销售的同时，也承担起推广报纸发行的任务，形成了宣传资源的互利共享。尤其在剧院到苏联各地巡演（包括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新西伯利亚、第比利斯、巴库等城市）期间，报社的宣传极大地提升了剧目的社会影响力。以青年工人戏剧社为例，在该社到边疆地区演出《红色矿工》《满洲农民》等剧目期间，《工人之路》进行了连续的专题报道，有效推动了革命理念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传播。与此同时，剧院还组织开设中文与俄文补习班，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对革命思想的理解力与认同感。^②

双方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体现在严格的契约执行机制上。若出现违约行为，报社会将其记录公开，以确保合作过程始终遵循政治宣传的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剧院进一步通过设立剧本征集奖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创作贴近现实、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戏剧作品。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剧本通过内容评审者可获得高额奖金，如一等奖可达八百元，革命主题剧本二等奖奖金则为六百元。^③这一激励机制不仅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也提升了剧本的政治性与文化适应性。

此外，剧院还设有墙报组，每月出版墙报，持续向群众传播革命理念，并逐步实现剧目内容由传统封建题材向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转型。^④这一文化内容的再生产过程，强化了剧院作为政治宣传平台的功能定位，为工人阶级和更广泛的民众提供了更加契合无产阶级革命价值观的文化产品。

远东中国剧院与《工人之路》报社之间构建起的跨平台宣传机制，不仅整合了戏剧与报刊的传播优势，也为革命叙事的社会化表达提供了路径支撑。在这一协同体系下，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更加具象、系统，为文化改造

①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 Л.13, Л.36.

② 基留琴科：“《工人之路》报社与海参崴中国剧院订的条约”，《工人之路》，1932年3月30日第4页。基留琴科当时兼任海参崴中国戏园与青年工人戏剧社的负责人。

③ 海参崴中国戏园艺术苏维埃戏剧委员会：“征求剧本”，《工人之路》，1933年4月8日第2页。

④ “海参崴中国戏园转变中的成绩”，《工人之路》，1933年2月28日第4页。

与政治动员积累了宝贵经验，展现了多平台宣传机制高度的组织能力与策略运作水平。

二、远东中国剧院的革命叙事：剧目实践与剧本批评

远东中国剧院之所以被赋予如此关键的宣传功能，与远东地区华人社会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由于识字率不高，戏剧成为比文字宣传更为直观和高效的传播媒介。剧院定期组织外出演出，深入工厂、矿山等生产一线，将舞台搬到工人身边。这种“送戏下厂”的做法，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时空限制，使剧场成为革命宣传的前沿阵地，强化了戏剧在政治动员中的实用性与即时性。为确保戏剧内容紧贴革命主旋律，剧目创作与改编完全服务于政治需求。传统戏曲中存在的封建意识、个人英雄主义或宗法伦理被视为必须清除的“残余因素”。剧院在属地党的市委宣传部门的指导下，对已有剧目进行严格的政治化改编，如将《死里逃生》重新演绎为工农群众觉醒、反抗旧政权压迫的故事。^①改编不仅改变情节结构，更重构人物立场，强化阶级对抗与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将艺术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剧院还承担着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任务。剧院内部建立了定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对剧本内容和演员表现进行政治层面的审视与纠正。^②党的宣传部门定期组织内容审阅，对剧目进行“艺术与政治双重标准”的评估。某些剧目因“不符合阶级斗争逻辑”或“含有资产阶级倾向”而被批判甚至取消上演，^③进一步体现出戏剧创作被严密纳入意识形态监管体系之中。

《死里逃生》与《满洲农民》两部剧作作为远东中国剧院革命文艺实践中“苦难-觉醒-反抗”的典型代表，分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戏园和青年工人戏剧社编排演出。这两部剧自1933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多次上演，并被《工人之路》刊载，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在工农阶级中激发了广泛的革命情感和社会认同。两部剧作不仅展示了革命文化如何通过

① 海参崴市党部检查队：“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加紧改造中国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机关——中国戏园”，《工人之路》，1933年4月24日第3页。

② ГАПК. Ф.П-1190. Оп.1. Д.6. Лл.51-52.

③ ГАХК. Ф.П-2. Оп.11. Д.188. Лл.10.

戏剧形式渗透到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反映了剧院如何通过艺术作品推动政治动员和文化启蒙。下文以《死里逃生》与《满洲农民》为例，具体分析剧本中革命叙事的构建，并围绕剧本批评展开对革命剧本的深层解构。

（一）政治叙事的剧场实践：以《死里逃生》与《满洲农民》为例

作为远东中国剧院革命文艺实践的典型代表，《死里逃生》^①和《满洲农民》^②均沿袭“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脉络，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紧凑的情节设计，提供了多元化的情感动员模式。这两部剧在剧情构造、角色塑造和舞台呈现上各具特色。本节将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首先，通过还原两剧的主要叙事与人物设置，勾勒其政治叙事的基本构型；第二，从表现策略与受众适配性入手，揭示剧作在传播实践中的异同；第三，结合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探索剧作在构建革命情感与引发集体认同方面的内在逻辑。

《死里逃生》这部剧以主人公张文起一家四口的命运为核心线索，在他們与军阀、地主等旧势力的冲突过程中，揭示了底层农民在多重压迫下的觉醒过程。剧中，张文起是一位贫苦农民，长期受军阀苛税与自然灾害所困。在开篇，他与妻子张崔氏在破屋中忧心如焚地盘算着债务与孩子的未来，一纸债契将女儿张秀云的命运送入地主冯人恨之手。儿子张奎则被军队强征入伍，最终艰难逃脱。家庭濒临瓦解的过程并非简单的苦情叙述，而是为剧中“觉醒-反抗”阶段埋下情绪伏笔。

随着剧情深入，张文起目睹家庭破碎，内心的愤怒逐步转化为反抗意志。尤其是在他得知女儿受辱、儿子做了逃兵返家后，愤然喊出：“我们就算死，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受这屈辱。”这句台词不仅是人物情绪的顶点，也成为阶级意识觉醒的象征。在舞台呈现上，张文起站在舞台中央，灯光聚焦，背后锣鼓渐响，赋予这句台词以仪式化与革命化的表达。

张文起之女张秀云这一角色，表现出女性在极端困境中的觉醒力量。她虽被卖入地主家，遭受压迫与凌辱，却从未屈服。在一场独白中，她低语：“我要逃出去，哪怕拼尽全力。”灯光黯淡，只见她紧握双拳，眼神坚毅，这种静默中的情绪爆发，成为革命精神在女性角色身上的具体化。

① 剧目全文参见《工人之路》，1933 年 2 月 24 日、26 日、28 日，3 月 26 日，4 月 4 日、6 日各期。

② 剧目全文参见《工人之路》，1933 年 6 月 24 日，8 月 12 日、14 日、20 日各期。

张文起之子张奎的觉醒则更具组织化特征。他从战场逃脱后，看着破败的家园与憔悴的父母，愤然发出“咱们要反抗！”的呼声。这一瞬间，不再是孤立个体的挣扎，而是阶级群体反抗的象征。他的觉悟也在剧中推动着剧情迈向革命高潮。

《满洲农民》也沿袭“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脉络，“家庭悲剧”包含了更激烈的政治化表达，强化了革命文艺中以苦难为媒介、以觉醒为转折的阶级认同建构路径。剧作开篇通过李成方和张雨生在田地中劳作时被地主陈大心羞辱、逐出家门的冲突，映射出当时“官家与地主联合剥削穷人”的社会现实，更通过李成方哀求“可怜可怜我们吧！”等台词，铺垫出深沉的阶级对立情绪。

随着剧情发展，李成方女儿秋香被“作为抵押”强行带走、幼子三儿惨死，剧作通过对李成方家庭被撕裂的悲剧性演绎，激发观众在情感上完成从“同情”向“愤怒”的转化，这也是家庭悲剧转化为政治行动的逻辑起点。在这一过程中，李成方高喊“为了工农群众的自由，不惜牺牲最后一滴血”，成为整部剧的情感顶点，也标志着其由“受害者”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

与《死里逃生》相较，《满洲农民》的反抗更具组织性与象征性，更侧重集体情绪的激发与组织化表达，通过塑造游击队的英雄形象，并结合具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强化其政治动员功能。剧中游击队员韩广玉与张健生代表着工农革命力量，频繁使用如“工农群众的怒火”、“帝国主义的大炮挡不住”之类的口号，使得剧场成为政治启蒙的空间。《死里逃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描绘与个体角色的心理变化，剧作通过张秀云、张奎等人物的觉醒过程，表现出革命意识在个体身上的生成轨迹。

从受众视角看，《死里逃生》偏重家庭伦理与情感递进，更契合社团或家庭观众等熟人社会的场合，通过亲情共鸣引发对革命理念的认同；而《满洲农民》则以紧凑的节奏和强烈的情绪冲击，更适宜在工厂、矿区等陌生人社会中演出，以高强度的政治情节直接激发行动动员。尽管两部剧在表现手法和受众定位上各有侧重，但其核心逻辑和政治传播目标却高度一致，即共同践行远东中国剧院“以情动人、以情启志”的传播策略，将革命理想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可触可感、易于接受并能激起行动响应的日常政治情感。

两部戏剧所体现的“牺牲逻辑”也与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艺术与苦难之间的内在关联相契合。阿多诺认为，真正具有批判性的艺术在于揭示自身“作为社会创伤的存在以及它们自主形式的社会发酵”^①，“通过对社会灾难现实的再现与见证，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实现了对自身的外化”^②。《死里逃生》和《满洲农民》都毫不回避历史创伤的呈现，通过再现社会压迫与个体痛楚，激发观众的深入反思与意识觉醒。前者通过沉稳铺陈的家庭悲剧唤起观众的道德共鸣，并在情感递进中引入阶级分析，形成深刻的思想渗透；后者则借助强烈的剧情冲突和象征性极强的舞台动作（如撕旗、举枪、泪喊等），构建出一种既有情感冲击、又有认知唤起的美学张力。尽管两剧在叙事路径与表达风格上一静一动，一隐一显，但却共同完成了从个体苦难到集体抗争的情感转化与政治认同构建，使观众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完成“从被压迫者到革命者”的角色认同。

（二）剧本批评：政治叙事的深层解构

革命新剧的创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地批评、试演与调整中逐步完善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远东中国剧院高度政治化的特征，更显现出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正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学校、教会与文艺等文化装置不仅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更通过制度化的日常仪式与实践行为，在重复中塑造个体成为特定社会结构下的主体”^③。剧本批评机制正是这一过程在剧场空间中的制度化体现，它将政治规范、美学表现与群众接受融合在一起，构成革命文艺内部自我调节与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在这一过程中，剧作家的使命不仅在于编织故事，更在于确保政治理念的精准传达与艺术形式的有效传播。有评论在分析新编京剧《时事新剧》时指出，该剧虽成功揭示了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革命的主题，但在描绘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时显得过于统一化，未能展现出历史真实中的多重矛

①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R. Hullot-Kentor Tran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42.

② 赵雪梅：“艺术作为启蒙、见证与救赎——阿多诺美学理论重审”，《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③ L.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127-186.

盾，削弱了剧本的历史质感。此外，该剧过度依赖唱腔，布景与道具方面缺乏创新，影响了观众的沉浸体验；在接受批评后，剧院组织反复修订，既提高了剧本的表现力，也使之更契合政治宣传的目标。^①这种“批评-调整-再演出”的循环机制，体现了革命戏剧在政治叙事中的实践逻辑。

《工人之路》报刊详细记录了关于《太平天国》《中国发吼》《满洲渔民》三部革命题材剧目的系统性批评，体现了从政治准确性、艺术感染力到群众接受度的全维度反馈机制。首先，《太平天国》在初演后即获得苏联远东地区文化工作者莎莉^②的高度评价，认为该剧成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再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深刻揭示了阶级关系与革命情感，同时借助西皮等传统唱腔，传达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与反抗意识，在反映人民反抗外侮和清廷腐败方面引发强烈情绪共鸣。^③在积极反馈的基础上，剧院通过更具系统性的批评推动剧作深化。音乐方面，批评者建议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加入钢琴等西洋乐器、减少锣鼓声以增强时代感；表演方面，针对主角在冲突场景中情绪表达不够饱满的问题，提出加强演员对革命内涵的理解与情感层次的训练；传播策略方面，建议向观众发放中俄双语说明书，以辅助理解剧情，提升宣传效果。此外，还对演员表现进行了个体化评价：如陈宝庆能准确把握观众心理，单玉兰在悲剧场景中的表现展现出较高潜力。同时指出，英军暴行、三元里暴动等关键场景的情绪张力不足，农民愤怒的表达尚未到位，需在剧本与表演协作上加以强化。^④通过这一系列反馈与调整，《太平天国》的政治理念表达与艺术感染力逐步实现融合，不仅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线，更在宣传革命理念中起到了情感动员的重要作用。

《中国发吼》是聚焦中国社会变革与劳动阶层觉醒的革命主题，但在多项批评的观照下，暴露出表达粗疏与表演细节不足的问题。^⑤语言方面，批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是宣传和拥护党总路线的武器”，《工人之路》，1932年4月12日第4页。

② “莎莉”具体身份暂不可考，推测为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苏联远东的左翼文艺评论者，其发表在《工人之路》的评论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文艺立场。

③ 莎莉：“关于新编《太平天国》戏剧第一本《鸦片战争》的意见”，《工人之路》，1935年1月16日第2页。

④ 同上。

⑤ “戏剧批评：《中国发吼》”，《工人之路》，1935年6月22日第2页。

评者指出台词过于简化社会矛盾，部分措辞（如“黄皮猪”）可能引发误解，未能准确传达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生活化细节方面亦存在不足，例如县长向舰长请罪时未摘帽、大学生讲话时手持扇子等行为不合情理，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此外，演员在声音和动作上的表现也被质疑：发音不清晰、动作不自然，影响了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与情绪共鸣。虽然陈宝庆饰演的船夫获得正面肯定，其表演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但整体表演仍缺乏自然度与层次感，需在表达方式上进一步打磨。在具体场景方面，诸如县长与船夫的对话未能表达出狐假虎威的气质，哈雷与大副踢皮球的动作也未具情感指向性，建议加强场景设计与人物行为之间的契合度。^①批评者强调，“艺术应让广大劳动群众理解并喜爱”^②，这不仅是一种观众导向的要求，更体现出革命文艺以政治传播为核心的功能诉求。《中国发吼》的剧本修订与表演调整，不仅有助于优化艺术形式，更深化了其在政治表达上的深度与广度。

《满洲渔民》作为一部独幕剧，以渔民苦难为叙事基底，通过音乐与戏剧的融合，展现社会底层人民在压迫中逐步觉醒与奋起反抗的过程，体现出明确的革命立场与艺术创新。批评者肯定了该剧在内容构思上的突破，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再造方面，即剧作摒弃传统锣鼓，改用现代音乐元素来增强情绪张力，使得“渔翁重新站起”一幕中的歌声与动作得以形成有力的情绪合力，引发观众的深层共鸣。^③然而，批评者也指出若干问题：舞美方面，布景设置较为简单，未能充分呈现渔民生活的艰苦环境；化妆与服饰也存在不合年龄或身份的问题，影响了角色的真实感。表演方面，部分演员在关键情绪推进场景中的表现缺乏张力，特别是在面对压迫时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处理显得单一，削弱了观众对紧迫情境的感知。此外，观众接受度层面亦提出改进建议，如增强演员语言的清晰度、优化场景节奏与情绪层次，提升整体观看体验。^④这些批评与建议推动了剧院在表演训练、舞台呈现与叙事节奏上的自我调整与提升，使该剧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实现突破，更在革

① “戏剧批评：《中国发吼》”，《工人之路》，1935 年 6 月 22 日第 2 页。

② 同上。

③ 莎莉：“戏剧介绍与批评：《满洲渔民》”，《工人之路》，1937 年 2 月 20 日第 3 页。

④ 同上。

命叙事的传达上增强了感染力与动员效应。通过强化视觉表达与情绪引导，该剧逐步建立起一种整合听觉、视觉与政治情感的美学机制，为革命文艺拓展了更具动员力的表现路径。

从三个剧目的批评与修订过程可见，剧本批评不仅是提升艺术品质的技术手段，更是革命叙事制度化的核心环节。通过“批评-反馈-再生产”的循环，抽象的政治理念得以在舞台上具体呈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确保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连贯性与情感动员的持久性。

由此，远东中国剧院的剧本批评机制实际上构成了一套系统的“革命文艺生成机制”。它在审美层面对剧作进行精细打磨，在政治层面实现从意识形态输入到群众认同输出的有效转化，使剧场成为阶级立场显性化与政治情感内化的平台。正是这种既有制度稳定性又富动员力的机制，为远东中国剧院持续推动革命传播、构建侨区认同共同体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革命叙事的跨境传播：远东中国剧院的功能与影响

（一）远东中国剧院与中国左翼剧团的实践比较

远东中国剧院设立于苏联远东地区，是苏联政府在对华政策与国际主义传播需求背景下主导建立的文艺机构，服务对象以华人侨民为主，意图通过艺术手段强化对侨区的政治整合与意识形态引导。随着中共旅苏党组织在侨区文化事务中的影响力日增，该剧院在剧目遴选、创作组织与内容导向上逐渐展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引导特征，在中苏党组织的共同影响下，远东中国剧院发展成为服务中国革命文艺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与同时期的中国左翼剧团（如左翼剧联、南国社、工农剧社）相比，远东中国剧院在艺术策略与受众指向上更具特色，但服务的目标是共同的，即广泛动员与阶级觉醒。中国左翼剧团多由城市知识分子发起，既面向工农大众，也涵盖新兴的市民阶层，其创作策略力图在思想性与通俗化之间取得平衡。^①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化的叙事结构与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民族危机与阶级压迫；另一方面，在舞台表现上不断寻求通俗化路径，

^① 贾冀川、彭红：“试论左翼戏剧的理论主张与艺术特征”，《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20年第6期，第140-146页。

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田汉作为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代表作都体现了这一双重策略。在《回春之曲》中，他以革命觉醒为主线，塑造了知识分子高维汉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因伤失忆后在恋人梅娘的照料下恢复记忆、并决心继续投身抗日的故事。该剧本将小范围的家庭与个人冲突诱发出更广阔的历史叙事。剧中插入的诗歌唱段“春回来了！红河岸边香草多，椰林新叶舞婆娑……”^①既赋予舞台以抒情节奏，又以诗意语言强化了历史厚度。《洪水》则以洪灾来临后民众互助的场景折射出下层百姓的坚韧与乐观。剧中插入民歌片段“月光光光照古堤，要与情姐做夫妻……郎心好似落花流水”^②，既为艰苦环境带来温情，也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田汉在不同剧作中广泛刻画从小资产阶级到工人、农民、学生乃至资产阶级的各类人物形象，体现出其“以民众为核心”的创作立场与将“士大夫精神”转化为群众表达的戏剧理念。^③

相较之下，远东中国剧院则基于苏联远东侨区华人劳工与基层党员的文化语境，形成了更为“现场化”与“生活化”的表达风格。剧院通过直白通俗的对白、生动凝练的情节以及撕旗、举枪等象征性舞台动作，将革命理念嵌入观众切身体验，以强化情感动员与政治认同。如《死里逃生》《中国发吼》所呈现的家庭悲剧、民族压迫与劳动困境，不仅贴近侨民的现实感受，也在视觉与情绪层面引发强烈共鸣，使革命立场在“在地化”场域中自然生根。正是这种注重情感触发与文本可感性的策略，使远东中国剧院在跨境传播体系中，既承担革命理念的外宣功能，又成为侨区群众情感动员与阶级认同建构的重要中介。

（二）远东中国剧院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国际传播

远东中国剧院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其身处苏联远东侨区的地缘位置，更在于其在中国革命文艺对外传播格局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介于中苏两国政治文化体系之间的文艺机构，剧院在国际主义、民族革命和群众动员等多重目标的交汇点上，逐步发展出一套具有跨文化适应性与传播张力的叙事机制。

① 《田汉全集（第 3 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20 页。

② 同上，第 226-227 页。

③ 陈军、张燕玲：“论田汉南国社时期戏剧创作、演出与接受的关联互动”，《戏剧艺术》，2023 年第 4 期，第 55-64 页。

第一，在传播路径方面，远东中国剧院通过常规演出、外出巡演与评论刊物等多种形式，嵌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网络。其剧目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民族主题和情感动员为核心特征，成功引起包括苏联文化界在内的广泛关注。例如，《太平天国》通过对农民起义与民族斗争的舞台再现，不仅体现出中国革命叙事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逻辑，也契合了国际左翼观众对“民族解放、阶级团结”的意识形态诉求，展现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与文化感染力。

第二，在传播机制方面，剧院在演出形式与叙事策略上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转译路径。一方面，它充分吸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舞台语言与组织方式，通过典型化人物、象征性动作和情感化叙述提高信息传达的效率与接受度；另一方面，它又立足于华人侨民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经验，将中国革命理念转化为日常化、可感知的舞台情境，强化了政治立场与观众情感之间的联结。这种双向转译不仅提升了中国革命叙事在海外场域的传播效能，也为后续革命文艺更广泛的传播探索了实践路径。

第三，远东中国剧院在中苏文化合作格局中被逐步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对外窗口”的象征性平台。它既承担了输出中国革命立场与历史经验的功能，也成为国际左翼观察中国革命进程、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媒介。在这一双重定位下，远东中国剧院所承担的职能早已超越一般文艺机构的范畴，其在跨境传播、政治动员与文化认同建构中的多重作用，凸显出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深远意义。

因此，远东中国剧院所建构的，不仅是一座跨地域的传播桥梁，更是一种连接话语生产与感知动员的中介机制。它将中国本土革命叙事与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体系中的传播逻辑有机融合，在跨境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再组织与政治情感的重塑。通过“在地化转译-全球化反馈”的双向传播路径，远东中国剧院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革命文艺传播实践中，确立了其独特且具有枢纽意义的历史地位。

四、结 语

远东中国剧院不仅是苏联远东地区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舞台，更以其独

特的制度化架构、艺术化运作和跨境传播网络，成为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国革命文艺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远东中国剧院由苏联政府主导，将原本由华人自发组织的私营剧院进行改造，自 1927 年起被纳入苏维埃教育文化体制的统一管理。此后数年间，剧院通过党委主导的干部任命制度、剧目管理机制以及青年工人戏剧社的培训体系，完成了从松散的民间组织向党政一体化文艺机构的关键转型。此过程既体现了苏联体制对华人文化空间的制度整合，也折射出文化机构在“政治需求”与“艺术延续”之间的协调考量。

在实践层面，剧院借助《死里逃生》《满洲农民》等代表作，通过“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模式，将工农群众的悲苦与革命意志具象化；同时，借由对《太平天国》《中国发吼》《满洲渔民》等的“批评-调整-再演出”循环，不断深化政治准确性与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剧院与《工人之路》报社的跨平台协作，不仅扩大了受众覆盖，也将舞台情境与舆论导向合二为一，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动员与意识形态传播合力。

在跨境传播层面，远东中国剧院既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叙事“在地化”转译植入苏联远东华人劳工与基层党员的生活体验，又通过国际左翼文化网络，将这一本土化成果反馈至更广泛的国际革命阵营，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海外窗口”。它以制度化的剧场实践与双向传播机制，既强化了侨民的阶级认同，也为日后革命文艺的全球化示范提供了宝贵经验。

制度、实践与传播三个维度的分析，揭示了远东中国剧院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革命文艺体系中的宣传路径。由此可见，远东中国剧院并非孤立的边缘实践，而是一个承接政治意图、孕育情感共鸣并向国际舞台延展的核心节点。它在制度设计中保障了意识形态的准确传达，在艺术实践上锻造了动员群众的情感机制，又通过跨境演出与评论网络，突出中苏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远东中国剧院的文化艺术活动反映了当时中苏之间文化互动的实际情况。这一过程为我们理解革命文艺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形成认同并实现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the Chinese Theatre active in the Soviet Far East functioned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revolutionary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it gradually developed a propaganda mechanism with a distinct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This paper traces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modes of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and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func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how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were constructed and disseminated through playwriting and script criticism. Drawing on archival sources from Vladivostok, Khabarovsk, and newspapers such as *The Workers' Road*, the study examines representative plays like “Escape from Death” and “the Manchurian Peasant” alongside related critical texts, analyzing how the theatre employed stage practice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to propagate and reinforce revolutionary idea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theatre’s cross-border communicative role and its broader influ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under the joint operation of Party-state propaganda organs and repertoire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e Chinese theatre in the Far East constructed a theatre-based dissemin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typical plot designs and guided critical discourse, it translated concepts of class struggl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into tangible political emotions, enabling worker audiences to gradually construct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revolutionary po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ngaging with artistic works.

【Key Words】 the Chinese Theatre in the Soviet Far East, Revolutionary Drama,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Socialist Cultural Propaganda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иод с 1920-х по 1930-е год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еатры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ыступая важнейшими площадка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ыработали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с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ый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щей развитие театра, е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интеграцию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ункций,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тому, как он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л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рративы»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оздания репертуара и критики сценариев. Опираясь на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и Хабаровска, а также на газету «Гунжэнь чжилу», авторы статьи отбирают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е пьесы, такие как «Бегство от смерти»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рестьяне»,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 чтобы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как театр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сценическую практику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алов. Кроме того, в статье более подроб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е функции и влия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атр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вместным усилиям партий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х агентств и механизмов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епертуаро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еатр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ыстроили систему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с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ную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Используя типовые сюжеты и направляя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они тран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концепци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в конкрет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моции, позволяя рабочей аудитор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ю 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и позициями через восприя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атр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рам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第八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及负责人名单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上海市社联关于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管理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章程》，2025年7月8日，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举行第八届会员大会和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及负责人，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会 长：刘 军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斌 刘曙光 张少英 张 昕 杨 波 顾 炜 强晓云

秘书长：徐广森

理 事（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云宝 万青松 马 斌 贝文力 王会花 巴禹心 王海燕
刘 军 毕洪业 刘晓音 刘曙光 张丹华 张 昕 张少英
李立凡 张严峻 吴爱荣 邱 强 宋黎磊 张 耀 苟利武
杨 波 岳 强 杨 睿 封 帅 赵世锋 姜 宏 胡丽燕
赵 隆 姜 睿 徐广森 郭丽双 顾 炜 崔 珩 彭 泉
崔雯怡 强晓云 童 嘉 戴 慧

监 事：刘军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5年第4期(总第254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公开发行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 元